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4

Forum (Position Papers)

June 2020

五大訴求以外——反修例運動分析

**Beyond “the Five Demands”:
An analysis of 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葉寶儀、鄒文君、郭佳、劉璧嘉、黃雋浩

© 著作權聲明

本文著作權屬作者擁有。文章內容皆是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中心立場。除特別註明外，讀者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工作論文，作個人使用，並引用其中的內容。

徵引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工作論文系列文章，需遵照以下格式：作者，〈文章題目〉，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工作論文，ISSN 2707-2193，文章編號，文章所在網址。

© Copyright Information

The authors hold the copyright of the working papers.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e ICCS Working Paper Series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ose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Users may download the papers from ICCS website for personal use and cite the content,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Citation of the ICCS Working Paper Series should be made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Author, "Titl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Working Paper, ISSN 2707-2193, No. #, URL of the publication.

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Rm.103 HA Building 2, 1001 University Road

Hsinchu, Taiwan

Tel: +886-3-5712121 Ext.58274, 58272

Fax: +886-3-5734450

Website: https://iccs.nctu.edu.tw/en/wps_list.php

Email: iccs.wps@gmail.com

五大訴求以外——反修例運動分析

葉寶儀、鄒文君、郭佳、劉璧嘉、黃雋浩

ABSTRACT

The 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Anti-ELAB Movement) in Hong Kong has made 2019 uneasy for us. Our eyes weep in the tear gas, and our hearts burn with the city. Not only because we have a long and deep personal connection with Hong Kong, but also because the movement is never a perfect one. There are notions in the movement that we find difficult to totally agree with, but our affection towards the city and the movement has made it hard for us to leave the people on the streets. Our attachment towards the movement therefore has become a difficult one.

In face of depression, anxiety, worries and anger triggered by the movement, we are taking this research project as an opportunity to intervene and interact with the movement by producing knowledge for the movement. The research project demonstrates our will to evaluate the movement, to “be with the people” on the street,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settle our emotions.

The five Chinese essays included in the project will be using methodologies such as close-reading, thick-description, discourse analysis,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ethnography to analyze and delineate different motifs in the movement. These motifs include: yellow economic circle, “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border shutdown, mainland students, pacifist-militant-alliance, etc. Our problematic is to understand how people in the anti-ELAB movement organize, in what bases do they come together, in what momentum do they all share, so to explain why the movement is so big, and at last to predict the possibilities of how it is going to develop, change or self-disrupt.

By discussing different key concepts in the movement, not only do we want to problematize different notions in the movement, but also to problematize our own affective response. This knowledge production project therefore has become an experiment to see if it is possible “to stand with Hong Kong”, to be fragile, to feel their/our pain, but also to develop a kind of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at is more concrete, inclusive and open at the same time. If we can make our way out, maybe it can become an example for other people to tackle and respond to the right-wing-inclination in the movement. We also hope such kind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does not only fall into the canon of “Hong Kong Studies”, and is not only about the “Anti-ELAB Movement” alone, but will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other “small places” like Hong Kong to

grope our way through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re may be more ways other than pleasing strong powers, but to empower ourselves and walk our own path. Solidarity to places like Jeju Island, Taiwan and Okinawa.

Keyword: 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yellow economic circle, “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border shutdown, mainland students, pacifist-militant-alliance

在經歷了反修例運動近一年來巨大的悲哀、焦慮、擔憂、憤怒，我們想要藉著這個研究一來去檢討運動中的各種概念和做法，希望以知識貢獻運動，二來這也是為了去安頓遠在台灣無法親身落場的失落感，三來我們也想要問題化自身的情感，讓它不至於隨便落入一種畫地自封的本土主義政治。我們認為，如果這種帶著巨大情感動力的研究是一種知識生產模式的示範——這種情感動力是一種與街頭人民「在一起」的情感，而如果我們得以在這種以「在一起」為核心的情感中生出一種非排外的政治，或許也可以開啟讓運動的政治走向一個更包容（inclusive）的結果。

我們抱著以運動介入知識和以知識介入運動的心態，希望可以以文本細讀、深描（thick description）及論述分析的方法，重新審視許多大家耳熟能詳的動機（motif）和群體：諸如國際連結、「黃幫襯，藍罷買」、「黃色經濟圈」、「香港人」、「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攞炒」等。

鄒文君的〈「黃幫襯，藍罷買」：「黃色經濟圈」的運作邏輯與內部矛盾〉，探究在反修例運動中「黃幫襯、藍罷買」以怎樣的道德、政治和經濟原則變成重要的抗爭行為，甚至運動原則；「黃店」進入市場經濟運作後期望達成甚麼目標，又會遇上怎樣的道德、政治與經濟困難；並且進一步探討「黃色經濟圈」所想像的集體生活藍圖，對於新的「香港人共同體」身分，有著怎樣的建構意義和侷限。

葉寶儀的〈封關論述的共同體界線：疫情中的反修例運動的初步觀察〉檢視從反修例運動延展出來的新冠疫情下「中港區隔」的想像，試圖由近期論述裡主要把中港作為地理疆域與主權問題的隱喻和想像、「人口」被視為中國滲透香港的管治方式、出身地與政治取態被自然而然綑綁起來等面向，提問究竟是哪些群體被要求暫緩入境或排除在外，並將封關爭論中的歧義最終引向我們思考封關甚麼程度上是出於防疫考量，如何才是因應疫情合理的邊境控制。

劉璧嘉的〈從「攞炒」切入——反修例運動如何在矛盾與統一之中「動起來」？〉爬梳不同「攞炒」觀以至於攞炒策略之間的差異、統一及矛盾，從而回應運動是如何可以「無策略」地動起來；文章指出攞炒策略是基於對漸進主義的絕望的「態度的同一性」，

而這種「態度的同一性」如何造就當中的矛盾無法疏導，甚至無法建立出完整的思想體系以至於策略方向，使得攪炒其內部暫時性和脆弱性；並進一步探究攪炒所要回應的歷史困境如何使之視野有內在侷限性和保守性，以及在什麼情況下其基進性才可以被激發。

郭佳的〈穿越黑洞：反修例運動中的內地生及其「史前史」〉指出，內地生與包括本地生在內的香港社會之間的關係是跟過去一脈相承的，而內地生的情感構造是在中港的纏繞關係、香港對內地招生的政策脈絡、內地生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以及當代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知識與情感底色中長出來的；於是文章提問，內地生在今次反修例運動中的認知和情感狀態，是如何從同構的內地生跟香港社會關係「史前史」中生長出來，進而在反修例運動這個將時間和空間疾速壓縮的過程中發生劇變？

黃雋浩的〈和勇不分的跨代「手足」網絡——從親密關係看「反修例運動」的「不割席」現象〉透過抗爭者的生命經驗回應對反修例運動的種種論述及反思為初衷，記錄抗爭者在街頭的實作與技藝、「攪炒」下的家庭衝突與協商，並分析運動當中對新世代的自戀指控，以至告別功利家庭的跨代和解。論文從回溯這些行動者的行動和決策與親密關係，如何在沒有「大台（領導）」下組織，以之回應「何以不割席」的質疑，同時也藉此討論歷史意識與解殖的問題。

五篇論文共同動力是，希望把運動中許多貌似一致的動機和群體背後的差異指出及分析——譬如「黃色經濟圈」、「攪炒」、「封關」、「內地生」和「和勇不分」等，因為這些差異可能會使得這個關於反送中的故事變成一個不平整的敘事。但作為一個大型運動，所涵蓋的人與背景之多，或許只有這種敘事才有解釋力和預測性。我們的問題意識在於要去解釋為何運動可以得以壯大，並預測運動又會因為什麼原因無法繼續壯大。我們希望透過指出運動的內在差異、張力與轉化動力，進而可以把運動的團結與鬥心鍛煉成更成熟和深刻的模樣，使得運動可以走更長的路，也希望透過研究介入運動，試圖扭轉運動中的一些對個體、群體、異議的排外傾向，使得運動的過程中長出更為具包容性的政治。同時，我們期待實踐知識之於現實的可能——香港這樣的「小地方」可以在大國角力底下如何生存，是左右逢源還是左右受壓？抗爭者是可以生出全新的政治，抑或絕望得只能在舊有的世界秩序中周旋？我們也希望這個研究不只是「香港研究」或「反修例運動研究」，而是或許未來可以與其他同樣在夾縫中的抗爭——譬如沖繩、濟州島、台灣——作知識上的相互參照。

關鍵詞：反修例運動、黃色經濟圈、攪炒、封關、內地生、和勇不分

封關論述的共同體界線：疫情中的反修例運動的初步觀察

葉寶儀

摘要

COVID-19 疫情和工會化打開了反修例運動政治與社會議題串連的契機，促成本年 2 月的醫護罷工，要求香港政府落實全面封關。本文把疫情中封關的訴求的脈絡拉到 2003 年自由行開通的時間點，提出 COVID-19 的封關訴求雖有防疫考量，但更大程度基於中港區隔的政治訴求。基於封關論述裡的龐雜和異質性，本文建基於網絡討論，以反修例運動中的罷工醫護、黃色經濟圈、媒體為例，初步整理不同行動者所理解的「封關」的分歧，反思「封關」排除的不同群體和背後的邏輯。這些分歧之中可以梳理出兩組問題：公民權與資源分配和中港群體等同政治地理文化疆域的再現政治。在防疫與運動的雙重語境之下，本文主張封關防疫回到旅遊史和防疫資源的考量，尤其是在運動內部，並非以出身地或政治忠誠作為被排除的理據。

關鍵詞：反修例運動，醫護罷工，黃色經濟圈，身份政治，情感政治，封關，COVID-19

一、「康復香港，時代抗疫」——疫情中的反修例運動

COVID-19 疫情爆發之初，「封關」（主要指向暫緩入境的邊境管制）在民間的聲浪已經不絕，後來中國內地疫情進入白熱化階段，香港醫院管理局旗下員工在職工盟成立的工會在 1 月底至 2 月以「封關」作為罷工訴求，「封關」明確進入公共衛生專家、香港特區政府、媒體和大眾的視野。醫護罷工是反修例運動進入工會化階段的行動，亦催生「康復香港，時代抗疫」的口號，「封關」的討論和行動亦落實至民間其他參與者，本文認為是次封關的討論提供了觀察反修例運動變化的另一角度。

中港區隔的想像當然並非這次疫情首次出現的現象，本文試圖由近期論述裡主要把中港作為地理疆域與主權問題的隱喻和想像，「人口」被視為中國滲透香港的管治方式，出身地與政治取態被自然而然網綁起來，把各種跨境人口問題帶回來。簡言之，當講到「封關」的時候，具體來說是哪些群體被要求暫緩入境或排除在外？背後的邏輯又是甚麼？本文第一部份先鋪陳中港邊界的歷史構成，以及是次疫情與 SARS 相比，邊境人口管制的討論如何由經濟議題轉向政治化；第二部份則針對「封關」在運動參與者的歧義，

並粗略區分「在香港的中國人」和「在中國的香港人」如何在疫情初期被討論。在防疫與運動的雙重語境之下，本文希望這個歧義最終帶出疫情期間運動內部並不必要排除的群體，引向我們思考封關甚麼程度上是出於防疫考量，如何才是因應疫情合理的邊境控制。

本文初稿於本年 2 月寫就，觀察的時期主要是 1-2 月，由於仍然以醫護罷工為軸心，是次修訂未有補充更多後續的邊境管制措施。¹另外本文主要建基於網絡討論，未有訪談和田野調查，僅僅是一些不成熟的觀察，期待在後續研究中，「跨境流動人口」不管是被同情或批判的討論，這些「跨境流動人口」不僅僅被當成數字或刻板印象，而是有具體的政經和社會條件與生命經驗的考察。

二、中港邊界的歷史生成

中港邊界看似是自英殖時期開始不證自明的存在，然而我們必須細究當中的歷史構成，從早期到晚期英殖時期，有極大程度之別。一般討論把香港本土身份的轉折放在六七暴動的香港節，不過我們其實可以以中港兩地邊境管制的制度層面理解邊界的歷史形成。早在 1899 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的時候，初期雙方就北方的疆域（frontier）問題有所爭論，英國意圖把深圳也納入新界版圖，因為深圳河流域無險可守，而新安縣界山為界則有利防守。²英殖早期的香港與中國之間一直是多孔的、可滲透的，例如當時中英街兩邊居民可以自由往來，無人看管。³中港邊界可謂是冷戰時代的產物，1950 年韓戰爆發，中英屬於交戰國，為防新界地區將物資走私至中國，援助北韓，港英政府在 1951 年頒佈《入境管制條例》，「管制非本港土生人士來港、離港以及在港內活動」，同年頒佈《邊界禁區令》，持有港英政府發出的通行證才能進行和逗留此區，中港邊界才正式建立。⁴在 1960 年代港英政府意識到中國難民議題，在新界被逮捕的內地難民才予以遣返，雖然亦有在邊境遣返相當人數的偷渡者，亦開始在邊境之間興建鐵絲網，⁵但到達九龍和港島者則可居留，至 1970 年代以上措施正式命名為「抵壘政策」，這項政策為香港帶來好一批勞動力。⁶1980 年港英政府取消抵壘政策，香港與中國的行政邊界和心

¹ 本文初稿為 2019 年朱元鴻老師開設的「情感政治」的期末作業，並據此改寫，感謝課堂上的討論。

² 阮志：《入境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頁 15-20。

³ 劉蜀永：〈中英街的歷史與興衰初探〉，載劉蜀永：《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2010 年），頁 181-194。

⁴ 《入境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頁 46-47。

⁵ 《入境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頁 49-55。

⁶ Pang, Laikwan. 2020. *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136.

理邊界由此更為確立，也構成本土香港人的自我形象和焦慮。

不過比起 1980 年代以前，以往中國是「第三世界」的，如今變成現代化的「大國」。許寶強和葉蔭聰同樣指出 2003 年為一個轉折點。許寶強認為，排外情緒可以視為「數字種族主義 (numerical racism)」，即是說，不同於香港以往的移民數目，問題在於自由行的旅客的數量和速度增長過多過快，對本地民眾生活造成太大干擾，造成對內地人的敵視。⁷確實，隨著港澳成為內地近十年最大的觀光市場，2018 年的內地旅客人數為 51.2 百萬，比 2002 年未有港澳個人遊計劃前有 6 倍升幅，這個情形真實的改變了香港日常景觀。⁸許寶強認為，雖然中港矛盾可以理解，把問題指向中國人文明素質是錯置焦點，把數量和速度的問題置換成質的問題。⁹葉蔭聰批評，本土派應對的方式，是在不斷擴張的消費文化裡，透過族群認同管理邊界和劃界，過程中一邊批評政府，但亦不免落入與政府相同的位置：一方面大力驅趕內地旅客，另一方面致力維持香港旅遊局對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定位和形象，行動裡只歡迎非中國的遊客。¹⁰葉蔭聰主張：「香港這一波本土派運動是建立族群管治主體以及控制中港之間想像和物理界線的計劃，這道律令的核心是管理人口流動的生命政治意志。」¹¹不過葉蔭聰亦強調，本土派並不是一個具有完整綱領的政治團體，內部有不少分歧；至反修例運動後本土派如何重新釐定，未在其專書的研究範圍。本文認為是次疫情的案例同時印證了兩位論者的觀點，不過筆者部份認同葉蔭聰的觀點：一方面封關的討論不同於之前的反水貨客行動，並非落入與政府的共謀關係；另一方面，疫情裡部份封關訴求確實是以族群為中心，想像和管治中港邊界。

三、從 SARS 至 COVID-19：疫情下邊境人口管制的政治化

2003 年 4 月，世衛向中國廣東省和香港發出警告，大量航班取消，經濟活動停擺。6 月 23 日，世衛將香港從疫區除名。在此之前，雖然批評中國處理疫情手法的政治討論仍不時可見，但關注經濟的論述始終是主流。其中一篇在 2003 年 5 月 31 日刊登於《香港日報》的社論如是道：「本港現時處於兩難局面，不盡快恢復內地客來旅遊，我們的

⁷ 許寶強：〈數量與速度的「排外」——中港矛盾不是什麼〉，《香港獨立傳媒網》(2014 年 4 月 18 日)：<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22348>

⁸ Ip, Iam-chong. *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Routledge, 2019. p.54-57.

⁹ 〈數量與速度的「排外」——中港矛盾不是什麼〉：<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22348>。

¹⁰ *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57-65.

¹¹ 原文為「I argue that Hong Kong's new wave of nativist activism is a project of forging an ethnocentric governing subject with an imperative to control the city's imagined and physical boundaries with China. What lies at the heart of this imperative is a biopolitical will to administer population flow.» *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54.

經濟「唔掂」（按：「不行」的意思），恢復旅遊但『非典』遲遲驅之不去亦『唔掂』。」¹²這段文字裡，雖然香港的防疫還是放在優位，但同時肯定當時的香港處於兩難局面，經濟發展倒退是一個顯著的負面影響。顯然若非疫情的焦慮，作者會很歡迎邊界的人口流動，邊界和人口流動在此扮演著重要的經濟角色。用黃宗儀對中港跨境治理的觀點來說，這是固定的政治邊界與開放的經濟邊界的矛盾。¹³相反，在這次疫情裡，疫情顯然亦對本地商店和勞工造成打擊，但運動參與者顯然繼續針對北京政經霸權與香港經濟過份依賴中國內地等問題，轉向強調本土消費，因而出現黃色經濟圈版本的「五一黃金週」，「香港人自救」的主張自疫情起貫穿反修例運動。

對照 SARS 時期的社論文字，COVID-19 裡中港區隔的討論，整體經濟發展顯然不再是關注的焦點，或者如上所言，經濟扣連或從屬於政治立場。箇中原因在第二部份的歷史脈絡已經大致交代。當前疫情聚焦於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香港的醫療系統是否可以負荷？在一篇比照 SARS 和新型冠狀病毒的入境管制措拖的短文裡，《立場新聞》記者林彥邦同樣把「自由行」作為比照的基準，他指出，2003 年前並沒有「自由行」，「2002 年『全年』，大陸訪港旅客的人數，只是 683 萬人次；而 2019 年，大陸訪港旅客是 4377 萬人次，這數字已經是反修例運動導致大陸旅客大跌後的數字（比 2018 年跌 14.2%）」，因此主張由源頭堵截，不然香港醫療體系無法應付。¹⁴

另一個問題是，香港是否可以自主地對中國實施入境管制？香港現任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就曾在臉書粉專討論一國兩制所賦予香港政府的權力，認為政府不願封關乃一國兩制的失敗：「正是基於政治控制的考慮，就算中港之間明明有完整的出入境管制系統，可以隨時針對中國實行不同層級的拒絕入境安排（全面封關或禁止某省某直轄市入境皆可），但中共絕不允許香港特區政府行使《基本法》第 154 條的權力：『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實行出入境管制』」。¹⁵換言之，封關與否同時體現香港自主的程度。

如果說朱凱迪的言論仍然主要在一國兩制框架裡討論，是自主權（autonomy）的問題，部份討論可謂指向更敏感的主權問題（sovereignty）。Josef. Li 在近日疫情風波的《明報》社論〈肺炎的恐慌政治〉明確表示對邊界的需求：他引用社會學家 Mabel Berezin 的說法，認為需要有一個「有能力帶來安全感的政體／狀態（secure state）」，達到政體邊界內的安全感，才可以與邊界內外的人建立關係，不然的話只能以仇恨應對「完全無法控制的人或物」，並以此理解近年香港的恐懼與仇恨，乃是源於「感到主權、政府、邊

¹² 社評：〈內地遊客快到非典仍未埋尾〉，《香港日報》（2003 年 5 月 31 日），A06。

¹³ 黃宗儀：〈全球城市區域治理之外香港的跨境身分論述與再現〉，《地理學報》（2008 年 6 月），頁 8。

¹⁴ 林彥邦：〈2003 年沙士時為何不封關？〉，《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20 年 2 月 3 日）：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0733>

¹⁵ 朱凱迪：〈按省份實行邊境管制〉，《香港獨立傳媒網》（2020 年 1 月 24 日）：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70204?fbclid=IwAR1QKWt1nYcUq6C6OH1oHqUxb4nvMDNBzOXKmdeIjbuqUBPmUwd5XJuU08>

界、警察和軍隊都不屬於自己」，其中的脈絡自然是 2003 年 SARS 的歷史記憶，以及自高鐵工程開始，近十年中港更為劇烈的政治與經濟融合，以及抗爭的身體經驗。¹⁶在此脈絡下，作者特別指向安全的國家邊界，對民族國家本來的暴力未有著墨和檢討，作者在此把疫情的恐慌情緒歸因於主權與政府不屬於自己，轉向對主權和身份認同的需求。可見封關之說除了出於部份防疫考量，更多是一種政治性情感。

文化評論人鄧正健更撰文表示「封關」同時是一種「中港區隔」的訴求，這種區隔的需求甚至已經至「生死攸關」的程度：「換言之，只要你重複十七年前已學會的手勢，將外科口罩正確地掛到臉上，紛踏而來的並不只於十七年前的陳年記憶，而是一種可能比己亥之事更為激進的政治想望：跟關外割蓆。於是全新的疫症隱喻於焉誕生：內地不只是蝗蟲，更是病毒；蝗蟲之害不過是蠶蝕資源，而病毒卻是生死攸關。而封關的訴求，似乎已不只是務實的為了防疫，更似是一個最應時的政治隱喻。」¹⁷由此可見，「封關」一方面出於疫情裡醫護資源與人手不足的語境，有其急切性；另一方面可以視為對自主、主權、地理疆域的想像，在後者的想像之中，即使有跨境人口的存在，也被當成鐵板一塊的集體隱喻，例如「蝗蟲」和「病毒」等他者。不過這些被封關的對象指向哪些人？接下來的討論希望回到民間實踐，針對被封關的對象的歧義本身。表面上部份民間以行動支援醫護提出的封關，但兩者所詮釋的封關對象，分別呈現出「封關」背後兩組不同的問題：首先是醫護罷工裡的資源分配與公民權問題，更傾向制度層面的分配不正義；另一端則是文化、語言政治與政治忠誠的問題，更加靠近前述的主權作為再現層次的政治想像。

四、「封關」的歧義

（一）醫護罷工的「封關」

¹⁶ Josef. Li，〈肺炎的恐慌政治〉，《明報》（2020年2月9日）：

<https://news.mingpao.com/pns/%E5%89%AF%E5%88%8A/article/20200209/s00005/1581185232630/%E5%91%A8%E6%97%A5%E8%A9%B1%E9%A1%8C-%E8%82%BA%E7%82%8E%E7%9A%84%E6%81%90%E6%85%8C%E6%94%BF%E6%B2%BB?fbclid=IwAR2SUQVAqdxIc-NPCnPnEug2mYZu39BsZaSfKKWgM1sfUyX-sndSMPajOM>

¹⁷ 鄧正健：〈掛一個口罩都是政治的〉，《明報》（2020年1月30日）：

https://news.mingpao.com/pns/%E4%BD%9C%E5%AE%B6%E5%B0%88%E6%AC%84/article/20200130/s00018/1580323570755/%E4%B8%96%E7%B4%80-%E7%8E%BB%E7%92%83%E5%A4%A7%E5%8F%94-%E6%8E%9B%E4%B8%80%E5%80%8B%E5%8F%A3%E7%BD%A9%E9%83%BD%E6%98%AF%E6%94%BF%E6%B2%BB%E7%9A%84?fbclid=IwAR3A04k5ec70SnD2wnmvdYtctuuCobwBo8WH78rabs-rc-Z4r51c_XxX16I

2019年12月起，香港反修例運動開始進入工會化階段，不少新工會成立，希望能凝聚政治性罷工的力量。醫管局員工陣線就是其中之一，下表是醫護罷工、香港政府限制入境措施、入境數字和確診案例的連動關係簡表。醫管局員工陣線罷工為期2月3日至2月7日，雖然短短幾日，就讓政府由完全拒絕封關，到只保留三個口岸：港珠澳大橋、機場、深圳灣，可謂罷工的成果。特首林鄭月娥認為封關是助長歧視，醫護罷工的訴求裡只強調限制「非港人」入境，因此跟林鄭所認為的意涵並不一樣。然而，醫護對封關的訴求不僅僅限於醫護罷工的公開論述，關鍵在於民間不同行動者如何詮釋。

日期	醫管局員工陣線	香港政府	入境數字	總計確診案例
12月	6日申請成功，開始招收會員；11日舉辦醫療業界工會集氣大會，16日刊憲成為合法工會。	醫管局表明不接受罷工，認為醫護應該政治中立。	整月內地旅客人次為2398232，平均每日有超過7萬人次	
1月7日		刊憲把武漢的不明肺炎立入須呈報傳染病。		
1月22日	醫療組織發出聯合聲明，促請政府立即拒絕旅客經由中國入境。 ¹⁸			首宗輸入案例
1月23日	武漢肺炎襲港醫療界工會發佈會正式要求港府28日前			

¹⁸ 包括醫管局員工陣線、香港物理治療師總工會籌委會、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香港製藥及醫療儀器業職工總會籌委會、香港獸醫業職工會籌委會、杏林覺醒、香港會計專業人員協會、香港公關及傳訊業總工會、香港地產代理權益總會籌委會、香港專業眼科視光師工會籌委會、航空同業陣線籌委會、港鐵新動力、香港傳媒及出版職工會籌委會、香港白領（行政及文職）同行工會、物業管理從業員工會籌委會、香港檢測及認證業職工會、政府非公務員職工總會籌委會、香港幼兒教育工會籌委會、香港創建及工程人員總會籌委會、建築地盤職工總會、香港資訊科技界工會、香港人力資源僱員工會籌委會、紮鐵業團結工會、香港酒店工會。聲明內文詳見：

<https://www.facebook.com/HA.EmployAlliance/photos/a.115718553232619/134775471326927/?type=3&theater>

	全面封關，否則展開工業行動。			
1 月 25 日		<p>新型傳染病準備及應變計劃由嚴重級別提升至最高的緊急級別，行政長官將主持跨部門督導委員會，同時領導相關指揮中心，督導委員會下設四個工作小組，負責疫情防控、應變行動、公眾參與、抗疫傳訊工作；行政長官同時委任四人專家顧問團。</p> <p>加強管制出入口，控制疫情傳播，措施包括無限期暫停來往湖北省武漢的航班和高鐵，直至疫情明顯受控為止；擴大內地入境人士的健康申報至所有口岸，包括中港碼頭、港澳碼頭、屯門碼頭、六個陸路口岸，以及港珠澳大橋的香港口岸區，並試行電子申報計劃。</p> <p>特首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表示封關不切實際。</p>	<p>香港居民：71508</p> <p>內地訪客：29891</p> <p>其他訪客：8135</p>	5 宗輸入案例
1 月 26 日	正式以醫管局員工陣線名義提出醫護五大訴求，並提出罷工日程計劃：禁止任何旅客經由中國入境、呼籲全港市民戴口罩、提供足夠隔離病房，暫停非緊急服務、嚴肅跟進病人逃走事件，確保工作環境安全、提供足夠配			8 宗輸入案例

	<p>套予照顧隔離病人的醫護。¹⁹</p> <p>2月5日訴求改為：禁止任何旅客經由中國入境、落實確切方案確保口罩供應充足、提供足夠隔離病房，暫停非緊急服務、提供足夠配套予照顧隔離病人的醫護、公開承諾絕不秋後算賬。²⁰</p>			
1月27日		宣佈限制湖北省居民及以往14日到過湖北省的人士入境香港。		
1月28日	<p>基本同意新一輪防疫措施，但主張全面封關，認為政府應公佈個人遊以外探親和商務來港人士的數字，不應只籠統說個人遊人次佔「大部份」。</p>	<p>宣佈新一輪防疫措施，其中包括：²¹</p> <p>部分口岸服務自1月30日凌晨起暫停，包括高鐵西九龍站、紅磡站口岸、沙頭角和文錦渡口岸、中國客運碼頭和屯門客運碼頭口岸。以上措施只針對客運，貨運不受影響。</p> <p>內地暫停發出涵蓋49個城市的個人遊簽注。</p>		

¹⁹ 聲明內文詳見：https://www.facebook.com/HA.EmployAlliance/posts/135383097932831?_tn_ =K-R

²⁰ https://www.facebook.com/HA.EmployAlliance/posts/139056494232158?_tn_ =K-R

²¹ 全文見〈政府公布新一輪措施應對疫情〉，《香港政府新聞網》（2020年1月28日）：

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1/20200128/20200128_182923_787.html?type=category&name=wuhan&tl

		經港珠澳大橋的金巴、沙頭角跨境巴士班次減少；內地到港航班將削減一半。		
1 月 30 日		<p>高鐵西九龍站、紅磡站口岸、沙頭角和文錦渡口岸、中國客運碼頭和屯門客運碼頭口岸開始暫停運作，貨運不受影響。</p> <p>31 日再次指全面封關不符合世衛指引，以及助長歧視。</p>	<p>香港居民：86291</p> <p>內地訪客：19555</p> <p>其他訪客：3263</p>	10 宗輸入案例，1 宗輸入個案密切接觸者，1 宗可能本地案例，共 12 宗。
2 月 1 日	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表決罷工，票數大多數通過罷工。			
2 月 3 日	<p>2 日特首林鄭月娥拒絕出席工會與醫院管理局的談判，談判破裂。</p> <p>第一階段罷工，約 3000 人，影響非緊急醫療服務。</p>	宣佈羅湖鐵路、落馬洲支線鐵路、落馬洲皇崗、港澳碼頭四個口岸明日零時停止運作。所有陸路和海路的跨境人流只集中於深圳灣口岸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處理；連同香港國際機場，屆時本港連接內地和外地的口岸僅餘三個。 ²²		
2 月 4 日		羅湖鐵路、落馬洲支線鐵路、落馬洲皇崗、港澳碼頭四個口岸停止運作。	<p>香港居民：23643</p> <p>內地訪客：9511</p> <p>其他訪客：1808</p>	首 3 個本地感染個案，18 宗確診。

²² 全文見〈四口岸午夜起停止運作〉，《香港政府新聞網》（2020 年 2 月 3 日）：

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2/20200203/20200203_182410_508.html?type=category&name=wuhan&t

2月7日	4日至7日發動所有工會會員罷工，約9000人，影響緊急醫療服務。 完成第二階段罷工，會員投票票數未能啟動下一階段罷工。	香港政府宣佈，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權力，訂立兩條附屬法例——《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和《預防及控制疾病（披露資料）規例》，對從內地入境人士強制檢疫14天。		
2月8日		強制檢疫生效。	香港居民：867 內地訪客：995 其他訪客：511	
2月17日		深圳市公安局宣佈推出疫情防控期間特別申請通道，包括內地居民往來港澳通行證赴港探親、逗留再次簽註等兩類12項業務，以及本市簽發的外國人工作、外國人工作者家屬私人事務等兩大類居留許可延期。其中，內地居民赴港探親再次簽註具體包括：探望在香港定居、長期居住、就學或者就業的配偶、父母或者配偶的父母、子女或子女的配偶、兄弟姐妹、(外)祖父母、(外)孫子女。此外，赴港就學、就業、居留、培訓、隨任或以受養人身份赴港依親，並經香港有關部門批准的人員，可申請逗留簽註。 ²³		

²³ 〈深圳出入境開通疫情期間特申通道〉，《深圳政府在線》（2020年2月19日）：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zwdt/content/post_6735186.html

他們的五大訴求是：禁止任何旅客經由中國入境、落實確切方案確保口罩供應充足、提供足夠隔離病房，暫停非緊急服務、提供足夠配套予照顧隔離病人的醫護、公開承諾絕不秋後算賬。第一個訴求是最被廣傳的，禁止任何旅客經由中國入境是希望把人流減到最低，減少社區傳播風險。不過觀乎香港的確診感染病例，輸入案例可能早於1月10日感染再回港，而第一、二、三宗本地個案，最早於1月中旬發病，²⁴可見收緊入境政策只是其中一種防疫手段，並不代表社區感染不會爆發，誠如中文大學醫學院的聲明：「收緊入境政策雖不能完全杜絕跨境傳播，但可有效減少隱形患者入境的機會，降低受感染人數，從而減輕對本地醫療系統造成的負荷。」²⁵這些訴求裡第一項是同時具有防疫與政治考量，其他項目都主要按照醫護本來的勞工保障而提出的。

不過，暫緩入境對象最初並無共識。「禁止任何旅客經由中國入境」並非最初共識，例如1月底時部份九龍東、港島西及普通科醫護首先要求「全面封閉所有接壤中國關口，只批准香港市民及持有效工作或升學簽證的內地人入境本港」，律敦治醫院部份醫護主張「全面關閉所有中國旅客入境通道」，威爾斯醫院部份醫護則要求「禁止所有內地旅客通過所有邊境管制站入境」。²⁶後來主張拒絕非香港永久居民入境時，亦未有清楚釐定「非永久居民」（包括學生、工作簽證、外傭等）和「永久居民」之別。²⁷可見整個討論雖然仍有不少可以繼續針砭的地方，行動的過程仍有一定程度的檢討與調整。

醫護罷工的訴求實際上亦碰觸至工人權益的問題，包括醫護人員保護裝備不足、工作環境未夠未備、隔離病房不足等問題。工會亦成立「武漢肺炎防疫抗爭基金」來支援受罷工影響的醫護。不過醫療資源並非近期的問題，相關問題浮現多時，包括醫護沒有足夠休息時間。2019年初亦有醫護遊行，以本土論述為由，認為香港醫護資源負荷過重，因而要求削減單程證。實際上，由醫護發起的罷工的邊界訴求背景的問題更多是資源分配與公民權問題，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當港府沿用一貫醫院管理局的原則（病人患上或懷疑患上現行《國際衛生條例》所列疾病，毋須繳付急症室或公眾病房住院費用），²⁸一開始表示非港人可獲豁免治療費用時，引起民間極多批評，後來港府改口宣佈非港人因COVID-19入院，仍須負擔住院費用。港府的理據是鼓勵有病徵人士及早就醫，從而減低社區傳播風險；反對者的主要理據則是政府未有全面封關，由於香港醫療設備較為先

²⁴ 〈醫管局指新增確診個案中 兩人是早前確診者的妻女〉，《RTHK 香港電台》（2020年2月5日）：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06834-20200205.htm?spTabChangeable=0>

²⁵ <https://www.facebook.com/CUHKMedicine/posts/1782965278505931>

²⁶ 徐詠然、陳敬慈：〈罷工內望（上）——群眾運動與種族主義：一些觀察與思考〉，《香港獨立傳媒》（2020年4月26日）：<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72848>

²⁷ 〈罷工內望（上）——群眾運動與種族主義：一些觀察與思考〉：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72848>

²⁸ 醫療收費請見「醫院管理局」網站：

https://www.ha.org.hk/visitor/ha_visitor_index.asp?Content_ID=10045&Lang=CHIB5&Dimension=100&Parent_ID=10044

進的印象，免費就醫會吸引大量中國內地人士過境就醫。後者的假設不是沒有理據可依，不過這套邏輯其實可以放在「新移民搶資源」和「大陸人搶奶粉」等印象的脈絡。這裡一方面涉及中國大陸的醫療資源問題，例如醫院床位不足不收治或按照關係選擇性收治，另一方面是香港的資源分配與防疫工作。醫療資源短缺非一日之寒，用一個非常粗略的例子，2017/18 年度香港醫療開支僅佔 GDP 2.9%，相較同期英國 9.7%、日本的 10.9% 遠低 3 倍。²⁹SARS 後為何醫療資源與防疫規劃如此不足？醫護罷工裡的訴求大多是因應 COVID-19 的短期訴求，或許我們應該借此契機開啟有關醫療資源和防疫的長遠規劃問題，亦認真檢視資源不足問題（同時跟人口增長與老化相關）是否只是轉嫁特定群體，尤其是新移民。儘管相關討論並不至空白，例如香港公共衛生研究社曾就檢疫中心規劃與社區指定診所撰文，³⁰不過把這些訴求進一步加入是次運動或工業行動的藍圖之中，或許可以成為往後思考的方向。

（二）在香港的中國內地人

政府不全面封關，開始出現民間自行「封關」的政治立場表態現象，尤其是在黃色經濟圈，從以往招待反送中運動「手足」，不問出身，變為拒絕大陸客人或說普通話的客人。這裡的「封關」具體來說並不同醫護罷工主張的「封關」。筆者在回港的時期，亦有光顧過幾家黃店，其中一家亦明確列明「保障香港人安全，不招待大陸人」。從表面看來，這是針對港府未有封關與檢疫，基於防疫的考量，但按此邏輯為甚麼不准進店的對象不是 14 日內由中國內地入境人士？內地人可以從世界各地入境香港，而香港人也可以多次往返中國大陸與香港。由此看來，部份黃店的封關至少是不自覺地訴諸中港區隔的政治立場。

鑒於筆者沒有更充份的田野經驗，本文參考一些媒體文章，希望整理部份黃店在落實店內封關的實況。在 Matter 這個自媒體平台裡，我們可以讀到不少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港漂」（泛指來港求學或求職的中國內地群體，通常是來港留學生或透過專才計劃來港）或「新移民」的書寫。在一篇〈我去了三家「只歡迎香港人」的餐廳吃飯〉的文章裡，點出黃店在臉書粉專與實際招待的落差，封關更多是一種立場宣示和姿態：第一家標明「即日起只招待香港人，落單時只限粵話及英語，一概普通話，暫不招待。更新：歡迎台灣朋友。」結果作者只在點菜時用粵語，跟朋友溝通繼續用普通話。³¹第二家門

²⁹ 〈本地醫療衛生總開支帳目〉，「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及衛生局網頁」：

https://www.fhb.gov.hk/statistics/cn/dha/dha_summary_report.htm

³⁰ 呂詩婷、陳三木、陳盈：〈社區防疫如何展開：給香港政府的一堂公共衛生課〉（2020 年 2 月 17 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217-opinion-hk-epidemic-prevention/>

³¹ 克里斯托：〈我去了三家「只歡迎香港人」的餐廳吃飯〉，Matter（2020 年 2 月 2 日）：

<https://matters.news/@Crrrrrrystal/%E6%88%91%E5%8E%BB%E4%BA%86%E4%B8%89%E5%AE%B6-%E5%8F%AA%E6%AD%A1%E8%BF%8E%E9%A6%99%E6%B8%AF%E4%BA%BA->

口貼了一張 A4 大小的紙張，上面寫著幾個大字：「恕不招待大陸人，我們只是想活久一點，必須保障本地客人。」，但實際光顧的經驗也沒有發生甚麼，因為是用寫的方式點菜。³²第三家的臉書上的封關聲明表示：「無知，無能，無恥之林鄭三無政府，繼續拒絕全面封關，為盡力確保店內衛生安全，迫於無奈，唯有自行封關」、「由後天試業日開始，只會接待本地香港人，進店前除紅外線感應器探熱之外，請出示香港身分證。」結果店員測了體溫，沒有檢查身分證。³³作者對此批判和沮喪，但仍對香港有很多同情的理解，並以親身體驗，嘗試游走在這些疆界的空隙。不過不同的港漂或新移民對事件取態就不一樣：作者張泰格在〈手足的條件——講普通話者勿進〉表示他認識的普通話手足選擇抗議：「越是在黃店，他越要大大聲講普通話，他只是想讓他們知道，講普通話是有手足的」。³⁴

「光榮飲食」是黃色經濟圈的一個代表。1 月 27 日其臉書粉專發放貼文：「即日起光榮飲食只招待香港人落單時只限粵話及英語，一概普通話，暫不招待。更新：歡迎台灣朋友。」³⁵並指「你唔封關我封舖」（你不封關我封店）。³⁶2 月 14 日，光榮飲食在其粉專表示，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聯繫負責人，警告不可以不招待某種客人，光榮飲食負責人就表示「全部員工都不會普通話，也不會用普通話解釋菜單，點菜時只可以用粵語」，「小時候不讀書所以不會多國語言，不會普通話不是違法吧？你說我種族歧視，你也知

<https://matters.news/@Crrrrrrystal/%E6%88%91%E5%8E%BB%E4%BA%86%E4%B8%89%E5%AE%B6-%E5%8F%AA%E6%AD%A1%E8%BF%8E%E9%A6%99%E6%B8%AF%E4%BA%BA-%E7%9A%84%E9%A4%90%E5%BB%B3%E5%90%83%E9%A3%AF-zdpuAxuMJfjRjQ1NynqiK3FNk8HMDvxiGU6eTGdMDvcEJQQm>

³² 〈我去了三家「只歡迎香港人」的餐廳吃飯〉：

<https://matters.news/@Crrrrrrystal/%E6%88%91%E5%8E%BB%E4%BA%86%E4%B8%89%E5%AE%B6-%E5%8F%AA%E6%AD%A1%E8%BF%8E%E9%A6%99%E6%B8%AF%E4%BA%BA-%E7%9A%84%E9%A4%90%E5%BB%B3%E5%90%83%E9%A3%AF-zdpuAxuMJfjRjQ1NynqiK3FNk8HMDvxiGU6eTGdMDvcEJQQm>

³³ 〈我去了三家「只歡迎香港人」的餐廳吃飯〉：

<https://matters.news/@Crrrrrrystal/%E6%88%91%E5%8E%BB%E4%BA%86%E4%B8%89%E5%AE%B6-%E5%8F%AA%E6%AD%A1%E8%BF%8E%E9%A6%99%E6%B8%AF%E4%BA%BA-%E7%9A%84%E9%A4%90%E5%BB%B3%E5%90%83%E9%A3%AF-zdpuAxuMJfjRjQ1NynqiK3FNk8HMDvxiGU6eTGdMDvcEJQQm>

³⁴ 張泰格：〈手足的條件——講普通話者勿進〉，Matter（2020 年 2 月 5 日）：

<https://matters.news/@kaofeel/fine/%E6%89%8B%E8%B6%B3%E7%9A%84%E6%A2%9D%E4%BB%B6-%E8%AC%9B%E6%99%AE%E9%80%9A%E8%A9%B1%E8%80%85%E5%8B%BF%E9%80%B2-zdpuAqNS5wvZwSSSLo8YnPJehib9yYfSvPTuvkBeUVpw26YJi>

³⁵ 光榮飲食：〈即日起光榮飲食只招待香港人〉，Facebook（2020 年 1 月 27 日）：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80459973338239&id=116149449769292

³⁶ 〈即日起光榮飲食只招待香港人〉：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80459973338239&id=116149449769292

道大家不同種族吧？」³⁷不過顯然，歡迎台灣人，但不招待內地人，是國族問題而非語言問題。後來港漂學者黎明與其他港漂與香港人一伙七人相約了光榮冰室的店主，並帶同防疫物資光顧光榮冰室，希望當面溝通，但店主最後沒有出現，在部份行動者具備粵語溝通能力的情況下以普通話下單點餐，黎明和幾位同伴為此撰文，引來極大論爭。³⁸在此引此的辯論以香港人共同體為核心。論爭起源於鄧正健的文章〈族群不能自我封閉，但也不能自出自入〉認為黎明等人「以傲慢的姿態要求族群認同自己，但同時又以『被歧視的受害者』自居，進一步強化『香港人』和『大陸人』的對立想象」，並認為「新成員也應該學習適應原族群的文化，而不是動輒要求原成員作出改變來迎合自己，甚至指摘對方不願改變或改變太少，就是歧視（注意：這其實是官方推行中港融合的慣用手法）」。³⁹鄧正健主張黎明等人的做法是把自己拒絕融入偷換成「歧視」。不過他在行文之中未有檢討黃店的做法，如果我們回到黃店的初衷，是建立一個運動手足經濟上互相支持的社群，新移民手足在疫情突然被排除，鄧正健的文章也在於把「手足」為中心的黃色經濟圈，轉換成以「族群」為中心，合理化黃店的做法，只單向交代了黎明等人未有理解香港的歷史與情感構造，但也沒有解套新移民手足在部份黃店突然被排除的情感構造，這也涉及到香港新移民的長久被排除或自我保護的經驗，不能只用「玻璃心」就能解釋清楚。⁴⁰

部份討論直接把中國人直接視為「中國殖民者」，把他們的行動視為「放蛇」，「放蛇」一詞多用於擁有公權力者（如警察），喬裝成普通人，以便執法，⁴¹把講普通話視為

³⁷ 光榮飲食：〈今日收到平機會電話〉，Facebook（2020年2月14日）：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93985375319032&id=116149449769292

³⁸ 黎明：〈說著普通話，等待一個不曾謀面的人〉，《Matters》（2020年2月25日）：

<https://matters.news/@dearasuka/%E8%AA%AC%E8%91%97%E6%99%AE%E9%80%9A%E8%A9%B1-%E7%AD%89%E5%BE%85%E4%B8%80%E5%80%8B%E4%B8%8D%E6%9B%BE%E8%AC%80%E9%9D%A2%E7%9A%84%E4%BA%BA-bafyreibq7ugli4awn4epaf6wdfvubu5426azxdudep5dulrk6yfmukzi>。

³⁹ 鄧正健：〈族群不能自我封閉，但也不能自出自入〉，《Matters》（2020年2月25日）：

<https://matters.news/@chingkin/%E6%97%8F%E7%BE%A4%E4%B8%8D%E6%87%89%E8%87%AA%E6%88%91%E5%B0%81%E9%96%89-%E4%BD%86%E4%B9%9F%E4%B8%8D%E8%83%BD%E8%87%AA%E5%87%BA%E8%87%AA%E5%85%A5-bafyreibisizksabdkfwiiiaqy24suiw7vezs46bh22rtukcxqtpt73ua>

⁴⁰ 有關「港漂」群體的研究，可參考葉蔭聰對港漂的深度訪談。《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117-132.

⁴¹ 盧斯達：〈黎明狙擊光榮冰室，是打擊運動道德高地還是太沉迷自抬身價？〉，《立場新聞》（2020年2月28日）：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9%BB%8E%E6%98%8E%E7%8B%99%E6%93%8A%E5%85%89%E6%A6%AE%E5%86%B0%E5%AE%A4-%E6%98%AF%E6%89%93%E6%93%8A%E9%81%8B%E5%8B%95%E9%81%93%E5%BE%B7%E9%AB%98%E5%9C%B0%E9%82%84%E6%98%AF%E5%A4%AA%E6%B2%89%E8%BF%B7%E8%87%AA%E>

為官方推普的助力。⁴²港漂和新移民群體的複雜性大多沒有充份展開，包括體制條件、內部差異、情感結構，就因為語言、出身地和移民政策，直接將之視為中共的共謀者，落入一種固有的再現政治。但這些批評大多沒有充份展開黎明等人的田野經驗。在「普教中」等教育政策下，普通話確實被視為霸權語言，但事實上黎明的文章是試圖把語言視為生活工具，例如當中七人的「普通話」是來自雲南、上海和香港等不同口音，而不是官方標準的北京話，而且文中也強調語言不通並非點餐的困難，因為顧客還是可以調度身體語言。⁴³「放蛇」一說亦無視黎明一伙人最初跟店主相約，而非本著偷偷試探員工有沒有遵照規定的目的。

鄧正健在第二篇文章〈從光榮冰室事件看「香港人」共同體的想像〉，清楚提出「香港人」共同體是臨時的接合（articulation）：

左翼自由論者一般反對對「香港人」成員資格作嚴格定義，但若沒有任何資格或定義，顯然亦不符合社會現實經驗。因此，論者一般採取折衷辦法：「香港人」的定義變動不居，但並非全沒定義。而右翼本土論者則宣稱，必須按現實政治需要——即「香港人」作為一個被中共政治打壓的群體——以建立一套相對具體的共同體定義，以強化跟國家權力對抗的力量。如前所述，反修例運動的政治論述是由左右翼調和而成：共同體內部傾向左翼，但以右翼想像製作共同體邊界。兩者之所得以接合，實源於「不割席」這一原則。不過這一接合很大程度上由運動的集體情緒驅動，本身並不穩定。換言之，反修例運動中的「香港人」想像是一個臨時、策略性和權宜的構建。⁴⁴

鄧正健強調「集體情緒」的主導作用，「香港人」和「大陸人」的情感差異是最關鍵的落差。鄧正健提出的「情感政治」，對情感政治傾向正面肯定，沒有反思情感的運作亦有排他的可能。誠然，充份展開集體情感非常必要，但這裡始終沒有處理兩個群體的情感差異，新移民那一方是缺席的，沒有展開來。而兩種情感的衝突如何梳解，答案似乎就只由新移民一方努力貼近「香港人」的文化和情感，而非兩方的互相認識。不過正如上文提出〈我去了三家「只歡迎香港人」的餐廳吃飯〉的例子，部份新移民的手足有做出嘗試，光顧黃店，但過程中戰戰兢兢，深怕被認出自己不是「香港人」。鄂玫（Sara

[6%8A%AC%E8%BA%AB%E5%83%B9/](#)

⁴² 查映嵐：〈普通話·歧視·殖民〉，《立場新聞》（2020年2月27日）：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6%99%AE%E9%80%9A%E8%A9%B1-%E6%AD%A7%E8%A6%96-%E6%AE%96%E6%B0%91/>

⁴³ 〈說著普通話，等待一個不曾謀面的人〉：

<https://matters.news/@dearasuka/%E8%AA%AC%E8%91%97%E6%99%AE%E9%80%9A%E8%A9%B1-%E7%AD%89%E5%BE%85%E4%B8%80%E5%80%8B%E4%B8%8D%E6%9B%BE%E8%AC%80%E9%9D%A2%E7%9A%84%E4%BA%BA-bafyreibq7ugli4awn4epaf6wdfvubu5426azxdudep5dulrk6yfmuukzi。>

⁴⁴ 鄧正健：〈從光榮冰室事件看「香港人」共同體的想像〉，《端》（2020年3月1日）：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301-opinion-hk-identity-community/>

Ahmed) 在《情感的文化政治》(*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提供了批判的情感研究視野：雖然鄂玫的理論語境主要指向後 911 美國把有色人種視為國家安全威脅的存在，但在光榮冰室的語境仍有相當適切性。有別於把恐懼視為工具或癥兆，鄂玫把恐懼視為語言的運作，創造被威脅和威脅者的區分，恐懼是這個過程的效果，而非根源。⁴⁵ 她的思考建基於 Ulrich Beck 的觀點：在新的現代裡，連帶建基於不安(“insecurity”)，多於需要(“need”)，社群的約束力來自共同分享的危機。⁴⁶ 換言之，這涉及我們怎樣理解自身的歷史，以及那些作為恐懼的基礎是怎樣作為語言流通，「恐懼」一方面是限制特定身體(中國人或不被承認的香港人)的流動性；另一方面是形成一種對國族或國家安全(security)的需求，繼而成為連帶，成為一種「香港人的共同體」或「恐懼的共同體」。那怎樣解套兩方的衝突，必須是某一方的情感獲得優位性和正當性嗎？事實上情感政治不一定要把情感與身份認同綑綁，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戰爭的框架》(*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嘗試主張一種看待生命的另類框架——脆危性(precariousness)，即是說每個人都洞察到自己與他人(包括我們所不知道的他人)是相互依賴的關係，對他人的關心(care)是對他人的責任，先於我們對他人的認知，先於我們建立「我們」是誰。⁴⁷ 這樣的觀點在香港的語境或許會被視為「大愛左膠」，但在運動衝突現場裡手足之間無名的互相幫助，這種現場的手足之情或許可以如此理解(但也不適用於運動現場講普通話就被懷疑是警察臥底或建制派的手足)。光榮冰室的事件或者不能再使用無名的邏輯，但長遠來說我們或許可以嘗試走向另一個方向——「香港人」和「新移民」或「中國人」兩方更多的建立溝通，理解兩方的情感結構。

至於我們對特定群體的恐懼如何加深，部份主流媒體報導亦有相當助力，只將疫情的焦點放在出入境的中國內地人口。2月15日，一篇報導名為〈假強制真失守！檢疫令實施一周深圳灣入境人數不跌反升 1.65 倍〉⁴⁸ (簡稱〈假〉文)，同日另一家媒體則有一篇〈深圳灣非港人入境，較首日強制檢疫增 1.65 倍，入境者佔檢疫中 67% 宿位〉⁴⁹ (簡

⁴⁵ Sara Ahme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p.72.

⁴⁶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p.72.

⁴⁷ Judith Butler.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London: Verso, 2009. p. 13-15.

⁴⁸ 〈假強制真失守！檢疫令實施一周深圳灣入境人數不跌反升 1.65 倍〉，《蘋果日報》(2020年2月15日)：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20200215/6XY6PAHBR3WXP6C2DFNJWQY6IE/?fbclid=IwAR3Tmu3jP9aXfpfz9873qEjutOY67b3_2_WxniKRGemj36904_vorZNNvXg

⁴⁹ 〈深圳灣非港人入境 較首日強制檢疫增 1.65 倍 入境者佔檢疫中心 67% 宿位〉，《立場新聞》(2020年2月15日)：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E5%BC%B7%E5%88%B6%E6%AA%A2%E7%96%AB%E5%BE%8C%E5%85%A5%E5%A2%83%E8%80%85%E4%B8%8D%E6%B8%9B%E5%8F%8D%E5%A2%9E-%E6%B7%B1%E5%9C%B3%E7%81%A3%E9%9D%9E%E6%9C%AC%E6%B8%AF%E5%B1%85%E6%B0%91%E5%A2%9E-1-65-%E5%80%8D-%E5%85%A5%E4%BD%8F%E6%AA%A2%E7%96%AB%E4%B8%AD%E5%BF%83%E4%BD%94-67->

稱〈深〉文)。(假)文這篇報導乍看標題，會以為比較基準是檢疫令實施前後，但〈深〉文則有明言「較首日增 1.65 倍」。(假)文對入境人次的報導，幾乎只以內地訪客為主體，而不是以經中國入境所有國籍旅客和本地人為統計考量：

翻查過去一周的入境數字，經機場、港珠澳大橋及深圳灣入境的中國訪客仍有約 5700 人次；而經深圳灣入境的訪客，除檢疫令實施的首日稍為下降，其後入境人數更每日增加，較實施首日人數大升 1.65 倍。⁵⁰

比較之下，〈深〉文報導相對持平：

惟根據入境處公布的數字，除了政策實施首兩日外，經深圳灣入境的本地和非本地人，都持續上升；其中非本地居民經深圳灣入境，由實施首日的 46 人，升至前日的 122 人，增 1.65 倍；本港居民人數亦由 208 人，增至昨日的 770 人，升幅達 2.7 倍。截至昨日，本港共有 101 名入境者入住檢疫中心，惟本港現有 4 個中心僅提供 150 個宿位，已佔宿位 67%。⁵¹

〈深〉文的報導同時涵蓋經中國入境香港居民的人數升幅，比非本地居民更多；而描述非本地居民入境人數主要是表達對檢疫空間的憂慮。

不過，我們只用 1.65 倍這個基準是否恰當？畢竟這裡只是隨意地以深圳灣 2 月 8 日和 2 月 13 日兩天作比較基準。下圖為筆者嘗試根據同樣的素材——香港入境事務處出入境人次統計數字（只有 1 月 24 日開始的數據，整理至 2 月 22 日），整理出入境限制與經中國入境的訪客人次的全貌。香港入境事務處本來的數字分為 15 個出入境口岸，訪客分為「香港居民」、「內地訪客」、「非香港居民」三種，並無訪客到港目的的資料，亦沒有以過去 14 日的中國旅遊史為基準的數據可供參考。不過姑且以這個數據做統計，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每次落實關閉口岸，入境人次有顯著下降，我們應以一階段的數字總值和平均值作指標，而非選取極端數據，以戲劇化我們想要呈現的數字。附錄一以不同顏色標示不同措施影響下，不同時期的入境人次。補充一個背景，根據香港旅遊發展

[%E5%AE%BF%E4%BD%8D/](#)

⁵⁰ 〈假強制真失守！檢疫令實施一周深圳灣入境人數不跌反升 1.65 倍〉：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20200215/6XY6PAHBR3WXP6C2DFNJWQY6IE/?fbclid=IwAR3Tmu3jP9aXfpfz9873qEjutOY67b3_2_WxniKRGemj36904_vorZNNvXg

⁵¹ 〈深圳灣非港人入境 較首日強制檢疫增 1.65 倍 入境者佔檢疫中心 67% 宿位〉：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E5%BC%B7%E5%88%B6%E6%AA%A2%E7%96%AB%E5%BE%8C%E5%85%A5%E5%A2%83%E8%80%85%E4%B8%8D%E6%B8%9B%E5%8F%8D%E5%A2%9E-%E6%B7%B1%E5%9C%B3%E7%81%A3%E9%9D%9E%E6%9C%AC%E6%B8%AF%E5%B1%85%E6%B0%91%E5%A2%9E-1-65-%E5%80%8D-%E5%85%A5%E4%BD%8F%E6%AA%A2%E7%96%AB%E4%B8%AD%E5%BF%83%E4%BD%94-67-%E5%AE%BF%E4%BD%8D/>

局的數字，2019年12月的內地旅客人次為2398232，⁵²由於沒有每日人次，取每日平均值為每日超過70000人次，1月24日是湖北封城，而內地疫情消息已四通八達，內地訪客人次已顯著下跌。另外有幾個簡單的觀察：首先檢疫實施後每天中國內地訪客人次已經不過一千，另外是每天中國內地訪客人次與非本港居民經中國入境的數字開始拉近和相若，最後是1月24日以來絕大部份日子，經中國入境的香港居民佔很大部份。由此回到〈假〉文的報導，雖然入境處的數據明顯地無法好好呈現旅遊史和旅遊目的，但媒體在使用數據的時候就沒有作出恰當的解釋。這裡並不是說港府的邊境控制和防治措施不應被檢討，而是提出另一個檢視的面向：入境人次的數據被刻意選取，並且以中國訪客為焦點，而非以旅遊史為框架，人數遠遠較多的香港居民則刻意被忽略，用來鞏固大家對於「局部封關」的不滿，造成大家更多的恐懼和憤怒。

（三）在中國內地的香港人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香港跨境勞動人口（包括中國內地、澳門和台灣）共92725人，佔勞動人口2.5%，其中在中國內地工作人口達82531人。⁵³而按照2019年發表的香港人口臨時數字，2019年年中，常住居民佔7310100人，流動居民佔214000人。⁵⁴目前無法從出入境數字得知具體跨境勞動人口數字，僅以上述數字作參照。然而，在醫護罷工訴求裡，要求從內地回港的香港居民接受14天檢疫，就沒有言明到底應否包括這些跨境工作者；香港政府在2月8日實施的從內地過境人士強制檢疫，將部分類別人士（例如跨境貨車司機）豁免強制檢疫，只接受醫學監測，以免影響日用品從內地輸港，或許是默許這種物流的必要性，這項措施未有爭議。⁵⁵除了少數

⁵² 〈2019年12月訪港旅客統計 Monthly Report - Visitor Arrival Statistics : December 2019〉，《香港旅遊發展局：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common/images/about-hktb/pdf/tourism_stat_12_2019.pdf

⁵³ 最新的《香港統計月刊》在2020年1月出版，但不包括跨境勞動人口數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中間五年進行一次中期人口統計，2016年後下一次統計為2021年，因為此數字為現時於香港政府統計數字裡最近期的資料。數字取自《2016中期人口統計》：

<https://www.byensus2016.gov.hk/tc/bc-mt.html>（瀏覽日期：2020年2月5日）。

⁵⁴ 「常住居民」指兩類人士：（一）在統計時點之前的六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三個月，又或在統計時點之後的六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三個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不論在統計時點他們是否身在香港；及（二）在統計時點身在香港的香港非永久性居民。對於不是「常住居民」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他們在統計時點之前的六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一個月但少於三個月，又或在統計時點之後的六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一個月但少於三個月，不論在統計時點他們是否身在香港，會被界定為「流動居民」。參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統計處新聞稿：

https://www.censtatd.gov.hk/press_release/pressReleaseDetail.jsp?charsetID=2&pressRID=4478（瀏覽日期：2020年2月5日）。

⁵⁵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強制檢疫措施順利落實〉，《新聞公報》（2020年2月9日）：

左翼媒體提議香港政府的防疫基金應給予受影響跨境工作人士生活津貼，⁵⁶跨境勞動人口在這次封關的訴求和討論裡幾近缺席。

另一個不被承認的香港人群體是滯留中國內地（主要是湖北）的香港人。目前約有2500人身在封城中的湖北，尚未獲港府安排接送回港。⁵⁷港府稱收到600個個案求助，但仍在評估他們回港安排。⁵⁸這個群體當時未獲太多媒體注意。RTHK 香港電台《鏗鏘集》團隊於2月10日發佈一集長21分鐘的紀錄片〈封城〉，攝製團隊聯絡了當地居民和香港人，邀請了他們拍攝封城的日常，再剪輯成這部紀錄片。⁵⁹在片段裡，分別採訪三位不同背景的人：第一位是化名「李先生」的港人，因春節舉家到湖北探親，翌日封城未能離開，因長期病患和藥物已消耗完，李先生不斷聯絡香港入境處和駐武漢辦，亦得不到生活和藥物支援，唯有向香港區議員求助。第二位是化名「阿藍」的居武漢港人，在武漢有居所和女朋友，沒有要求要回香港，片段中亦對中國處理疫情手法大表讚賞，其愛國主義的措辭惹來大量批評。第三位是在港唸大學的內地生，春節期間沒有回內地，與身處武漢的朋友時有聯絡，訪問裡批判中國政府打壓言論自由。

比起節目內容，更有意思是觀察觀眾如何接收內容。這一集分別在「鏗鏘集」臉書粉專（以上下兩集分別發表）⁶⁰和 Youtube 頻道發放，在臉書裡沒法顯示點擊率，但下集共有11000人按下表情，有6900個分享，在 Youtube 頻道有85萬點擊率，觸及率頗高。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2/09/P2020020900683p.htm>

⁵⁶ 〈抗疫基金齋快唔夠〉，《夜貓》（2020年2月15日）：

<https://www.facebook.com/theowlhk/photos/a.616735485203044/1196984963844757/?type=3&theater>

⁵⁷ 〈梁美芬促接湖北港人回港 滯留港人：公安稱需港府「邀請函」，才可返港〉，《立場新聞》（2020年2月21日）：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E6%A2%81%E7%BE%8E%E8%8A%AC%E4%BF%83%E6%8E%A5%E6%B9%96%E5%8C%97%E6%B8%AF%E4%BA%BA%E5%9B%9E%E6%B8%AF-%E6%BB%AF%E7%95%99%E6%B8%AF%E4%BA%BA-%E5%85%AC%E5%AE%89%E7%A8%B1%E9%9C%80%E6%B8%AF%E5%BA%9C-%E9%82%80%E8%AB%8B%E5%87%BD-%E6%89%8D%E5%8F%AF%E8%BF%94%E6%B8%AF/?fbclid=IwAR2_Cdt4647Kd1bTMsmIIMdHcAkYkTXqyxf--N5VQsm9TT-nNqVgdUHO1A

⁵⁸ 〈審慎評估在湖北港人返港安排〉，《香港政府新聞網》（2020年1月31日）：

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1/20200131/20200131_174249_226.html?type=category&name=wuhan&tl

⁵⁹ RTHK 香港電台：《鏗鏘集：封城》，Youtube（2020年2月10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wsD9xpY7X0&feature=youtu.be&fbclid=IwAR0WjC5mIo8WZPnLC4O845x0hHwKXKtLA0eCsOMsJpflxIst4H3ihnnvhd8>

⁶⁰ RTHK 香港電台：《鏗鏘集：封城》（第二節），Facebook（2020年2月10日）：

<https://www.facebook.com/rthk.HKConnection/videos/568366404020565/>

綜合 5268 則留言內容，主要有幾種討論：一、諷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部份暗示毋須如外國撤僑，部份批判香港主權問題。二、諷刺回內地港人要相信黨國，留在當地不用擔心。三、從受訪者用語和回鄉舉動懷疑受訪者為新移民（但事實上難以判斷，李先生在片段中的普通話有很重的粵語口音）。四、批評在湖北香港人未有評估北上的風險，須後果自負，與人無尤。五、不要回港傳染香港人，在中國香港人患肺炎完全是活該。在此，被認為是「藍絲」和「新移民」都是被排除的人，前者是不分出身地、支持政府的建制派或愛國派，後者在入境政策裡是指向在香港還沒住滿七年的移民（七年期滿成為香港居民），但日常語境通常沒法辨認對方是否永久居民，更多是一種成見：文化、語言未融入香港，以及霸佔香港福利和資源的基層中國內地移民，這個印象自然不包括由高學歷和高薪的專才，亦不包括由中國以外的地方的移民。對於疫症沒有與香港大眾相同程度的恐懼或選擇北上的香港居民，以地理疆域來劃定政治忠誠，被排除在香港人的共同體。

五、結語

本文認為，是次疫情與工會化本來打開了新的潛力和空間，讓反修例運動在主權議題以外串連勞工條件、經濟實踐、公共衛生資源與政策等社會議題，這些討論與實踐儘管一直零星存在，但多年以來不曾進入香港主流的視野。疫情亦讓民間發揮互助精神，亦讓不同基層更多在主流社會被看見，例如清潔工、麥難民等等。

不過本文希望點出「封關」運動裡值得再三思考的地方。筆者認為，即使反修例運動整體而言有很明顯的主調——民主化、主權、反國家暴力，但從細部來看，反修例運動參與者的論述往往龐雜紛亂，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麼一致。從以上封關討論的初步梳理之中，暫緩入境的對象似乎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共識，歧義讓我們具體看到不同可能性，哪些方向有走向比較基進的潛力，哪些方向較為值得警惕。本文第一部份從宏觀層次梳理中港的心理邊界的歷史發展，以及在疫情中邊境管制如何政治化；第二部份回到比較微觀的層次，回顧封關論述，醫護在罷工討論過程之中有逐步調整他們所主張暫緩入境對象，部份黃店、媒體和民間的具體實踐有兩個傾向更為值得警惕和再三深思：首先是把出身地與國族認同直接等同，是為管理人口流動的治理的意志；另外是把地理疆域與政治忠誠直接等同，而非公民身份的法律、社會經濟面向。

在此稍稍引伸回應 1 月初彭麗君建基於疫情之前的運動觀察，在〈人民作為一種修辭？——香港「反逃犯條例運動」中的民主與身份認同〉裡評論道：「實際上，這次運動也生成一種並不需要在文化或者生理上與香港相關的所謂『精神香港人』」，⁶¹並認為

⁶¹ 彭麗君：〈人民作為一種修辭？——香港「反逃犯條例運動」中的民主與身份認同〉，「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工作論文」，ISSN 2707-2193，ICCS WPS 18，https://iccs.nctu.edu.tw/en/wps_one.php?USN=21，頁

「此處的『香港人』這一詞彙僅僅是一個比喻、或表演，它所指的並非一群由血緣或歷史界定的人群，而是抗爭和政治參與的象徵。有鑑於此，我樂觀地相信，本地人和大陸人之間原本的社會斷裂可以通過政治聯結得到緩解和重建，因為這次運動是由政治行動和判斷所界定的，而非出身或居民身份。」⁶²「精神香港人」的潛力在於鬆綁已經頗為牢固的地理疆域等同政治身份的思維。我們自然而然把「共同體」想像為平等與多元的連結，不過精神香港人共同體的界線是臨時和脆弱的，中國內地手足位居共同體的邊緣，內地手足似乎符合更多標準才能成為手足，例如在參與運動以外，要講流利的粵語，要對香港的文化有很充份的認識，要「融入」「香港社會」。儘管抗爭者以香港人為主，共同體是否可以不只以族群為中心，而是以民主化為中心，使共同體之內亦真正的認識不同背景的手足，在民間層次達至國際連結？本文嘗試從疫情裡部份黃店的封關回應這個部份，指出中國內地人參與「精神香港人」的困難，但更多田野調查和訪談才能更充份和完整呈現整個反修例運動，回應這個問題。

本文觸及的第二個問題意識是主權。一國兩制空間的大幅收縮，以及北京政府否定全民普選的決定，都讓香港民主化運動愈來愈趨向主權的訴求。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反思，國家主權是否唯一和最終民主化運動訴求的價值？這又是否意味中港民間必然要落入敵對關係？這個議題已經有一些討論，例如彭麗君則為邊界問題提出一種去國家化的民主與多重主權的政治方案。主權基本上是劃一的，與國家綁在一起，她認為我們無須為了捍衛民主和自主而訴諸主權，民主實踐不必然只集中於一個體制（institution），而是在多個層次上發展，最終我們可以把邊界想像成「城市」，而非「民族國家」。⁶³筆者對此問題未有定案，但運動內部的民主與少數是需要持續關注的問題。

附錄一

我的整理方法如下：香港居民和非本港居民的總人次扣掉機場和港口管制入境人次，內地訪客則以所有口岸總數計算。整理這些數字時，有以下誤區，以致必然無法準確得出自中國入境的具體人數：

1. 香港居民和其他訪客數字排除機場的人次，機場的人士可以從很多地方入境，前者或有從內地往香港航空班次，在此無法估算，所以香港居民和其他訪客可能有低估。
2. 香港居民和其他訪客的數字連同港澳客輪碼頭和港珠澳大橋，未能判定港澳客輪碼頭或港珠澳大橋是否先經內地入境澳門，後者可以以聯遊方式入境珠海或只入境澳門，這數字有機會被高估，但隨著2月4日口岸只剩三個，港珠澳大橋

6。

⁶² 〈人民作為一種修辭？——香港「反逃犯條例運動」中的民主與身份認同〉，頁6。

⁶³ *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p.136.

入境人次極少，這數字就影響不大。

3. 內地訪客包括機場數字，但內地訪客有機會從中國以外地入境中國，以旅遊史的準則，這數字有機會被高估。

4. 由於以人次計算，在羅湖、落馬州、港珠澳大橋等口岸的人數未必等同人次，即是說，一個人可能同日出入境超過一次。這些人口可能包括水貨客。2月4日強制檢疫後，大部份人不能即日來回數字，但跨境貨車司機等部份訪客或香港居民不在此限。

日期	香港居民	內地訪客	其他訪客	非本港居民	總計	港人%	非港人%	內地人%	備注
24/1	81932	36705	8497	45202	127134	64.45%	35.55%	28.87%	年初一
25/1	71508	29891	8135	38026	109534	65.28%	34.72%	27.29%	年初二
26/1	141022	36690	8929	45619	186641	75.56%	24.44%	19.66%	年初三
27/1	141186	28780	6020	34800	175986	80.23%	19.77%	16.35%	年初四補假 限制湖北居民或經湖北入境
28/1	134280	24156	4792	28948	163228	82.27%	17.73%	14.80%	中國內地停發個人遊簽證
29/1	147280	27780	5086	32866	180146	81.76%	18.24%	15.42%	
30/1	86291	19555	3263	22818	109109	79.09%	20.91%	17.92%	高鐵西九龍站、紅磡站口岸、沙頭角和文錦渡口岸、中國客運碼頭和屯門客運碼頭口岸開始暫停運作。

31/1	67449	16058	2838	18896	86345	78.12%	21.88%	18.60%	
1/2	59146	13382	5133	18515	77661	76.16%	23.84%	17.23%	
2/2	63316	11715	2637	14352	77668	81.52%	18.48%	15.08%	
3/2	69825	13461	2639	16100	85925	81.26%	18.74%	15.67%	
4/2	23643	9511	1808	11319	34962	67.62%	32.38%	27.20%	羅湖鐵路、落馬洲支線鐵路、落馬洲皇崗、港澳碼頭四個口岸停止運作。
5/2	19734	8760	1866	10626	30360	65.00%	35.00%	28.85%	
6/2	43861	11009	2408	13417	57278	76.58%	23.42%	19.22%	
7/2	57205	12746	2781	15527	72732	78.65%	21.35%	17.52%	
8/2	867	995	511	1506	2373	36.54%	63.46%	41.93%	強制檢疫14天開始實施。首批檢疫人數共663人。
9/2	2862	956	529	1485	4347	65.84%	34.16%	21.99%	
10/2	1269	832	500	1332	2601	48.79%	51.21%	31.99%	
11/2	1290	738	462	1200	2490	51.81%	48.19%	29.64%	
12/2	1571	729	2132	2861	4432	35.45%	64.55%	16.45%	
13/2	1692	751	520	1271	2963	57.10%	42.90%	25.35%	
14/2	2261	683	550	1242	3503	64.54%	35.46%	19.50%	

15/2	1992	791	531	1322	3314	60.11%	39.89%	23.87%	
16/2	1903	749	471	1220	3123	60.93%	39.07%	23.98%	
17/2	2242	643	492	1135	3377	66.39%	33.61%	19.04%	
18/2	2315	579	589	1168	3483	66.47%	33.53%	16.62%	
19/2	2189	567	501	1068	3257	67.21%	32.79%	17.41%	
20/2	3279	648	594	1242	4521	72.53%	27.47%	14.33%	
21/2	4736	682	689	1371	6107	77.55%	22.45%	11.17%	
22/2	4344	651	650	1301	5645	76.95%	23.05%	11.53%	

「黃幫襯，藍罷買」——「黃色經濟圈」的運作邏輯與內部矛盾

鄒文君

摘要

從「黃色經濟圈」建立以來，各方討論及批評不絕，而黃色經濟圈的概念及實踐卻愈見豐富，成為反修例運動中另一條重要戰線。本文認為，針對黃色經濟圈的評價，必須先懸置宏大論述的批評框架，而具體進入其生成脈絡中加以察看。黃色經濟圈的運作離不開反修例運動背後的道德及倫理準則，黃／藍政治立場區分出各自的經濟行為，也區分出彼此的敵我關係。當黃色經濟圈進入市場經濟後，運動原則會對黃店形成道德制約，也反映出運動邏輯與市場邏輯之間存在著內部矛盾。最後，本文認為黃色經濟圈原本將補足抗爭現場的時空局限，擴建及鞏固社會關係，然在香港爆發新冠疫情後，愈來愈緊張的社會及政治氛圍卻再度對黃色經濟圈造成新的制約，使社會連結或區隔的發生，不再只以政治立場為唯一區分條件，卻加入國籍或語言等其他細項，使反修例運動、黃色經濟圈乃至「香港人共同體」似乎都出現了愈來愈狹窄的發展傾向，值得深思。

關鍵字：反修例運動，黃色經濟圈，道德倫理，市場邏輯，消費，身分認同

一、引言

自去年（注：2019年）6月初香港反修例運動以來，至今已近一年。從抗爭現場到日常生活的街頭巷尾，支持及反對這場運動的人各自分成黃／藍兩大陣營，勢成水火，政治立場取向儼然成為了當代香港新的「道德律令」（moral imperative），時刻影響著雙方成員的思考、表態及行動，同時亦在各自陣營內部形成新的動態。在反修例運動中，大部分的抗爭者雖非主要受經濟誘因驅動，隨著運動逐漸發展成長期抗爭，「經濟」卻成為一個愈來愈重要的面向：如何能令運動得到足夠的資源，持續下去？因運動而失業失學的前線年輕人，如何令他們得到溫飽？在政治抗爭之外，香港人還可以在哪些領域取得自由，打擊對手？

「黃色經濟圈」便是在以上脈絡下生成的關鍵概念，有助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切入理解香港反修例運動。在 Google 或 Facebook 用「黃色經濟圈」或「黃店」作搜尋，可以找到數以百個搜尋結果，提供我們以香港各區的「黃店地圖」；在街道上行走，亦不難

發現貼著各色抗爭海報、連儂牆，以及「米豬連」貼紙——來自反修例運動中抗爭者的立場認證——的餐廳或店鋪，向顧客公開昭示自身的政治立場，以便持相同立場者安心地內進「幫襯」（注：「光顧」義）。黃色經濟圈的概念，可以回溯至 2014 年雨傘運動中的「撐小店」行動，⁶⁴但當時規模未如眼前龐大。有關黃店的普遍認證，最早來自 2019 年 8 月 5 日反修例運動中首次「三罷行動」（注：罷工、罷課、罷市），運動支持者在各區辨別該區商家有否響應支持罷工，因而判定其政治立場，認明敵我；「到黃店消費」又被抗爭者戲稱為「懲罰黃店」，實際上含有鼓勵及感謝店家的意味，也演變成抗爭者對自身及同路人的基本要求：即使未有能力衝上抗爭前線，反抗暴力而成為「勇武」，至少也需要在後方以人力、財力或物力，盡可能地支援同路人。

與黃店相對的，則有「藍家商家」（指反對運動、支持香港政府或警察者）及「紅色資本」（指具有中國背景的商家）。有論者指出，回歸前後，香港的新興資產階級已被中國「收編」，十多年來在香港建立出「藍色經濟圈」；⁶⁵來自中國的資本亦漸漸在香港經濟市場中佔有愈來愈重要的份額。由是，與黃色經濟圈的發展平行，運動初期已有抗爭者發起罷買藍店、杯葛紅店等行動，影響力日益增長。如香港最大的免費電視台「無線電視」（TVB）被指新聞報導有失偏頗，在抗爭者的壓力下，多家公司宣佈暫停投下廣告，TVB 的收視率屢創新低。⁶⁶又如在美心集團創辦人長女伍淑清公開批評運動後，美心集團旗下食肆多次變成「罷買」對象，生意嚴重受創。⁶⁷在罷買風潮外，亦有零星出現陣地戰般的、對個別藍店或紅店進行戲稱「裝飾」或「裝修」等破壞行為；另一邊廂，黃店也有被破壞的例子，亦有抗爭者認為政府或政治對手會刻意針對黃店，包括經營牌照不予續約，⁶⁸或遭食環署職員刻意針對等。⁶⁹無論針對哪一方，破壞行為都在社會引發不少爭論，抗爭者內部似乎未有共識，並未進一步擴大「裝修」的行動規模；在 2019 年

⁶⁴ 如「佔領撐小店」Facebook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occupysupportsshops/>。

⁶⁵ 方志恆：〈要講黃金經濟圈，必先理解中國在港建立多年的「藍色經濟圈」〉，《The News Lens》（2020 年 1 月 17 日），資料來源：<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0208>。

⁶⁶ 〈【收視滯後報告】星期日收視跌至個位數 遊行示威直接有影響〉，《香港 01》（2019 年 7 月 23 日），資料來源：

<https://www.hk01.com/%E5%8D%B3%E6%99%82%E5%A8%9B%E6%A8%82/355274/%E6%94%B6%E8%A6%96%E6%BB%AF%E5%BE%8C%E5%A0%B1%E5%91%8A-%E6%98%9F%E6%9C%9F%E6%97%A5%E6%94%B6%E8%A6%96%E8%B7%8C%E8%87%B3%E5%80%8B%E4%BD%8D%E6%95%B8-%E9%81%8A%E8%A1%8C%E7%A4%BA%E5%A8%81%E7%9B%B4%E6%8E%A5%E6%9C%89%E5%BD%B1%E9%9F%BF>。

⁶⁷ 〈【抗暴之戰】摧毀美心 200 億生意的女人 伍淑清最新持股曝光 一年袋 457 萬息〉，《蘋果日報》（2019 年 10 月 17 日），資料來源：

<https://hk.appledaily.com/finance/20191016/7SX7ST4EZWSSCLGQ4EWAZ5JKY/>。

⁶⁸ 如「連登討論區」在 2020 年 1 月 17 日的討論，見：<https://lihkg.com/thread/1827327/page/1>。

⁶⁹ 如「連登討論區」在 2020 年 4 月 12 日的討論，見：<https://lihkg.com/thread/1969129/page/1>。

12 月底香港作家梁文道公開指出對抗爭者「裝修」藍店紅店等行為的不理解後，⁷⁰再度
在抗爭者之間引起熱議。總而言之，黃色經濟圈的出現是建基於社會上因政見分歧而出
現的黃／藍對立，背後有一個「零和遊戲」的前提：黃色經濟圈愈壯大，對方（藍色商
家及紅色資本）則會被削弱，反之亦然。

除了具體的消費及罷買行為外，黃色經濟圈的概念也為反修例運動打開了新的想像
空間，例如「黃店互助」、「黃色貨幣」、「黃色社區」，甚至「黃綠經濟圈」等構想，雖
在論述及思考上尚未完善，卻的確將「經濟」帶入反修例運動的討論中心，隱隱指向對
香港未來的另類想像。隨著黃色經濟圈的壯大，從 2019 年 12 月起，亦相繼有香港政府
官員、⁷¹親中傳媒⁷²以及商人⁷³等對黃色經濟圈作出批評，認為它「畫地為牢」，剝奪了香
港人的自由選擇，也破壞了香港的社會及經濟秩序，如同黑社會所為；至 2020 年 5 月，
中聯辦亦發出聲明，回應反修例運動支持者發起「五一黃金週」支持黃店經濟，指責黃
色經濟圈是「人為製造社會撕裂」，並以政治綁架經濟，屬於「政治攪炒」。⁷⁴除此之外，

⁷⁰ 梁文道：〈即便到了最後，現實和常識的必要〉，《香港獨立媒體》（2019 年 12 月 29 日），資料來源：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9597>。

⁷¹ 如〈邱騰華質疑黃店大排長龍能否持續 「邊啲人去分邊間係黃藍？」〉，《香港 01》（2019 年 12 月
17 日），資料來源：
<https://www.hk01.com/%E6%94%BF%E6%83%85/411115/%E9%82%B1%E9%A8%B0%E8%8F%AF%E8%B3%AA%E7%96%91%E9%BB%83%E5%BA%97%E5%A4%A7%E6%8E%92%E9%95%B7%E9%BE%8D%E8%83%BD%E5%90%A6%E6%8C%81%E7%BA%8C-%E9%82%8A%E5%95%B2%E4%BA%BA%E5%8E%BB%E5%88%86%E9%82%8A%E9%96%93%E4%BF%82%E9%BB%83%E8%97%8D>。

⁷² 如〈親中傳媒連發三社評 轟「黃色經濟圈」黑社會行徑 「黃店」主人涉違法〉，《立場新聞》
（2019 年 12 月 30 日），資料來源：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8%A6%AA%E4%B8%AD%E5%82%B3%E5%AA%92%E9%80%A3%E7%99%BC%E4%B8%89%E7%A4%BE%E8%A9%95-%E8%BD%9F-%E9%BB%83%E8%89%B2%E7%B6%93%E6%BF%9F%E5%9C%88-%E9%BB%91%E7%A4%BE%E6%9C%83%E8%A1%8C%E5%BE%91-%E9%BB%83%E5%BA%97-%E4%B8%BB%E4%BA%BA%E6%B6%89%E9%81%95%E6%B3%95/>。

⁷³ 如施永青：〈「黃色經濟圈」的政治功效〉，《am730》（2019 年 12 月 3 日），資料來源：
<https://www.am730.com.hk/column/%E6%96%B0%E8%81%9E/%E3%80%8C%E9%BB%83%E8%89%B2%E7%B6%93%E6%BF%9F%E5%9C%88%E3%80%8D-%E7%9A%84%E6%94%BF%E6%B2%BB%E5%8A%9F%E6%95%88-198683>。

⁷⁴ 〈中聯辦譴責五一假期「違法聚集」 批「黃色經濟圈」政治綁架經濟〉，《立場新聞》（2020 年 5 月
2 日），資料來源：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4%B8%AD%E8%81%AF%E8%BE%A6%E8%AD%B4%E8%B2%AC%E4%BA%94%E4%B8%80%E5%81%87%E6%9C%9F-%E9%81%95%E6%B3%95%E8%81%9A%E9%9B%86-%E6%89%B9->

也有左翼聲音批評黃色經濟圈缺乏後冷戰思維及階級視角，只是一種極端右翼民族主義的、向本地及跨國資本的臣服之舉。⁷⁵

從以上各方的討論及批評，可以延伸思考：在反修例運動中，怎麼樣的道德、政治及經濟準則，使「黃幫襯、藍罷買」變成重要的抗爭行為，甚至運動原則？當黃店進入市場經濟運作後，它們期望對反修例運動及抗爭者產生怎麼樣的支持，在實質操作時又將遇上甚麼的道德、政治及經濟困難？黃色經濟圈的具體運作，以及其所想像的集體生活藍圖，本來有助鞏固乃至擴建新的「香港人共同體」。正當反修例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2020年初的香港，意外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首當其衝。在抗爭者還未辨清疫情將打擊運動、抑或為運動打開另一扇窗時，「防疫」問題卻在黃色經濟圈內部翻起若干風波。這些風波又為我們折射出黃色經濟圈在發展上面對著哪些局限？下文將試圖從經濟人類學的角度出發，就目前筆者對黃色經濟圈一些現象的觀察，探問黃色經濟圈的運作邏輯以及內部矛盾。

二、道德經濟與抗爭

從傳統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出發，「階級」是最重要的經濟分析視角。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全球擴張，客觀的政治經濟結構決定了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在生產場域的價值剝削，工人階級卻受限於其「虛假意識」，未能覺察自己的階級處境，因而未有作出反抗，在政治及經濟場域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或不能理解為何香港反修例運動所建立的黃色經濟圈，卻仍然採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運作模式，甚至有抗爭者將李嘉誠等不反對運動的資本家旗下的商店劃分成黃店，認同資本家對運動的支持。的確，把「階級分析」的視角帶回運動有其貢獻：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雖非直接促成反修例運動的主因，社會中的經濟不公義早已潛伏於既有的政治經濟結構之中。但若然只採用此視角，卻忽視黃色經濟圈形成及運作的具體脈絡，恐將出現焦點錯置——正如中央政府不斷嘗試以經濟問題解釋、乃至遮蔽香港的政治問題一般。

許寶強在〈黃色不止政見 經濟也是良知〉一文提及，黃藍經濟圈的建立基本上是「用政見或道德來區分經濟」。⁷⁶在經濟人類學的經典議題「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

<https://international-online.org/2020/02/24/yellow-economy/>。

<https://international-online.org/2020/02/24/yellow-economy/>。

⁷⁵ 顧云：〈「黃色經濟圈」所謂何事？〉，《國際》（2020年2月24日），資料來源：<https://international-online.org/2020/02/24/yellow-economy/>。

⁷⁶ 許寶強：〈黃色不止政見 經濟也是良知〉，《明報》（2020年2月24日），資料來源：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6%91%98/article/20200224/s00022/1582451284929/%e9%bb%83%e8%89%b2%e4%b8%8d%e6%ad%a2%e6%94%bf%e8%a6%8b->

中，亦見相關討論。當傳統左翼學者關心「工人階級為何不革命」的同時，人類學家感興趣的卻是「為何個人或社群會作出特定的經濟行為」，以及「該行為背後是按何標準來作判斷」的問題。在 E. P. Thompson 及 James Scott 各自考察工人及農民革命時，皆提及「道德共識」之於經濟的作用，也就是說，最終使工人或農民決定集體反抗的，不是源於「剝削」這一客觀事實，而是因為特定的工人或農民社群成員之間，自有一套理念及價值體系，對所謂「對或錯」、「(經濟上的)公義」有一套共通的定義，以及不可被挑戰的道德底線。當這些定義及底線遭到徹底破壞後(例如農民最為看重的「安全至上」生存原則變得不再可能)，反抗才會發生。也就是說，個人或社群的主觀意識，與客觀的政治經濟結構，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共同組成反抗的動機及行為。

進一步區分，如果「良知」(conscience)及「道德」(morals)更多指涉個人反思對與錯、善與惡的內在動機及行為結果，「倫理(ethics)」則涉及與特定社會或社群相關的、外來的行為準則。是以經濟人類學談經濟，除了關心個人道德，也涉及社會倫理。在反修例運動中，「良知」、「道德」等用語時而掛在抗爭者嘴邊，演變成一種舉足輕重的運動動員工具：它們為被動員者決定了其「應然的政治立場」及「應然的行動」。隨著政府對運動及異見人士的打壓愈深，警暴問題日益嚴峻，「良知」及「道德」更成為「新香港人」的自我／互相界定標準，因而在抗爭者(以及其反對者)之間形成全新的倫理及社會關係——在運動中常見抗爭者以「手足」之名相互稱呼，則為一例。同理可推，在黃色經濟圈的運作邏輯中，支持黃店(對的、善的)和罷買藍店紅店(錯的、惡的)，背後同樣含有相同的道德及倫理準則。這或許也解釋了黃色經濟圈被人詬病階級意識不足的基本原因：經濟剝削不是香港人作出政治抗爭的最主要動機；失去的(作為底線的)法治、自由以及尊嚴才是。

以政見或道德區分經濟，在標準上卻容易出現問題：我們要如何區分黃／藍？延伸追問，若表面證據足以讓我們區分基本立場，那麼「程度之分」——誰是所謂「真黃」、誰是所謂「偽黃」——又該如何處理？孔誥烽也提及過建立「黃藍認證機制」是黃色經濟圈一大關鍵，⁷⁷背後亦有「必須分辨立場之真偽」意味。有關「誰夠／不夠黃」、甚至「鬥黃」風潮，近日亦多有討論。有推動黃色經濟圈的 Facebook 專頁特此提醒抗爭者，希望不要將焦點放於「誰比誰在運動上更有貢獻」，而是專注在經濟方面支持同路人、杯葛持相反立場者。⁷⁸在運動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這套道德及倫理準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鑲嵌於特定的政治經濟結構及社會關係之中；當運動支持者與反對者以黃／

[%e7%b6%93%e6%bf%9f%e4%b9%9f%e6%98%af%e8%89%af%e7%9f%a5%ef%bc%88%e6%96%87-%e8%a8%b1%e5%af%b6%e5%bc%b7%ef%bc%89](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9%BB%83%E8%89%B2%E7%B6%93%E6%BF%9F%E5%9C%8E%5%8F%AF%E8%A1%8C%E8%80%8C%E5%BC%B7%E5%A4%A7/)。

⁷⁷ 孔誥烽：〈黃色經濟圈可行而強大〉，《立場新聞》(2020年1月1日)，資料來源：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9%BB%83%E8%89%B2%E7%B6%93%E6%BF%9F%E5%9C%8E%5%8F%AF%E8%A1%8C%E8%80%8C%E5%BC%B7%E5%A4%A7/>。

⁷⁸ 如「黃色經濟戰隊」在2020年4月28日的Facebook專頁貼文，見：

<https://www.facebook.com/anywherebutchina/posts/155750452602531>。

藍區分經濟活動，各自生成對內部成員的準則及要求，亦有發展成「文化統識」或「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潛在可能。沒有上前線「以身犯險」，轉而開黃店，又或投身生產有關運動的各種產品（例如畫冊）來支持運動，算不算「黃」？黃店要做到哪一步（可不可以使用中國貨？有沒有對運動進行捐助？有沒有「獨大」？），才是「真黃」，才值得手足的支持？對黃色經濟圈而言，如何解決因抗爭者對彼此愈來愈嚴格的道德／倫理要求而出現的內部矛盾，恐怕是重要課題。下文也會論及，當政治道德／倫理遇上市場經濟，黃色經濟圈的運作將進一步陷入兩難之中。

三、重新思考「國家—市場—社會」

延續上一部分對「道德經濟」的討論，我們也需要小心「道德經濟可以對抗市場經濟」的浪漫化想像。正如上述提及，黃色經濟圈更多涉及一種「黃色經濟對抗藍色／紅色資本」的抗爭想像。在反修例運動中的道德經濟，暫未見到提出整套推翻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運作模式的論述建構，卻隱隱有與市場經濟合流的傾向。不少黃店在經營時，仍然會希望在商言商，收回成本乃至營利，使黃色經濟圈得以永續。論者在反駁批評聲音時，也會強調黃色經濟圈並沒有剝奪人民的自由選擇權利，⁷⁹或以「消費者運動」之於民主運動的重要性等觀點，為黃色經濟圈作出辯護。⁸⁰

值得注意的是，道德經濟有其複數性（pluralities）。不同的經濟體系，即使如何宣稱其與道德無關，各自亦自成一套道德及倫理論述。當親中傳媒、建制派官員或自由主義商人指責黃色經濟圈以政治騎劫經濟，杯葛藍店或紅店，不利於香港本身的自由主義經濟秩序時，這些論述皆具有一個前提：即政見或道德應該是外在於市場運作，而市場是靠一隻「看不見的手」自行運作的；任何來自國家或社會（道德）方面的介入，都是對市場經濟運作邏輯的嚴重背離。事實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背後，是一套香港人早已耳熟能詳的道德合法性及道德願景，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最為符合「經濟理性」的；它能提供個體以交易自由及透明資訊、保障個體的私有財產權利，並帶著進步及發展的承諾來到社會。另一方面，Karl Polanyi 早在《鉅變》中提醒我們，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順利運作，從來離不開國家干預，及時解決其內部矛盾；在歷史上，社會的角色從來存在於其與市場之間的、一種鐘擺式的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由於市場經濟使社會鑲

⁷⁹ 書生百用：〈「黃色經濟圈一點也不經濟但有政治功效」 施永青到底錯在哪裡〉，《立場新聞》（2019年12月5日），資料來源：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9%BB%83%E8%89%B2%E7%B6%93%E6%BF%9F%E5%9C%88%E4%B8%80%E9%BB%9E%E4%B9%9F%E4%B8%8D%E7%B6%93%E6%BF%9F%E4%BD%86%E6%9C%89%E6%94%BF%E6%B2%BB%E5%8A%9F%E6%95%88-%E6%96%BD%E6%B0%B8%E9%9D%92/>。

⁸⁰ 孔誥烽：〈黃色經濟圈可行而強大〉。

嵌 (embedded) 於它，摧毀了人原有的社會環境、街坊、社會地位及個人技藝——即以包含在經濟活動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由是，社會也希望向國家尋求保護，試圖將市場的擴張局限在特定的方向，亦即 Polanyi 口中的「去鑲嵌化」(disembeddedness)。

回到香港反修例運動的語境下，則同樣可見「國家—市場—社會」之間充滿動態的三角關係。這裡請容許筆者化用 Polanyi 的理論，將「鑲嵌」重新概念化：在反修例運動中，社會作為抗爭主體，主要反對的是國家（尤指中國）對社會的「鑲嵌化」過程；抗爭者希望維持原有的社會自主及個體自由，懼怕國家會摧毀原有的社會關係。在此前提下，市場與社會亦產生了全新關係。在 Polanyi 的理論中，社會面對市場擴張時，會採取「自我保護」（主要是指將勞動力、自然及貨幣「去商品化」），使「追逐利潤」——市場經濟的最高法則——從屬於「提供生計」(provision of livelihood) 的社會。在此，市場經濟中的資本原應沒有「政治立場」，無論來自哪裡，資本的本質就是持續的累積與擴張。但放回香港的語境下，社會對市場中的藍色商家或紅色資本（較之於其他來源的資本）卻非常戒懼，認為他們是國家（中國政府以及親中的香港政府）的化身，同樣會威脅到社會的自主運作，因此是社會「自我保護」的第一對抗對象。在反修例運動中，基於政見／道德分歧而出現的「藍罷買、黃幫襯」風潮（反之亦然），很快被推而廣之，演變成兩方在經濟場域中的一種抗爭「升級」。因此黃色經濟圈的建立，除了對抗市場內的藍色／紅色資本，亦有藉市場經濟所承諾的「自由」，使抗爭者得以在政治場域之外行使「自由」之權利，並以具體生產、消費、流通行為等經濟手段，向國家施壓之意。

自然，向中國施壓的舉動，也隱含香港社會對於（前）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及其經濟模式的不信任；以「自由」為抗爭之名，配合以市場經濟運作作為抗爭手段，確實使反修例運動看似陷入了全球後冷戰格局下的東西對峙，因而受到國際左翼的批判；在抗爭者之間，也不乏希望對外輸出黃色經濟圈，以圖在世界各地掀起「杯葛中國」的連鎖效應。⁸¹筆者無意反駁這些批判有其獨到之處，然黃色經濟圈的具體效用，仍需首先懸置宏觀政治經濟結構對它的批評，並將其放回本地脈絡加以審視。正如彭麗君所分析的，這種經濟上的抗爭並非出於香港人意圖反抗剝削的動機，更多被視為達至政治抗爭成功不可缺少的手段。⁸²在此，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不是目的，不然就無法解釋抗爭者面對紅／藍色資本時採取一種類似「保護主義」的措施。在黃色經濟圈的運作邏輯中，從運動衍生出來的特定政治道德／倫理準則，仍然高於市場經濟的普遍道德／倫理準則。當黃店被發現盈利過多，或未有正當地服務手足，將盈利還之於運動，黃店將受到抗爭者的嚴厲指責。下文將以具體例子，進一步說明在政治道德／倫理（社會關係）與市場經濟邏輯之間的緊張關係。

⁸¹ 例如「連登討論區」在 2020 年 4 月 7 日的討論，見：<https://lihkg.com/thread/1962167/page/1>。

⁸² 彭麗君：〈人民作為修辭？香港「反逃犯條例運動」中的民主與身份認同〉，ICCS Working Paper No.18。

四、盈利邏輯 vs 運動邏輯

雖然採市場經濟運作模式，然而在黃色經濟圈的構想中，黃店的經濟活動首先需要附屬於其成員的社會關係。反過來說，黃店必須為了保障其自身的社會地位（例如「可被信任的店家／手足」），而採取相應的經濟行動。在這樣的要求下，個人經濟利益需要服膺於抗爭者社群的整體利益。這裡再次回到「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在 Polanyi 的設想中，在社會與市場之間持續不斷的雙向運動，應當令社會慢慢習得更大能力，學會在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巨輪下保護自身。反修例運動看似與「市場經濟」合流，但後者始終是一種手段；「社會」才是真正需要被保衛的目的。若仔細探問，則可見由運動所衍生出來的道德倫理（社會關係），與市場經濟運作邏輯（盈利邏輯）之間，全然由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所支撐，前者對後者有所制約，而兩者之間的內在矛盾幾近不可避免。

有論者曾以網上黃店「光時」為例，點出黃色經濟圈在具體實踐方面遇到的經營倫理難題：當黃店老闆僱用手足，卻發現手足工作表現未如人意，該當如何？如果「在商言商」，不視黃色經濟圈為「義工經濟圈」，必然會面對經濟效益問題。此時老闆應該先賺錢，開除不及格的手足，而後再將賺來的資源投入運動？還是必須反其道而行之，否則將失去「黃店」之名？作為黃店經營者，在政治道德與商業經營倫理之間應當如何取捨？⁸³ 另一方面，抗爭者對於黃店的服務水準亦是屢作討論，當個別黃店經營未如理想，請求抗爭者前往光顧時，時而也有聲音指出服務欠佳的黃店，自然會隨著市場規律「優勝劣汰」，認為不需要因其黃店立場而盲目支持，⁸⁴在此「消費者選擇」與「抗爭者互助」之間的行動立場出現明顯矛盾之處。

隨著 2020 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來到香港，黃色經濟圈底下自由主義市場邏輯與反修例運動道德倫理之間的暗湧，一時被推上風高浪尖。2020 年 2 月初，正當香港社會陷入防疫物資短缺，人心惶惶之際，黃色經濟圈一時被期望成可以公平分發及銷售口罩等物資的靈活渠道。有黃店主動捐贈口罩等防疫物資，獲得好評。⁸⁵ 另一方面，黃店如「PEPE.HK」因陷入高價出售口罩、帳目不清等風波，一時間「吸人血」、「呃人」（注：

⁸³ Josef L：〈光時的矛盾與反思：人血饅頭、賺盡與共同體〉，《立場新聞》（2019 年 12 月 15 日），資料來源：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85%89%E6%99%82%E7%9A%84%E7%9F%9B%E7%9B%BE%E8%88%87%E5%8F%8D%E6%80%9D-%E4%BA%BA%E8%A1%80%E9%A5%85%E9%A0%AD-%E8%B3%BA%E7%9B%A1%E8%88%87%E5%85%B1%E5%90%8C%E9%AB%94/>。

⁸⁴ 例如「連登討論區」在 2019 年 11 月 15 日的討論，見：<https://lihkg.com/thread/1693940/page/1>。

⁸⁵ 〈【全城一罩難求】逾千人排隊領黃店免費口罩 老伯：我個口罩戴咗半個月〉，《壹週刊》（2020 年 2 月 13 日），資料來源：https://hk.nextmgz.com/article/2_725042_0。

即「騙人」、「人血饅頭」等指控不斷，⁸⁶使該店家盡失人心。

這裡欲以黃店「龍門冰室」作進一步說明。龍門冰室開張於 2012 年，旗下有數家分店。自反修例運動爆發後，冰室創辦人主動表明支持運動，提供免費餐飲予學生抗爭者，僱用手足工作，又捐助「星火」等支援組織，建立運動資源中心等，因而大受抗爭者歡迎；⁸⁷其後龍門冰室曾經遭人破壞。⁸⁸冰室老闆接受媒體訪問，提出要在香港建立「良心社會」，引起討論。在 2020 年初香港爆發新冠疫情後，龍門冰室亦率先捐出大量口罩。另一方面，龍門冰室餐飲水平一直是抗爭者的關注焦點；⁸⁹隨著生意額受疫情大幅影響，龍門冰室開始在網上「告急」，請求抗爭者前往光顧；同一時間，網上討論區「連登」及部分親政制媒體卻出現指責聲音，稱龍門冰室對所聘用手足「用完即棄」，⁹⁰又被抗爭者發現冰室正計劃開設第七家分店，擴張生意規模，受到不少批評。⁹¹為此，老闆先後在媒體訪問及 Facebook 作出澄清，⁹²寄言抗爭者內部不應出現分化，因「家黃萬事興、家衰手足停」。⁹³

Janet Casten 曾研究馬來西亞的漁民社群，發現一種獨特的「煮錢」儀式，作為兩種經濟及交換模式之間的「道德轉化」(moral transformation)。該社群中的男性多半在漁船工作，負責外出捕魚。漁船營運屬商品經濟交換模式，打來的漁獲會被當作商品出售；一般而言，船長傾向不僱用自己的親戚近鄰，以確保僱主及僱員間只有明確的勞資關係。然而回到家中，男性賺來的金錢則會經由女性之手，在家中的灶台以「煮食」為儀式，

⁸⁶ 例如「連登討論區」在 2020 年 2 月 8 日的討論，見：<https://lihkg.com/thread/1868632/page/1>。

⁸⁷ 〈【專訪】由派物資到找工作 龍門冰室老闆：不談「經濟圈」，我說的是良心社會〉，《立場新聞》(2019 年 12 月 19 日)，資料來源：<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B0%88%E8%A8%AA-%E7%94%B1%E6%B4%BE%E7%89%A9%E8%B3%87%E5%88%B0%E6%89%BE%E5%B7%A5%E4%BD%9C-%E9%BE%8D%E9%96%80%E5%86%B0%E5%AE%A4%E8%80%81%E9%97%86-%E4%B8%8D%E8%AB%87-%E7%B6%93%E6%BF%9F%E5%9C%88-%E6%88%91%E8%AA%AA%E7%9A%84%E6%98%AF%E8%89%AF%E5%BF%83%E7%A4%BE%E6%9C%83/>。

⁸⁸ 〈【龍門冰室】CCTV 影像曝光 五蒙面漢持鐵錘 大肆破壞 20 秒〉，《香港 01》(2019 年 10 月 27 日)，資料來源：<https://www.hk01.com/%E7%AA%81%E7%99%BC/390922/>。

⁸⁹ 如〈【黃店風眼】餐飲界翹楚拯救「難食之首」龍門大翻身〉，《蘋果日報》(2020 年 4 月 19 日)，資料來源：<https://hk.appledaily.com/food/20200419/2LRXVDEWAVMXC2ZT4ZBHIA2XEE/>。

⁹⁰ 如〈【網議政事】「導師」爆被呃「龍門」鬥數罪狀〉，《文匯報》(2020 年 4 月 17 日)，資料來源：<http://paper.wenweipo.com/2020/04/17/HK2004170028.htm>。

⁹¹ 如「連登討論區」在 2020 年 4 月 18 日的討論，見：<https://lihkg.com/thread/1977491/page/1>。

⁹² 見龍門冰室老闆個人 Facebook 貼文(2020 年 4 月 28 日)：<https://www.facebook.com/chunkit.cheung.104855/posts/132710521704628>。

⁹³ 〈龍門冰室：勿墮分化圈套〉，《蘋果日報》(2020 年 4 月 13 日)，資料來源：<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00413/2T7OZ2GNVMIEOYHAZCNZLFOCEU/>。

將金錢加以「轉化」，並投入到家戶及其所在社群之間的互助互惠交換模式之中。這裡涉及的兩種看似對立的經濟及交換模式，以及各自所連帶的道德及倫理價值體系，便是經由「煮錢」的動作獲得轉化，使兩種模式能夠在同一社會中並行不悖、相輔相成。

從龍門冰室的例子可見，在黃色經濟圈的運作中，來自市場經濟中的盈利——尤其受益於黃色經濟圈的利潤——同樣需要進行「轉化儀式」，方被抗爭者接受。龍門冰室自表明立場以來，因受到大批抗爭者前往「懲罰」，生意額大升；老闆亦從中拿出不少份額，向運動作出回饋。相反，一旦抗爭者發現黃店只顧追逐利潤，卻未能提供己方對運動貢獻的實際證明（包括養活手足、在疫情來襲下為手足提供保護等等），很快會遭到來自抗爭者的拒絕，甚至抵制。從光時提出的兩難、PEPE.HK 及龍門冰室先後受到的質疑及批評來看，除了反映抗爭者對黃店的道德倫理要求甚高，也說明抗爭者在有意無意間，仍然洩露了對市場經濟資本擴張，反過來「凌駕於」運動本身的戒慎。由是，運動倫理對黃色經濟圈的制約，反映出運動邏輯及盈利邏輯之間實質上存在張力。若不小心，或將對黃色經濟圈造成反噬，不利於運動的持續發展。

五、抗爭／消費與「香港人共同體」

讓我們再次從「國家—市場—社會」之間的動態關係出發。在香港的反修例運動中，社會為抵抗國家，故採市場經濟為手段，進行自我保衛，建立黃色經濟圈。同時，社會也會以道德倫理來規範黃色經濟圈的具體運作。其中，最為突出的經濟行為是「消費」。抗爭者以消費來支持與自己立場一致的店家，又以罷買（亦即「不消費」）向對家表明自身的價值選擇。談起「消費」，傳統馬克思主義對它有強烈批判。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的世界中，「商品拜物教」改變了「物」的本質，把它變成了「商品」，因而改變了人與物之間的關係。在消費行為中，市場賦予物的「交換價值」變成了物的唯一價值，從而遮蔽了其「使用價值」，亦破壞了消費者與勞動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係。

從經濟人類學的角度出發，有時消費行為也會產生新的社會關係。在消費者決定買或不買一件物品的過程中，背後都藏有一整套的意義系統。由於物會在社會中劃出界線，通過買或不買黃／藍色商品，抗爭者在市場中的行為將反過來鞏固社會，這也是龍門冰室老闆等人對黃色經濟圈的一大期許：透過經濟活動，為抗爭者建立一個「良心生活圈」，最終形成新的內部社會關係，亦即一個新的、以黃色為共識的「香港人共同體」。方志恆曾指黃色經濟圈是「香港共同體大浪潮底下的其中一環」，點明了「身分認同」與經濟行為之間的關係。⁹⁴在這樣一幅圖像中，抗爭者作為「消費者」前往「懲罰」黃店，購買、使用其產品或接受服務，又或向黃店提供捐助，其身分可以透過具體行為而被「證

⁹⁴ 見劉修彰：〈黃色經濟圈的理想和掙扎：紅藍之外，他們要重掌經濟自主〉，《端傳媒》（2020年5月6日），資料來源：<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506-hongkong-yellow-economic-circle-firstofmay/>。

明」——若非同路人，若非「黃絲」，又怎會光顧政治立場如此鮮明的店家？相反，不少黃店亦會寫明不歡迎支持香港政府或警察等「藍絲」顧客內進。因此，消費或不消費的行為，便會在社會上產生新的社會連結（例如在抗爭者與黃店之間）和新的社會區隔（例如在「黃絲」及「藍絲」之間），同時也有可能鞏固舊有的社會關係（包括連結或區隔）。除此之外，黃店本應沒有主動排除其他潛在顧客的動機。畢竟黃店仍然需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裡生存下去，也期待在為消費者提供服務的過程中，能向潛在的同路人作政治宣傳和運動動員。

黃色經濟圈與抗爭現場在時間及空間維度上存在不少差異。如果「如水」、匿名性和自發性是反修例運動眾所周知的特點，那也說明了抗爭現場在「建立社會關係」方面有其時空限制：每次抗爭的「時間、地點、人物」各有差異，組合成百花齊放、而又無以為繼的運動現場。由於不時被質疑有「鬼」（注：卧底），抗爭者很少會主動揭露自己的姓名、身分和樣貌，但這不會妨礙眾人建立信任關係，互稱手足、守望相助。隨著現場警民衝突升級（在運動後期往往是突如其來），抗爭現場的時空往往被各種鎮壓手段所壓扁了、粉碎了，抗爭者不得不四散走避，手足間建立的社會關係亦難以維繫。而黃店各自在十八區的「現身」及「立足」，卻為反修例運動創造了新的時空：這種時空是可見的、能被具體指稱和辨認的，可能就座落於你我的社區中，隨時可至，也不需要擔心何時會被清場——運動由抗爭前線走進生活日常。此外，消費行為較之抗爭行為，所需的門檻和代價更低：即使是不敢上前線的個體，出門買點東西或吃一頓飯，總是可能的；進入黃店後的「身體感」也與抗爭現場截然不同：縱使身旁都是同路人，但有具體邊界、牢固而又開放的黃店空間，使得「相遇」、「彼此看見」和「產生連結」更有條件發生。與抗爭者／消費者一樣，在跨黃店的合作中，負責人們同樣也可以「除低口罩相見」，以經濟行為建立黃店網絡（亦即運動網絡）。是以黃色經濟圈補足了抗爭現場的局限，使得運動中的社會關係得到更多擴建和鞏固的機會。

回到「消費」的討論，單單就消費行為本身，並不能為消費者提供均質的身分認同，又或在消費者之間產生均質的社會關係。具體而言，同樣是擁抱「抗爭者／消費者」身分的每一個體，都各自置身於相似而又相異的社會、政治及經濟結構位置當中。在「抗爭者／消費者」這把大傘下，由無數個體共同形成的、看似性質一致的消費／不消費行為背後，或隱藏著彼此不同、甚或矛盾的價值及欲望——林林總總的「異質性」結成一張複雜綿密、內裡充滿各種動態和張力的網絡，形成了今天我們所見到的黃色經濟圈。這裡欲以黃店「光榮冰室」為例子，說明不同消費者背後的行為動機，乃至他們對「身分認同」的渴求，在香港爆發新冠病毒之際再次浮出地表，或將為反修例運動期望形成的「香港人共同體」，投下不可忽視的曖昧陰影。

屬於黃色經濟圈的光榮冰室因不滿香港政府遲遲不願封關中國大陸，在 2020 年 1 月底開始公告「只招待香港人」、「落單時只限粵話及英語」，又標明「歡迎台灣朋友」，引發社會討論。⁹⁵在光榮冰室發出聲明後，自 2008 年便赴港求學，現已取得香港永久居

⁹⁵ 見「光榮冰室」Facebook 專頁貼文（2020 年 1 月 28 日）：

留權的大學講師黎明，和數名中港友人前往光榮冰室。期間，他們多次聯絡老闆，並在等候回覆時嘗試在店內以普通話點餐，臨離開前又主動捐贈口罩等防疫物資，向員工表明其「抗爭者」身分。事後，黎明將這次的遭遇寫成文章於網上發表，⁹⁶隨即掀起軒然大波，網絡上一時爭論不息。由於事件本身涉及到中港矛盾、疫情、恐懼心理、身分政治、階級、語言、文本再現等多重語境，可供切入討論的角度十分多元；而光榮冰室事件的發生，也點出了在新冠疫情銜接著反修例運動的緊張時期，各方之間的溝通與對話，恐怕會變得十分困難。⁹⁷

事實上，反修例運動乃至新冠疫情，都被鑲嵌在「中港矛盾」的前提下，從回歸至今已有一長遠歷史。在光榮冰室事件中，國籍、政治立場及語言亦成為了一大爭論焦點。有聲音批評「港漂」來港多年，不願意使用本地語言，即不願意融入香港，因此沒有立場去指責他人「壓迫」自己；又指在香港，反普通話即是反語言霸權抗爭，點出了語言的政治性；甚至有聲音指出具中國國籍者已等於「殖民者」。另一邊廂，也有聲音不認同光榮冰室的做法，認為不應對抗爭者的國籍及語言作出歧視，加強族群之間的分裂及仇恨；亦有「港漂」現身，說出在香港生活，時刻都面對著有關語言的恐懼和不安，進而論及自己在反修例運動中的尷尬處境。在此，筆者欲進一步詢問的，卻是消費行為、社會關係和身分認同之間的關連性。在這次事件中，若冰室一方試圖在「抗爭者／消費者」群體中，作出更為細緻的區分，拒絕向被排除的特定群體提供服務；黎明一方則嘗試以消費及捐贈等經濟行為，希望與該店重新建立關係（或修補舊有關係），並要求再度被納入「抗爭者／消費者」的行列中。

不少論者都認同反修例運動跨越了既有的社會藩籬，使不同性別、性傾向、世代、階級、宗教、族群乃至種族都被成功動員，積極投身到運動中，因而激發出社會抗爭的無限潛能。對此，彭麗君曾期望「個人的政治立場」可以超越其社會或天生的歸屬（尤指來自中國大陸者），並加入成為新「香港人」的一員。⁹⁸筆者同樣期望從政治抗爭到經濟實踐，來自不同背景者，都有平等參與反修例運動及黃色經濟圈的合法性，彼此看見及肯認，使社會更為壯大。但從光榮冰室事件可見，「香港人」與「非香港人」之間的暗湧仍然存在。「非香港人」的「抗爭者／消費者」身分——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者——則不再可以從其具體抗爭／消費行為而受到理所當然的肯認，卻需要被打上問號，且在社會中被重新商榷；然而他們本人未必可以參與到這一商榷過程當中。在針對事件的

<https://www.facebook.com/116149449769292/posts/180459973338239/?d=n>

⁹⁶ 黎明：〈說著普通話，等待一個不曾謀面的人〉，《Matters》（2020年2月25日），資料來源：

<https://matters.news/@dearasuka/%E8%AA%AC%E8%91%97%E6%99%AE%E9%80%9A%E8%A9%B1-%E7%AD%89%E5%BE%85%E4%B8%80%E5%80%8B%E4%B8%8D%E6%9B%BE%E8%AC%80%E9%9D%A2%E7%9A%84%E4%BA%BA-bafyreibq7ugli4awn4epaf6wdfvubu5426azxdudep5dulrk6yfmukzi>。

⁹⁷ 〈光榮冰室事件，遇上了怎樣的溝通困境？〉，《端傳媒》（2020年2月28日），資料來源：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228-opinion-why-communication-not-work/>。

⁹⁸ 彭麗君：〈人民作為一種修辭？香港「反逃犯條例運動」中的民主與身份認同〉。

熱烈討論中，各方意見背後亦包括強烈的身分認同動機：誰才是真正「香港人」，誰又不是？這亦指向其心中新「香港人共同體」的應然模樣，將分別納入和排除社會上的哪些群體。

從政治範疇延伸至經濟的運作場域，亦可見在黃色經濟圈，政見／道德或不再是唯一的區分標準，而需要加上「語言」、「國籍」等其他條件，因而變得更加複雜，乃至有愈來愈狹窄的發展趨勢。這裡的「狹窄」至少有兩種意思：（一）更多的政治考量使黃店再次放棄盈利邏輯，從經濟理性的角度而言，則擱置了壯大自身、增加市場份額，乃至打擊對手的目標；（二）隨著疫情的發生，社會上的政治緊張氛圍對特定社群變得更為苛刻，使黃色經濟圈所擁有「擴建及鞏固社會關係」的功能，再度受限於消費者／抗爭者之間潛在矛盾（尤其中 VS 港），開始排除原本是同路者的特定社群，進而鞏固兩者之間的敵對關係。這種白紙黑字的、將人從具體時空中隔絕出去的做法，卻似乎與反修例運動背後的道德及倫理原則互相衝突，同時也是對特定個體作為「抗爭者」、「消費者」，乃至「香港人共同體」身分的多重否定。長遠而言，恐怕將削弱運動及黃色經濟圈的潛在動能。

六、小結

從道德經濟到「國家—市場—社會」的關係，上文討論了黃色經濟圈在香港反修例運動中的具體生成脈絡及意義；從龍門冰室到光榮冰室這兩個案例，上文也指出了黃色經濟圈在盈利邏輯與運動邏輯之間的拉扯，以及在不同個體的抗爭／消費行為背後的異質性，如何使社會關係的建立和鞏固充滿暗礁。

反修例運動發展至今，就黃色經濟圈的討論及實踐方面，現已涉及經濟運作中的生產、製作、供應、物流、銷售等各個方面，相信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當然，有論者指黃色經濟圈的建立本身，已然強化了自雨傘運動以來持不同政治立場者之間的社會撕裂。⁹⁹如何超克黃／藍區隔下的二元對立，對未來的香港社會而言，的確是一個重要課題。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小心處理黃色經濟圈內部，來自不同社會、政治及經濟結構位置者之間的張力。由經濟行為所產生的社會關係和身分認同並非靜態，卻永遠處於變化之中，取決於每一個體的持續參與、溝通和對話。

筆者無意否認，從傳統左翼的觀點出發，在黃色經濟圈背後的政見或道德取向，及

⁹⁹ 黎蝸藤：〈勿低估「黃色經濟圈」潛在損害〉，《明報》（2020年1月2日），資料來源：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6%91%98/article/20200102/s00022/1577878363984/%E5%8B%BF%E4%BD%8E%E4%BC%B0%E3%80%8C%E9%BB%83%E8%89%B2%E7%B6%93%E6%BF%9F%E5%9C%88%E3%80%8D%E6%BD%9B%E5%9C%A8%E6%90%8D%E5%AE%B3%EF%BC%88%E6%96%87-%E9%BB%8E%E8%9D%B8%E8%97%A4%EF%BC%89>。

其具體的經濟運作邏輯及模式，並沒有觸及根本的政治經濟結構或制度層次上的問題；簡單來說，一家黃店新開張，大抵難以逃過向各大地產商「交租」的宿命，無力抵抗香港「向地產金融傾斜而造成的資源分配不平等」；¹⁰⁰黃色小店或食肆開張，或多或少也免不了使用來自紅／藍店或中國的產品、原材料或服務（這裡亦不幸地指出本地一級及二級生產均不足的問題）。即使如此，我們仍期望黃色經濟圈的出現能為香港社會提出一套新的經濟願景——雖不至於可以推翻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它仍有可能鬆動既定僵固的政治經濟結構，將迥異與純市場經濟的道德／倫理和社會關係帶回經濟領域。從「黃色經濟圈」、「良心生活圈」乃至新的「香港人共同體」，我們究竟期望著一個怎樣的未來？在這個新的未來，我們「除低口罩相見」後，還有沒有辦法反思香港過去的政經結構，在得到政治自由的同時，重新掌握經濟自主，並建立一個真正多元、開放及平等的社會？走筆至此，願與大家互勉。

¹⁰⁰ 許寶強：〈黃色不止政見 經濟也是良知〉。

穿越黑洞：反修例運動中的內地生及其「史前史」*

郭佳

摘要

本文試圖強調，內地生與包括本地生在內的香港社會之間的關係是跟過去一脈相承的，而內地生的情感構造是在中港的纏繞關係、香港對內地招生的政策脈絡、內地生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以及當代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知識與情感底色中長出來的。那麼，內地生在今次反修例運動中的認知和情感狀態，是如何從同構的內地生跟香港社會關係「史前史」中生長出來？進而，在反修例運動這個將時間和空間疾速壓縮的過程中發生劇變？本文從香港對內地招生的政策脈絡入手，探問內地生對香港的期待是什麼，這一期待跟內地生跟香港社會發展出怎樣的關係密切相聯。進一步地，我們將從細部檢視在中港矛盾爆發的 2011 年之後，內地生在被質疑是中共組織滲透香港的媒介、擠壓本地就學和就業資源、跟香港「核心價值」相對立這三種情境下，如何因著長期壓抑狀態、身分的創傷和自身的政治感覺、政治觀念，對「香港獨立」等政治和社會議題有著特定的反應。最後，我們將探究在反修例這個時空疾速和劇烈的壓縮進程中，內地生和香港社會的「史前史」及其中內地生的認知與情感構造如何重演、迴旋、劇變，並在穿越這個運動的「黑洞」後走向各自不同的方向。

關鍵詞：反修例運動，內地生，創傷，身分政治，情感政治

在 2019 年的反修例運動期間，不時會看到跟在港內地生有關的新聞，且往往是關於內地生站在運動的對立面，譬如撕下示威者海報、組織唱紅歌快閃，以及最受關注的內地生撤離香港返回大陸。這些事件中透露著很豐富的香港社會和內地生對彼此的認知，及內地生群體的情感狀態意涵——內地生對與本地生溝通的放棄、對自身身分的擔憂、對香港政治取向和校園政治化的不滿、對作為異見者不能發聲的壓抑，等等。內地生的狀況既非香港社會所設想的香港「核心價值」的反對者、被「洗腦」的「小粉紅」，亦非中國大陸媒體所呈現的堅定的愛國主義者；內地生與本地生的關係也並非兩地媒體所呈現的因政治與價值而來的「矛盾」而已。縱使我們可以讀到不少關於內地生思想和情

* 郭佳，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聯絡方式：jbawgy@gmail.com

感狀況的細膩描繪，卻較少看到將內地生當下狀況及情感構造跟過往勾連起來。

本文試圖強調，內地生與包括本地生在內的香港社會之間的關係是跟過去一脈相承的，而內地生的情感構造是在中港的纏繞關係、香港對內地招生的政策脈絡、內地生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以及當代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知識與情感底色中長出來的。於是我們將提問的便是，內地生在今次反修例運動中的認知和情感狀態，是如何從同構的內地生跟香港社會關係「史前史」中生長出來？進而，在反修例運動這個將時間和空間疾速壓縮的過程中發生劇變？

本文首先爬梳反修例運動期間，涉及到內地生的衝突事件。接著，從香港對內地招生的政策脈絡入手，探問在內地生家庭和教育背景、當代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知識與情感底色基礎上，內地生對香港的期待是什麼，這一期待跟內地生跟香港社會發展出怎樣的關係密切相聯。進一步地，我們將從細部檢視在中港矛盾爆發的 2011 年之後，內地生在被質疑是中共組織滲透香港的媒介、擠壓本地就學和就業資源、跟香港「核心價值」相對立這三種情境下，如何因著長期壓抑狀態、身分的創傷和自身的政治感覺、政治觀念，對「香港獨立」等政治和社會議題有著特定的反應。最後，我們將探究在反修例這個時空疾速和劇烈的壓縮進程中，內地生和香港社會的「史前史」及其中內地生的認知與情感構造如何重演、迴旋、劇變，並在穿越這個運動的「黑洞」後走向各自不同的方向。

一、反修例的內地生事件

（一）撕海報、掛國旗、撕裂的對話

在反修例運動中，我們看到的關於內地生的較早報導大概是 7 月。7 月 3 日，港大校長張翔發表聲明譴責 7 月 1 日示威者衝擊立法會，表示對暴力的痛心。其後學生會亦聲明對校長言論表達憤慨，校園內亦出現很多「光復港大」、「驅逐張翔，港大之恥」的標語。10 日，連登爆出叫作「港大校園清潔隊」的疑似內地生微信群組對話，討論撕掉校園內「批鬥校長」的標語或是張貼不同意見的海報。當晚，「香港大學反修例關注組」在臉書直播了四名講普通話的似內地生的男生撕掉標語的過程。翌日，批評校長的標語被重新張貼，附近位置也出現了表示應「尊師重道」的海報；但更多的是用繁體字和簡體字書寫的對撕海報的抗議「再撕啊，還有喔」、「請勿暴力對待海報」、「請尊重言論自由」。內地生撕海報的行為顯然被跟校長譴責示威者的言論視為一體了，大陸出身的校長不支持學生行動、不譴責政府和警察，大陸出身的學生撐校長，成為校園內更大的反動勢力。實際上，內地生亦將自身跟校長捆綁在一起了。基於對運動本身的理解、認為校園應是去政治的，他們覺得校長譴責暴力是中立的，而校長被「批鬥」是本地生容不得異見、也是對校長的大陸出身的排斥，正如自己因為內地生的身分和異見而長期在校

園內不能發聲。

9月2日，當日各校召開罷課集會，中大罷課集會前，一名內地生上台撕扯標語，並且手持中國護照高喊「我是中國人」、「你們不配做大學生」，隨後被擡離大台；他在隨後受訪時表示自己支持警察，認為大學生的本職是學習，不應該罷課。集會中，一名本地生提到他在迎新營上試圖向內地新生介紹運動，但內地生表現十分驚恐，要求將早先的合照刪除，隨後更有過半內地生離席；他認為部分內地生是有意願了解運動的，但迫於政治壓力而離席。中大罷課集會上的那位內地生行為並沒有引發很多爭議，大概是因為一個人上台撕扯標語、大喊異見的行為，在運動期間的各種集會上都曾發生過。他們更多是被當作異見的個體，把他們拖離視線就好了。後來的一份中大內地生調查表明，過半參與問卷的學生不認同那位內地生的行為，認為他的做法只能激化本地生與內地生的矛盾。大多數內地生對香港的期待只是提供高質量的教學和高薪職業，再加上中國政府和中聯辦的監控與檢舉系統的壓力，他們都是在香港小心翼翼地生活，跟政治、跟香港社會刻意保持距離。縱使承受著長期的壓抑，大部分內地生也並不認為個體的發聲是有效或必要的；但當內地生與本地生衝突的導火線出現，若大陸官方媒體和網路輿論進場為事件中的內地生賦予政治正當性和抱團取暖的力量，內地生長期壓抑的聲音或許會爆發。

10月1日，一名中大內地女生發起在宿舍窗外懸掛五星紅旗，隨後撰文〈掛起紅旗之後〉¹⁰¹敘述了此後遭遇若干本地生在宿舍門外對她辱罵、砸門、從樓下用激光筆持續射向她的宿舍窗；她也提及有示威者舉其他國家的國旗，自己也在言論自由的基礎上掛中國國旗，卻遭受差別對待。另一位內地男生是唯一以實際行動響應的，他在受訪時說那段時間校內有很多反黨反政府的標語，國慶日還會有「反黨反政府」的校內活動，他想要表達的是中大學生「至少絕大部分的學生還是在正常生活，並且熱愛祖國的」。同一天，一百多名港大內地生在校內的中山廣場進行了紅歌快閃，一起舉著國旗唱了〈我和我的祖國〉、〈歌唱祖國〉、〈義勇軍進行曲〉等。運動進入白熱化後，內地生在校園裏時常看到與自己政見不同的宣傳海報，或者針對內地人、中國的侮辱性言論，時常會感到受傷，並因為過往經驗的累積會自然地將這些言論都視為針對內地身分的敵意，也會因過往對政治的觀念和感覺將個人身分的創傷跟國家主權的創傷捆綁。當急切的發聲成為需要，被調動的往往是較沒有思想內容的口號，以及熟悉的語言體系和符號；國旗和國歌、紅歌在這時便非常適用，而且可以有效地把「我們」連結起來。

10月10日，中大校長段崇智舉辦第三次與學生的對話會，但學生不滿校長避談政治、沒有保護被捕學生，整場中校長的發言基本上被噓聲和口號聲壓過。內地生張婷抽中發言機會，她表示內地同學在校內因為不同意見被打壓而感到恐懼，向校長提問要如何保護內地生，她的普通話發言自然更引發了在場學生的噓聲。她還說道：「如果不是我的內心足夠強大，現在面對你們的一片噓聲我會很害怕。你們總是在譴責他人的過錯，

¹⁰¹Sophie Yann (2019) 〈掛起紅旗之後〉，2019年10月3/4日，原載於微信公眾號「閒顏碎語」（已刪除），見「品蔥」，<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9221>

卻沒有想過正是你們自己在破壞香港的法治、自由、民主。」現場學生顯然被直接激怒了，她的發言不斷地被「返大陸」、「平反六四」等打斷。發言影片當晚便在大陸網路上被熱捧，張婷隨後接受了《環球時報》專訪表示：「我們尊重你們的言論自由，但也請你們尊重與你們不同政見的人的言論自由……也希望你們能以合規的方式、通過正常的申訴途徑來表達訴求。」她也提到，校園不是政治角力的場所，學生應該更好地去政治化，「當有學生違反校規甚至觸碰法律時，學校應當告訴他們這些是錯的，而不是一味縱容」。¹⁰²這種自認為客觀、理性、中立的發言，是內地生頗為普遍的，但也被一些內地生認為是立場鮮明的一一因為這種批評並非從香港的、今次運動的脈絡出發去批評，無力解釋校園緣何愈發政治化，運動又緣何走向暴力升級；這種批評在動力和情感上完全跟香港的情感與狀態脫節，註定只會是無效的批評，甚至無法有「溝通」的意義。一位內地生留下了更詳盡的現場和感受紀錄，透露了比較親近運動的內地生身處內地生與本地生夾縫中的、因內地生身分而來的受傷感，當然也留下了一些縫隙：

我的一個同學坐在後排，是個支持香港運動的內地生，她說，她覺得耳朵都快要被這種帶有仇恨的言論喊聾了。雖然明白香港人的憤怒，也知道在這個時候本地同學不會考慮到有部分內地生也是支持他們的，但那種群情激憤地對內地生集體的辱罵，還是讓她感到極大的壓力和不舒服。她說她突然覺得自己是少數人裡面的少數人，在內地生裡支持香港是少數，在香港同學面前，那一晚又感到了自己是一名還沒被接納的少數派。……周圍的香港同學非常冷靜，甚至對後排叫喊的本地生有些生氣，在那位女生發言之時，他們高舉「停止」的手勢，希望他們快點停下辱罵和叫喊……之前坐在我身旁的一個香港男生……發言時說他覺得他們做了很「醜怪」（丟臉）的事情，本地學生完全沒有表現出對不同意見發言者的尊重。¹⁰³

撕海報、掛國旗這些事件及隨之而來的衝突，透露了包括本地生在內的香港社會與內地生對彼此的認知，及內地生對社會政治衝突的反應。我們將在之後幾個小節展開的是，從內地生「史前史」入手剖析他們的情感狀態、對社會議題的認知，以及政治感覺和政治觀念；從而探問，他們為何會既主動又被動地把自己跟校長捆綁在一起，為何會對校園內發生的政治感到恐懼和憤怒，為何會以掛國旗的方式表達反對意見，以及為何會在試圖跟本地生溝通時做出對方完全「聽不下去」的發言。

（二）「私了」與「撤僑」

11月6日，科大校長史維召開校長論壇，一些內地生到場舉起「支持校長」、「和諧

¹⁰²〈辱罵中堅定發言 中大內地女生：只怕他們聽不到不同聲音〉，2019年10月12日，見「橙新聞」，<http://www.orangenews.hk/news/system/2019/10/12/010128700.shtml>

¹⁰³桃子燒酒〈內地生筆記：中大校長對話場內外，與那篇讓內地生激憤的人民日報評論〉，2019年10月19日，見「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18-notes-meeting-with-principal/?utm_medium=copy

校園」標語。有內地生發言指學生責任是讀書，問如何確保科大教學質素，被現場噓聲打斷。當在場學生要求播放日前將軍澳衝突片段，一些內地生離場，其中一人在離場時與舉示威標語的學生發生口角並推倒一人；隨後有本地生喊「私了」、「開遮」（打開雨傘），一眾人爆發肢體衝突，混亂中有四人受傷被送離至保安中心。被「私了」內地生欲離開保安中心時，眾多本地生上前包圍質疑內地生挑起暴力而沒有受到懲處。保安經理稱不論是以和解、交由校方紀律處理或報警處理，校方都會公正處理，最終安撫包圍學生散場。次日《文匯報》在報導中稱，影片紀錄顯示內地生離場時沒有推撞動作，或是有人故意挑起矛盾。內地生被「私了」事件被若干大陸媒體報導，在大陸網路上也被渲染成內地生面臨威脅或攻擊的普遍遭遇，也埋下了大陸政府撤離內地生的伏筆。

11月8日，科大学生周梓樂在將軍澳墜樓不治，各區都有悼念活動，大量校內外人士參與科大內的悼念集會。網傳科大內地生爆料「由於特殊情況，學校發出緊急通知，下午及周末所有課程全部取消，請同學儘快疏散離開學校。下午1:30有一輛大巴可坐三十人在李兆基商學大樓樓下開往深圳……」¹⁰⁴這一消息被媒體紛紛轉載，稱科大協助內地生「撤僑」。校方澄清只有個別導師自行離校，校方安排巴士是接駁因EMBA課程取消而要返回深圳的學生。亦有當時聽到學校廣播的內地生指出，公告並非針對內地生；當晚自己跟朋友說著普通話經過校內集會時，未曾受到任何無禮對待。10日，中聯辦教育科技部發布致內地生公開信：「近期，香港校園出現了一些暴力事件和欺凌行為，有內地同學受到圍攻、滋擾。我們對有關校園暴力行為予以強烈譴責，並已於第一時間跟進幫助和處理。一直以來，祖國內地對同學們非常關心，請大家保持冷靜、注意安全、安心學業。遇到困難請及時向校方反映並與我們或香港內地學生聯合總會保持聯繫，也請同學們多向家裡報平安，讓家人放心。」¹⁰⁵

「撤僑」成為運動中關於內地生的最受關注的議題，實則是在中大衝突事件後。11月11日，因周梓樂身亡和西灣河示威者被警察以實彈射傷，示威者發起全港三罷；清晨，中大學生和校外示威者在二號橋向東鐵線和吐露港公路投擲雜物以阻塞交通；幾小時後防暴警察到場並與示威者爆發激烈衝突，校內的大小警民衝突與對質持續至15日。12日晚，《環球時報》駐港記者白怡雲在微博貼文：「中大內火光熊熊，彷彿戰時的敘利亞，黑衣暴徒們不僅到處打砸，還威脅警察如果不同意他們的訴求，就要炸掉校園和放火燒山。」她說，科大內地生被「私了」讓內地生處於極大恐慌中，「中大校園裡的烈火、弓弩和燃燒彈等讓他們最終下定了決心」離開；許多「港漂」和藍絲民眾開車或協助找車來送中大內地生離開。她的同事在護送一名內地生回深圳時，沿路「地上有暴徒撒的釘子和設的陷阱，空中有暴徒從高處扔下的鐵棍和磚頭，這名瘦弱的女孩幾次驚慌的叫出聲來，尤其當一根鐵棍差點砸中我們的車時，她的臉色變得煞白。」¹⁰⁶13日，共

¹⁰⁴ 〈大學示威浪潮中的內地生「撤僑」事件〉，2019年11月16日，見「香港01」，<https://pse.is/RK6HT>

¹⁰⁵ 苒苒、李宗憲（2019）〈香港校園衝突後：政治分歧暴力陰影下的內地和台灣學生〉，2019年11月13日，見「BBC中文」，<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0404738>

¹⁰⁶ 〈緊急關注！內地生被困港中大，環球時報記者親歷救援，胡錫進微博致敬〉，2019年11月13日，

青團中央及一些企業、旅館、中學表示為內地生提供深圳住宿地點。同一天，媒體報導有民眾目擊水警在馬料水碼頭派船接內地生離開，警方證實因接獲內地生求助派船送至安全地點。14日，中大和科大校方亦證實有安排接駁學生離開校園。

內地生「撤僑」成為中大衝突期間被媒體關注的議題，一來因為大陸媒體對「撤僑」的特別關注中充斥著對運動的單向度抹黑式報導，這些報導跟香港「藍絲」民眾與媒體對運動充滿危險、恐怖的印象想必只有過之；也因為在中大激烈的警民衝突中，「撤僑」似乎暗示著中央（也就是港府）對示威者的鎮壓會更加強硬。「撤僑」消息出現的後幾天，媒體報導中也出現很多來自內地生的不同聲音，比如中大內地生群組「HK 政治難民赴深圳避難 workshop」中有很多同學批評《環球時報》記者關於撤離的微博、對中大衝突的報導失實並要求撤回文章；¹⁰⁷亦有轉載內地交換生寄給序言書室的信：「今早（11月13日）突然收到通知，我和一同來交流的同學們被內地有關部門強行安排全部遣返，沒有任何事前協商，利用事先收集的個人隱私信息，直接為我們購買了返回大陸的機票，明天清早即啟程，內地本校的監管教師剛才特地打電話要求我服從安排。我非常憤怒也非常難過，同時也感到非常好笑。」¹⁰⁸

然而對包括本地生示威者在內的民眾，「撤僑」成為受關注議題的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或許是，中大、科大校方對內地生撤離的協助，直接對比的是校方對本地生（示威者）訴求的不理會、對被捕學生沒有給予充分幫助；水警對內地生撤離的協助，直接對比的是警察對示威者的毫不手軟的鎮壓；報道中「港漂」、「藍絲」對內地生撤離的協助，直接對比的是他們對運動、對示威者的抨擊甚至對警察鎮壓的支持。於是，撤離意味著內地生認為運動危險、可怕，所以才「逃」開；意味著他們是運動的反對者；意味著他們跟校方、警察、「港漂」、「藍絲」、中聯辦、港府和中央緊緊捆綁在了一起。縱使往常內地生被認知的形象就是如此，但中大激烈衝突期間的「撤僑」卻讓這些形象和意味更加激烈、放大地出現，也給包括本地生在內的民眾更大的刺激。

這些報導和認知有其真實性，一部分內地生確實對校園內的衝突和「私了」有很大的恐懼，尤其是在中大衝突發生後很多人對未來的走向沒有了把握。對包括本地生在內的示威者而言，很難理解不必上到前線、不必擔心被警察抓的內地生為何如此恐慌，對本地人來說只要乖乖在家或是避開有集會、有衝突的地方就不會有風險。但對於那些初來香港、沒有去過集會或占領現場、沒有跟參加示威的朋友仔細聊過，只是透過自己熟悉的媒體獲取資訊的內地生來說——正如對於很多藍絲民眾來說——沒有能力和條件對事件做基本的判斷，示威者和衝突現場充滿不可知的恐怖，尤其是這些發生在自己生活的區域；對於那些不會講廣東話的內地生來說，基於日常因為內地生身分被排斥的經

見「環球網」，<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KnKLQ>

¹⁰⁷ 〈「撤文很麻煩，能不能先解決救人的問題?!」〉，2019年11月13日，見「中國數字時代」，<https://pse.is/S23MZ>

¹⁰⁸ 〈內地生在香港交流生：被有關部門強行安排全部遣返〉，2019年11月14日，見「立場新聞」，<https://pse.is/S3CCK>

驗，以及運動中越來越嚴重的對「鬼」（指臥底或背叛者）的懷疑、對被懷疑是內地人的「鬼」的暴力，不論對運動有怎樣的判斷和感受都會對經過校園內的占領區和經過示威者感到恐懼。

然而，大多數內地生選擇離開並非因為對運動的反對或恐懼，而是因為拗不過父母的敦促，以及校園內生活設施的停擺。「我還是希望盡可能地留久一點。家人擔心不已，每天打電話來催促盡快回家。在一波又一波無法判斷真假的謠言以及校方多次釋放的信息下，相熟的內地生朋友，即便是對反修例運動保有同情的，亦陸續決定離開學校。」¹⁰⁹「宿舍已經有不少人搬走，學校餐廳基本都停業，亦要到校外的超市買菜，生活不便。」「其實目前在學校沒覺得有甚麼安全問題，早上都是被家人打電話叫醒的。」¹¹⁰「不過萬一事態嚴重起來，斷水斷電也不會有人管了。這些我們都說不準。」中大衝突開始後，縱使沒有斷水斷電，但大多數食堂關閉了，商店的生活用品和食材眼看也要斷了供給，校園和週邊公共交通也停擺了，到校園外買菜要走很遠的山路。即便幾天後校園內展開了交通、飲食和清潔的自治，但對於不會講廣東話或是不敢去占領區的內地生而言仍然是難以取用的。當宿舍樓裡的大多數內地生、本地生和其他外籍生逐漸離開，僅剩的內地生也只能離開；而且當校方宣布學期結束，他們也對要在深圳暫住多久、何時能夠回到學校沒有預估的能力。

科大「私了」內地生事件，確實跟內地生與本地生的校園內關係有關，但「撤僑」事件中主要的行動者是中港兩地的政府和媒體，內地生只可以選擇離開或留守。在後文即將展開的對內地生「史前史」剖析中，我們可以逐漸看到的內地生對政治的感覺、對校園政治化和政治衝突的認知，如何影響了他們對媒體報導的反應、在校園衝突中感到危險或安全、決定自己應該離開或留下甚至承擔責任。

二、內地生招生政策的脈絡，內地生對香港的期待

在反修例運動與內地生相關的議題中淺淺呈現出來的，內地生對與本地生溝通的放棄、對自身身分的擔憂、對香港政治取向和校園政治化的不滿、對作為異見者不能發聲的壓抑，在內地生群體中成為籠罩性的、激烈的情感氛圍。不過正如包括本地生在內的香港人在運動中對內地生的認知是跟過去一脈相承的，內地生對香港社會和校園張力的理解和其間的感覺也是跟過去同構的。要看到內地生狀態的構造來由，不免要從內地生來港的政策背景和決定來港動力開始。內地生申請與就讀數據和內地生群體的組成變化，皆關乎在香港社會與校園內關於內地生的諸種爭議，尤其是在 2011 年開始隨著雙非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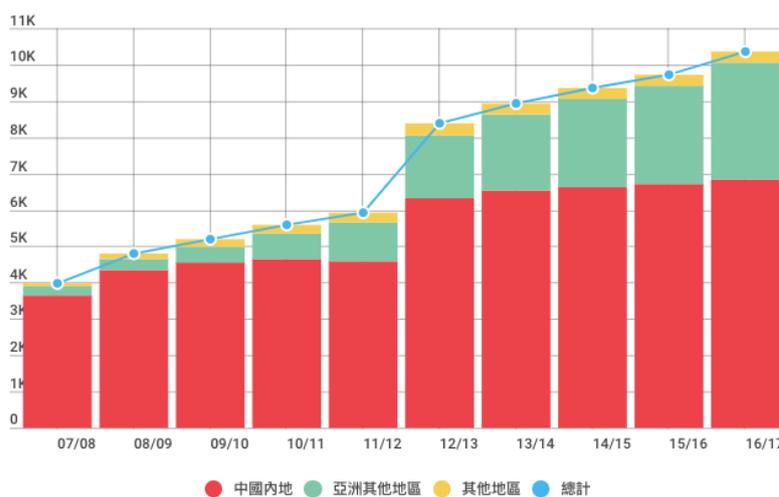
¹⁰⁹小丁（2019）〈作為內地生，留守中大是怎樣的體驗？〉，2019 年 11 月 25 日，見「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125-notes-cu-mainland-student/?utm_medium=copy

¹¹⁰〈在高喊「光復香港」的校園走過，沉默的內地生怎麼想？〉，《大學線》第 144 期，<http://ubear.com.cuhk.edu.hk/144-nds/>

婦、水貨客、搶購奶粉事件的反對大陸人占用、擠壓香港資源的社會氛圍高漲，內地生搶占香港教育資源也成為隨後興起的論述。

1998 年，慈善團體「賽馬會」提供資金作為內地生獎學金，由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補助的八所大學得以開始招收內地生；作為大陸教育部推行的「試點工作」，港校的招生辦法為委託內地幾所大學代招，每年招生人數僅幾十人。2003 年，大陸教育部正式開放港校在內地自主招生，招生對象限於六個省市，此後逐漸開放到二十五個省市（除六省之外全部開放）。彼時考試須憑藉高考成績、港校統一筆試與各校面試的綜合成績申請港校，2004 年中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相互承認高等教育學位證書的備忘錄」，2005 年大陸開放考生僅憑高考成績申請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城市大學；2006 年，開放八所港校之外的四所大專院校在內地招生，且各校逐步獲准僅以高考成績招收內地生。2006 年，申請港校本科生課程的內地生逾三萬人，錄取近 1300 人；錄取人數從 2010 年的 1384 人，增至 2013 年至 2015 年相對穩定的每年逾 1600 人。

八大院校學士課程非本地生人數（2007 - 2017）



資料來源：教資會

說明：此為該學年度非本地生在學人數總計

圖片來源：〈內地生十年增 2.4 倍 本地大學資源是否足夠？〉，見「香港 01」2018 年 5 月 10 日，
<https://pse.is/RWCYY>

自 2005 年港校獲准僅以高考分數招生起，港校逐漸成為大陸頂尖學生間越來越熱門的選擇。記憶中，自 2006 年入高中後我自己和父母開始留意大學選擇起，便時常看到某省市狀元放棄北大清華而選擇港大或中文大學（中大）的報導，也會讀到紅極一時的某位高考狀元論述究竟為何放棄北大、選擇中大的原因的文章。我念高中的 2006 至 2008 年恰巧是港校被追捧程度遽增的時期，2008 年我的高考志願只填了北大一筆，但

其實我費了很多力氣也沒能讓父母認同我為何選擇北大而非中大的緣由。此時申請港校的大多是高考成績可以觸及大陸一流大學的菁英學生，被錄取的自然是菁英學生中的菁英，譬如我的若干高中同學——他們本就在我們這所北京市排名前三的中學裡，預估高考成績可以達到北大清華分數線，但又沒有十足把握。

當然，在港校不斷擴招內地生的情況下，內地生的菁英程度有所下降。但此一時期，不論是菁英中的菁英學生或是菁英中的次菁英學生，他們自身及其家長偏好港校的原因主要在於以下三點：港校的國際綜合排名較大陸高校更高、國際化水平高、以英文為教學語言，有利於未來申請歐美高校研究所或到歐美就業；畢業後可以留在香港工作，薪資水平比大陸高出很多，且留港滿七年便可申請永久居留權；港校學費和生活費較歐美低一些，畢業後若回大陸找工作時也可以有留學的資歷，相較於留學歐美要划算些。在此三點菁英學生的基本訴求之外，也有著知識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因素。最初幾年，內地生大都申請入讀商科；隨著港校知名度打開和更多面向的宣傳，港校的理工科與人文社會學科在知識和研究上的優勢為人所知，內地生逐漸遍布各校各學科。對於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初期出生的大陸年輕人，香港流行文化仍有著很強的影響，香港對於他們而言既有文化的親近感，又有著文化及其背後一整個城市的神秘感。彼時的一些內地生亦提及對香港的偏好，包含了對異於大陸的政治體制的好奇，或是對民主、自由與法治社會的嚮往。然而對於申請研究所的內地生而言，香港的吸引力更在於港校依照英國學制，修業年限較短；尤其是授課型研究生僅需一年即可獲得學位，是對於大陸高校畢業後想要一個「鍍金」學歷以便就業的內地學生的理想選擇。

在遽增時期之後，申請港校的人數大致在 2013 年達到頂峰並在之後開始下降。港校降溫的原因至少包含香港經濟的下滑、大陸在彼時熱門的科技領域的就業前景優於香港、大陸高校的競爭力和國際排名提升、歐元和美元匯率下跌從而留學成本下降。具特殊性的是雨傘運動後的 2015 年，當年申請港校的內地生較 2014 年減少三成左右；香港政治與社會的「不穩定」首次成為了很多學生家長在申請考慮和招生諮詢時的擔憂。2016 年後申請就讀港校的人數又有所回升，港校吸引力也不外乎前述三點基本訴求。然而在我看來，此一時期內地生申請港校的動力和內地生群體狀態有著微妙的變化。首先，對於九〇年代中後期出生的大陸年輕人，香港文化少了親近感和吸引力。其次，2013 年起大陸政治的顯著變化和言論空間的顯著緊縮，使得在此一時期經歷中學或大學教育與生活的年輕人確實有了不同的政治認知和政治感受，對香港的政治好奇與期待幾乎不再成為香港的吸引力。最後，因為港校非本地本科生限額的不斷開放，以及對授課型和研究型內地研究生的擴招，內地生的菁英化程度下降且有著更加多元的背景。

可以見得，內地生到香港念書的動力主要是英文授課的、有國際口碑的教學可以助力自己去西方國家念書或就業，時間和經濟成本較低的學制有利於自己回大陸就業，港府關於內地生留港就業的政策為自己的職涯發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而其中對香港文化或政治的因素越來越少。於是，他們對香港校園與社會的期待就是可以滿足以上動力——學校可以提供高質量的教學和獎學金，港府可以提供惠及他們的就學和就業政策。這些也是內地生的既得利益。這種對香港的期待造就了內地生如何對待作為「異地」的香

港，在學業和職涯追求之外，他們對待香港就像是對待所有其他作為「異地」的旅行地那樣——被悅納的只有美食、旅行、購物、異域風情和日常善意的經驗。在學業和職涯期待與對「旅行地」的期待中的經驗之外，其他的經驗都是不可欲的，也因此是需要迴避的、不必認真對待的——譬如了解「趣聞」之外的在地歷史，聽到有價值甚至政治取向的聲音，聽到與自己無關的痛苦，或是做有可能對本地承擔道德責任的動作。正是對於這些把香港當作「單純的」「異地」的內地生，對於香港的理解動力非常有限，對於自身對本地就業與住房資源造成的擠壓很難認知。

因著香港社會對中國和內地身分的偏見和不理解，內地生在香港日常生活中自然會遭受到一些來自本地生或本地民眾的偏見和不公對待，不過大多數內地生個體經驗到的還是在香港來自較多接觸的老師、本地同學和基層民眾的善意。但因為那些個人的或口耳相傳的受傷經驗，因為媒體和那些叫得最大聲的論述者的惡意，因為香港和大陸媒體關於內地生與本地生衝突的報導不斷地將他們的關係定性為「矛盾」，這讓內地生總是處在一種僅因身分而覺得自己「有錯」的生活狀態裡。於是，大部分內地生選擇了「小心翼翼地」在香港生活，為了迴避未知的風險和衝突刻意地跟香港社會保持著距離。要實現那些既得利益的前提，正是香港社會和政治的穩定，即便日常生活中會遭受到一些來自本地生或本地民眾的偏見和不公對待，也可以接受。正是在這種如履薄冰又有著創傷的狀態下，長期以來因為如履薄冰而來的壓力，以及因為距離和創傷而來的無聲成為內地生的群體情感，當中港矛盾的氛圍中冒出關乎內地生的切身議題，這些壓力與無聲會爆發為更激烈的創傷感和本能的對抗。

三、與內地生割席的史前史

「2006年來香港讀書時，沒聽說過什麼陸港矛盾。校園內外，大家都對內地生挺友善。」徐南濱回憶自己在港讀書的日子時說。那時候，雖然生活中也偶爾經歷陸港文化差異引起的小插曲，但整體氛圍還是溫和向善的，學校裡的民主牆上也不會出現針對內地生、普通話和簡體字的言論。¹¹¹

反修例運動中關於內地生的議題，呈現了運動參與者／示威者對內地生的印象和認知是：內地生跟校方、警察、「港漂」、「藍絲」、中聯辦、港府和中央緊緊捆綁在了一起；內地生認為運動危險、可怕所以才「逃」開，他們是運動的反對者。這些印象和認知透露了，內地生在香港社會面對的質疑至少是：內地生作為內地人對香港本地資源的擠壓；內地生跟中聯辦、中央的關係；以及內地生跟香港「核心價格」的對立。這些核心質疑，也是中央和港府開放內地生來港之後的十幾年裡不斷地、往復地發生的，尤其是在2011年中港矛盾成為籠罩性社會氛圍之後。這些不斷地、往復地發生的質疑及其事件——這

¹¹¹王璐（2018）〈留學香港：熊掌還是雞肋？〉，《多維CN》第37期，見「多維」，<https://pse.is/QNKYF>

裡稱它們為史前史，一早就透露了香港社會跟內地生的割席，尤其是當激烈的社會衝突發生且關乎本地資源、中央／中共、香港「核心價格」時。於是，反修例運動中涉及到內地生的印象和認知及他們受到的核心質疑，是跟過去十幾年結構性地一脈相承的，只不過在今次香港社會自身集中的、激烈的衝突中，更加集中、激烈地發生。

我們最早可以追溯到的在校園內涉及內地生的議題大概是 2009 年，劉逸舟參選城市大學學生會內閣成員，因為內地生身分引發爭議，不過他順利當選且連任至 2011 年。2010 年中大經濟系研究生自殺，引發對於內地生在香港社會生活和學習壓力的關注。此時關於內地生的討論仍主要在於，因為與本地生的生活習慣差異和文化差異，內地生習慣跟自己人玩，難以融入本地生。前文提到的內地生來港的動力侷限、對本地教育與就業資源的擠壓，是持續在發生的現實；把香港當作「單純的」「異地」缺乏對於香港的理解動力，以及如履薄冰又有著創傷的狀態下的距離感、壓力和無聲，也是內地生群體持續累積的狀態和情感。然而，要到 2011 年中港矛盾在民間爆發後，校園內的本地生和內地生才感受到彼此的張力。雨傘運動更是對於內地生跟本地生、香港社會關係而言的重要轉捩點。因為雨傘運動爭取雙普選的民意和港府、中央惡劣回應方式造成的普遍不滿，中共組織透過內地生滲透香港，以及香港「核心價值」與內地生之間的差距，成為校園內本地生與內地生矛盾的核心。關於中共組織的滲透，

（一）內地生作為中共組織滲透香港的媒介

2010、2011 年，參選城大學生會內閣成員的內地生劉逸舟因共青團員身分被質疑；參選嶺南大學學生會內閣主席的內地生廖維懿被爆出共產黨員身分，而後本人退選、內閣解散。隨後，城大、嶺大等學校的內地生發起小規模的「我戴過紅領巾，但我不是怪物」行動，在校園內引發與本地生的爭論。2015 年，參選港大學生會內閣成員的內地生葉璐珊因為（前）共青團員引起質疑；2019 年初，「港大內地本科生聯合會」只公開發布文宣支持參選學生會的「蒼傲」內閣，使得「蒼傲」被質疑與內地生組織的關係。這些歷史是高度相似的。不過 2010 和 2011 年參選的劉逸舟是城大歷史上第一個參選學生會的內地生，自然會受到關注，其共青團員身分受到一些質疑和抗議；但他也表示：「絕大多數香港同學和朋友都認為參加競選應該靠實力說話，而不能以背景取人。」¹¹²

劉逸舟在兩年間順利當選，但中港矛盾爆發後的 2013 年，有共產黨員身分的廖維懿參選及退選，便引發關注。基於各階層民眾對內地人擠壓香港本地資源的不滿，傾向本土主義的政治行動者和論述者強調種種擠壓香港資源的行為都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引導甚至推動的，同時中央亦透過在港就業、結婚的新移民逐步影響香港政治和文化。所以不只是一向被認為親中且跟中央有各式密切聯繫的建制派，新移民也被認為是跟中央、

¹¹²陳然（2015）〈「港漂」心聲：我為何留在香港〉，《人民日報（海外版）》，2015 年 2 月 16 日，第 03 版，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5-02/16/content_1534856.htm

中聯辦或建制派有密切關係。在香港社會的印象裡，大部分內地生都會在畢業後留在香港就業並取得永久居住權，於是內地生跟新移民是相似地被中央政策引導的，也跟各式與中央有關的組織有或明或暗的關係。這些懷疑是有其歷史正當性的，從戰後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組織，到九七後中聯辦對建制派或其他親中人士的主動串聯，連結和籠絡政治、經濟和文化勢力確實是中共在香港的重要工作。但當這種有歷史基礎的懷疑成為無限擴展和累積的集體情感，對中共滲透香港親中群體的懷疑便逐步彌散成為對內地身分的懷疑——所有內地出身的人的組織都有可能是被中共滲透的。

學者葉蔭聰在 2014 年在台陸生蔡博藝參選淡江大學學生會主席時，指出在台陸生參選和在港內地生參選有不同的背景，因為香港有中聯辦：「中聯辦一方面會在香港監視在港陸生，不少持異見的陸生不敢高調參與政治活動，包括六四晚會及七一遊行，以及跟泛民親近的學生或民間團體。同時，中聯辦亦協助組織內地學生學者聯合會 (CSSA)，吸納陸生中的活躍份子。而且，中聯辦有在大小事務上插手控制香港，造成香港社運界及泛民人士的反感及抗拒。」¹¹³所以如何在香港找到內地生公平、合理地參與公共事務的方式，需要更多的摸索。然而，因為占中和雨傘運動中港府和中央的惡劣處理，民眾對於中央控制港府的憤怒更加強烈，對中共在持續並進一步政治滲透香港的懷疑更加強硬，本土主義的思潮也更加彌散。於是，真正引起超越學界的關注並引發爭論的內地生參選，是 2015 年葉璐珊因共青團員身分（已因年齡逾限而自動退出）和曾邀請某福建省政協委員參與高桌晚宴而受到抵制。她本人在受訪時提到，參選的初衷是覺得港大學生會對非本地生較少關注，而自己受到抵制的原因是一些港人以內地身分為原罪。當有論者指出所有內地生只要參選學生會必須交待政治背景，仍引發了關於香港身分政治的反思。因為葉璐珊在參選期間未曾有任何親中或反中的政治言論，有論者提出對她的抵制呈現了反共是內地生要交的「投名狀」，也就是說只有明確表示自己反共或是認同香港核心價值才可以擺脫內地身分的原罪。

對中共政治滲透內地生的懷疑並非只基於身分，與內地生相關的校園組織往往是被直指的「中共組織」實體。2017 年，中大文化廣場出現「香港獨立」標語不久後被校方拆除後，民主牆出現滿滿的「拒絕沉淪，唯有獨立」海報；隨後，數十名內地生參與撕掉海報並貼上自製的「CUSU IS NOT CU」海報，在民主牆現場與學生會成員及大量學生發生衝突。在內地生於民主牆集會前，中大內地學生學者聯誼會 (CSSA, CUHK) 在微信公眾號發文提醒學生勿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姓名等基本資料，如被拍攝可要求對方刪除等。有媒體懷疑是這一內地生組織發起和協助民主牆行動，而這一組織的官方簡介上稱自身與中大研究生院、中聯辦、中旅社、中國（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和其他學校的 CSSA 保持密切聯繫。這一明顯的跟中國政府機構的聯繫，也讓媒體懷疑是它的總會「香港內地學生聯合總會」(CSSA HK) 串聯各校內地生發起民主牆行動；也指出 CSSA 在其他國家也有分會，並引述《紐約時報》報導其美國、加拿大分會皆有監控中國留學生言論並向中國政府報告的紀錄。

¹¹³葉蔭聰 (2014)〈如果大陸學生在港參選學生會〉，2014 年 8 月 12 日，見「獨立媒體」，<https://pse.is/PN7JV>

從上述事件亦可以見得，對於中共滲透內地生組織的懷疑，跟對內地生和香港核心價值對立的懷疑，是緊密連結的。更直接的事例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7月，港大研究生會（PGSA）擬修改會章，包括刪除以繁體字為官方書面語言的條文，並增加活動必須符合《基本法》的條文；本地生集會抗議上述條文，指PGSA因絕大部分成員為內地生而不能代表本地生，且要求PGSA公布財務報告並道歉。11月，在澳洲投誠並自稱中國間諜的王立強，稱自己在香港的任務之一是組織及「教育」大陸學生、引導他們的意識形態，透過設立校友組織，建立網絡，「我們讓一些學生加入學生組織，讓他們假裝支持香港獨立。這些學生取得支持獨立的社運人士資料，並公開他們的個人以至家族成員背景。」¹¹⁴

除了內地生組織，對各式社會、政治機構在組織上、觀念上「染紅」的質疑也會牽扯到內地生。2015年，「內地留港社會工作者發展協會」啟動了「新香港社工」服務計畫，此協會致力於成為組織留港內地社工的平台。協會首任會長汪國波2006年畢業於城大社工系，他被定性「政治取態親中」至少因為他所任職的「新家園協會」（2012年成立）向來被認為是中聯辦的「衛星組織」，以及他「曾公開撐白皮書，指白皮書全面總結『一國兩制』在港實踐歷程，清晰解釋『一國兩制』的含義」。¹¹⁵大陸《社工週刊》也在後續報導中，稱此協會為「香港社工界的愛國愛港組織」。2015年在城大舉辦的一場「當「本地社工」遇上「內地留港社工」：反思中港矛盾下的定位和出路」座談上，與會者質疑「新香港社工」計畫的內地「新」是否暗示著對本地「舊」社工之間社工價值和操守的改變。中大社工系副教授黃洪指出，對社工界「赤化」的擔憂並非針對內地社工的身分和社工個體的價值取向，而是一些地區性社工組織已逐漸參政，不僅「維穩」性質強，且獲較多政府資源。從社工組織和內地社工的「赤化」回推，在校社工專業內地生是否存在「特派學生」也成為議題，也呈現出一直以來內地生的親中取向都是被關切的。

但大多數內地生不會認為自己跟中聯辦或中共有關係。內地生參選學生會因共青團員身分被抵制，自然會被內地生視為荒謬的，因為在大陸幾乎百分之九十的中學生都是團員，甚至有黨員身分的同學也大多沒有自覺的政治性或政治企圖。內地生即便參與CSSA或中聯辦主辦的活動，大多都是日常生活、娛樂、學業或就業指導，縱使他們隱約知道這些團體在有意地接近和籠絡內地生，卻覺得自己並沒有跟中聯辦有任何政治關係。出席前文提及的質疑社工界存在「赤化工程」座談的社工系內地生Jupiter也確認「班上的確有同學出席過這類中聯辦的聚會，部分人國家主義情愫非常濃厚」，但他也強調「即使學生到中聯辦留名報到，都不代表與中聯辦有緊密聯繫，班上三十多個內地生，就只有一、兩個和中聯辦有固定接觸」。¹¹⁶內地生對於內地生組織跟中聯辦的關係，

¹¹⁴ 〈稱策畫滲透大專 誘內地生起底社運人士〉，2019年11月23日，見「立場新聞」，<https://pse.is/L9Z38>

¹¹⁵ 〈當本地社工遇上內地留港社工：社工界的赤化危機〉，2015年8月22日，見「立場新聞」，<https://pse.is/QXCVX>

¹¹⁶ 〈當本地社工遇上內地留港社工：社工界的赤化危機〉，同註15。

也是既有所洞察，又覺得跟自己無涉。中大內除前文提到的 CSSA 分會，還有由內地生自發組織、上海總會資助、從屬於學生會的內地本科生聯合會（MUA）這一最大的內地生團體。在 2012 年《中大學生報》關於 MUA 的一篇訪談中，主席劉繼堯確認了 CSSA 跟中聯辦的關係，也澄清了 MUA 的相對獨立：「每年中聯辦看的是 CSSA 的活動計劃，管不到我們。而且中聯辦很少接觸我們，就算真有需要，基本上也是透過 CSSA，但 MUA 和 CSSA 並非從屬關係。所以 MUA 和中聯辦可以說是沒有關係的。」¹¹⁷

於是，當覺得自己跟中聯辦或任何中共組織沒有實際關聯的內地生，遭遇香港社會對於內地生或內地生組織被中共滲透的質疑，內地生便會認為這全然是針對內地生身分的敵意或歧視。正因此，2013 年嶺大內地生因被爆出黨員身分而退選後，城大、嶺大等學校的內地生發起小規模的「我戴過紅領巾，但我不是怪物」行動。可以見得，他們認為這是針對內地生身分的事件，他們沒有直接反駁中共組織滲透了內地生、內地生組織或學生會（因為他們不認為這是真問題，也因為無力以確鑿證據反駁），而是為自己的身分正名，強調自己只是因為出身內地所以會有團員或黨員身分，也不應該僅因為內地生身分就被懷疑有任何政治企圖。兩傘運動後的 2015 年，《環球時報》和《人民日報》分別發表過關於內地生的報導，不只提及這一年內地生參選港大學生會被抵制，也翻出 2011 年和 2013 年內地生參選城大、嶺大被質疑的新聞，說明內地生僅因身分被惡意對待，也指出本地生應該放下優越感，而內地生應該多跟本地生接觸。此時官媒強調身分為核心問題的取向跟內地生對這些事件的認知和感受是相似的；但時至傘運後本土派的力量在學運中越來越強，官媒和內地生對校園內學生會和本地生狀況的認知便發生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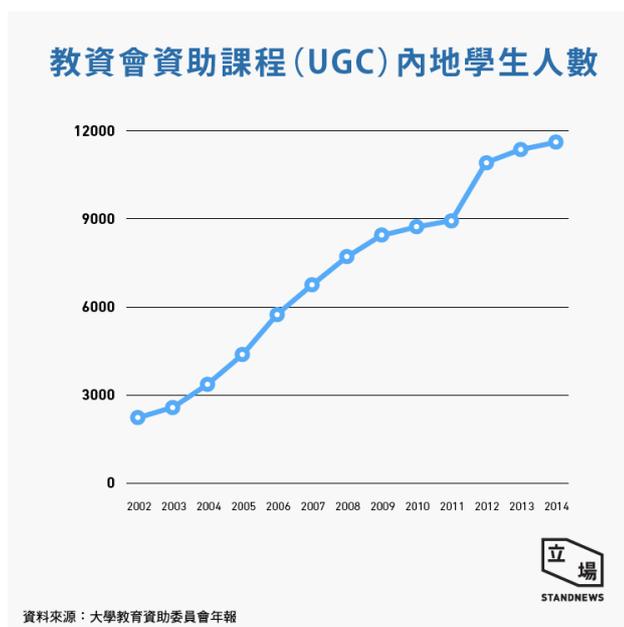
（二）內地生搶占香港就學及就業資源

2013 年，臉書出現「反對本港大學大陸化，保障港人受教育權利」群組；2013 年成立的主張香港獨立、香港民族主義的團體「香港人優先」，亦曾在 2014 年前往城大示威，要求城大限制內地生比例不可超過兩成。內地生申請與就讀數據和內地生群體的組成變化，皆關乎在香港社會與校園內關於內地生的諸種爭議，尤其是隨著 2011 年雙非孕婦議題出現、2011 年內地人開始搶購香港奶粉至 2013 年進入白熱化、2012 年反水貨客的「光復上水」行動，反對大陸人占用、擠壓香港資源的社會氛圍高漲，內地生搶占香港教育資源也成為隨後興起的論述。

內地生是否擠壓了香港的教育資源，至少涉及到內地生占本科生的比例，與內地生占受資助研究型研究生的比例。內地生占港校大學本科生的比例，同時受到港校對非本地生的限額和擴大內地招生的影響。1998 年，香港教育局對非本地本科生的限額為 1%，逐漸增至 2003 年的 2%，2004 年的 4%，2005 年的 8%，2006 年的 10%，至 2008 年則驟

¹¹⁷W.A.L.K. (2012)〈內地本科生聯合會：你不知道的事〉，《中大學生報》10 月號，
<http://cusp.hk/?p=2999>

增為 20%。這一大比例的非本地本科生中，內地生確實占據了大部分；2014 學年在學的內地本科生有 6630 人，占非本地生的 71%，約占本地生的 9%。2005 年，在港內地生共 4112 人，十年後的 2014 年，在港內地生共 19606 人，其中約 1600 人為本科生。當民眾提出內地生搶占本地生學額時，往往舉出的具威攝力的數字是——2014 年，內地生占資助研究型研究生的 69%（見下圖）。



說明：此人數包含副學士、學士、研究員修課型及研究型學生

圖片來源：〈內地生十年增 2.4 倍 本地大學資源是否足夠？〉，見「香港 01」2018 年 5 月 10 日，
<https://pse.is/RWCYY>

八大院校國際化/內地化一覽圖

	城大	浸大	嶺大	中大	教大	理大	科大	港大
中國內地	838	727	155	1445	285	1167	652	1457
亞洲其他地區	379	14	16	489	17	316	611	850
其他地區	30	3	0	68	0	53	84	67
非本地生總數	1247	744	171	2002	302	1536	1347	2374
非本地生佔總學生人數比例	10%	11%	7%	12%	6%	11%	15%★	15%★
中國內地生佔非本地生比例	67%	98%	91%	72%	94%	76%	48%★	61%

數據來自教資會，2015/16年度，只計算學位課程

圖片來源：梁啟智〈八大院校國際化/內地化一覽圖〉，「立場新聞」2017 年 5 月 19 日，
<https://lurk.pse.is/SM9EY>

當這一驚人的數字被提出時，不少香港教育業者指出內地生占資助研究型研究生的近三分之二，原因不在向內地擴招，而在於受到香港就業壓力和學校對修業年限的嚴格限制，香港學生不願意讀研究導向的研究生學位（尤其是非商科、經濟學科），港校只能招到非本地學生從事研究並受政府資助。然而，這只是內地生占比巨大的直接原因，港府教育規畫和教育政策乃結構性原因。一方面，港府為提升大學排名，不斷提高學生國際化數字，卻沒有致力於數字之外的知識、課程與研究的國際化，造就的只能是以內地生為主的「偽國際化」。另一方面，同樣為提升大學排名和教育資本，港府沒有著力於研究與知識發展的本地化，無能於推動本地生有更多動力和條件從事研究。

當內地生搶占本地資源的爭議浮現，被提及的不只內地生搶占本地生學額，亦包含內地生畢業後留港工作搶占本地就業資源和住房資源。港府的 1994 年「輸入內地專業人才試驗計畫」、1999 年「輸入優秀人才計畫」、2001 年「輸入內地專業人才計畫」、2003 年「輸入內地人才計畫」和 2006 年「優秀人才入境計畫」，對於輸入非本地人才在香港就業的效果並不明顯。1999 年的優才計畫，至 2003 年收到 793 個申請，279 個申請獲准。真正惠及內地生的是 2008 年放寬內地畢業生無條件留港一年的政策（IANG 簽證），不過真正在 IANG 簽證完結後申請並取得香港居留權的內地生不足 IANG 簽證的十分之一（見下圖）。至 2015 年，每年通過各種計畫取得居留權的大陸人雖不足一萬人（同年，上學、短期工作、長期工作在港的大陸人約十五萬人），確實對本地就業與住房資源造成一定擠壓，而且成為一個非常有存在感的群體。



圖片來源：梁啟智〈專才、內地生有否推高樓市之好認真數據分析〉，「立場新聞」2018年5月24日，<https://lurk.pse.is/SB5Y7>

2011年反雙非孕婦在港產子時，部分港人稱雙非孕婦為「蝗蟲」；2012年反水貨客

「光復上水站」和反對擴大自由行時，跟「保衛家園」、「上水我做主」、「香港快陸沉」同時出現的是「滾回中國」的標語和口號；2015年反水貨客「光復屯門」和「捍衛沙田」時，出現最多的是「滾回中國」。反修例運動期間，早期在上水、屯門、沙田的行動和後期各區的「和你shop」行動中，除了運動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之外，出現最多的亦是「滾回中國」。「滾回中國」逐漸成為了面對中國議題和內地人時最常見的反應，於是在中港矛盾爆發後的幾次本地生跟內地生的衝突中，也會看到「滾回中國」的海報或謾罵。這些不論對於普通內地觀光客、雙非孕婦、水貨客，還是對於內地生的呼聲和謾罵，都被內地生視為針對內地身分的敵意甚至歧視——就像是他們面對關於中共組織滲透香港質疑時的反應和認知——並且成為在香港社會中感受到的創傷的重心。縱使大部分內地生都會認為在香港校園和社會中感受到的惡意是少數，但這些被他們視為針對內地身分而來的「滾回大陸」，卻對於本就小心翼翼地、壓抑無聲地生活著的他們成為逐漸累積的創傷感。

面對內地生擠壓香港就學和就業資源的不滿，絕大部分內地生並不認同。一位在浸會大學念本科和研究生的內地生表示，「內地生的學費比本地生高一倍，且獎學金的競爭十分公平。她已習慣香港生活，希望留港發展，但不認同內地生搶香港學生飯碗，因工作機會是自己爭取的」。¹¹⁸這種立基於「公平競爭」的觀點是內地生中極為普遍的。縱使其中的「學費比本地生高一倍」、「獎學金的競爭十分公平」、「工作機會是自己爭取的」都是事實，但內地生來港念書的各種條件背後的構構性來由，是持「公平競爭」觀點的內地生沒能理解的。這一沒能理解的狀況並非取決於內地生親中、愛國與否，而是因為前文談及的內地生狀態——他們基於對香港的較功利的期待把這裡視為「單純的」、「異地」而缺乏深入認識的動力；並且因為教育和階層背景而缺乏深入認識的條件。僅就內地生是否擠壓本地就學、就業資源而論，內地生無能於認識和理解這一議題是因為：一方面，他們沒有認識香港對內地生招生的各種優惠政策之所以產生的背景，既有中港關係的因素，亦有港府教育政策中單向度的發展規畫和缺乏本地化的問題；另一方面，大多出身自中產家庭的他們，沒有認識到自身在中國教育體系中可以成為菁英學生，已經是占據了家庭背景和教育體制問題的既得利益。若沒能認識香港教育政策和規畫，沒能認識自身在中國的成長與就學路徑，便不能理解自己在香港的就學和就業在什麼面向上是「公平競爭」，而在什麼面向上是基於既得利益。

當然，也有內地生基於對香港現實困境的了解，而理解香港社會對內地人擠壓本地資源的現實基礎，理解這些憤怒並非全然針對內地身分：

我了解到了很多我之前在內地看不到的香港。原來自由行開通後，很多香港居民深受水貨客的影響，一些原本有利於居民活動的社區生態被各種購物商場取而代之；原來香港人民沒有權力對中央政府的移民政策說不，導致每天有一百五十個單程證下來香港，不斷擠壓本土香港人的生存空間……了解越多，我反而就越能理解港人

¹¹⁸ 〈中港矛盾又一波，反內地生〉，載《晴報》2013年6月21日，見「etnet」，

<http://www.etnet.com.hk/www/tc/lifestyle/internationalaffairs/news/18344>

那種討厭大陸人，喜歡對大陸人來一句「請你返大陸啦」的情緒。……如果身處在香港的大陸人可以多多去了解香港這個社會的現狀，多站在香港人的角度想，做到理解和尊重，我相信他們也可以用一個更成熟和平和的心態去看待香港人的「歧視」或「敵視」。¹¹⁹

反修例運動的主要訴求和主要情感，並沒有直接涉及內地人擠壓本地資源的問題；但實際上，在過往幾年的運動、論述和失敗感的積累下，在今次運動中已經有了將內地人視為殖民者的共同情感。所以同樣的故事和情感在今次運動中又再三地發生，雖然並不直接關於內地生擠壓本地資源，而是以視內地生為殖民者的情感暗涌出現。科大校長見面會上發生跟內地生的糾紛時，以及中大校長見面會上內地生發言時表明了顯著的異見時，我們都可以聽到讓內地生「滾回中國」的聲音。而備受關注的「撤僑」事件中，校方、警方、中聯辦和中央對內地生的特別協助再一次確認了內地生是中共插手香港的一部分，而內地生也跟上上述對象成為了運動的敵對共同體。對內地生而言，過往那些間或聽到的「滾回中國」，變成了來自平時被視作安全範圍的校園及週遭的同學，而且因運動和校園衝突變得不可迴避，於是因身分而被針對的創傷感只能直接地爆發。與此同時，對於另一些平時就跟香港的現實與情感比較貼近的內地生，卻是在大型運動爆發時，才發現平日裡自己可以理解和消化的種種基於現實困境的港人對內地人的批評，在此時變成了一股巨大的敵意的浪撲向內地人，而擁有這個身分的自己也難以抽身：

就在他與香港休戚與共的願望達到峰值的這個夏天，雨傘運動所凸顯的中港矛盾甚至中港對立突然敲醒了他，他從未執著過的「大陸人」身分好像從皮膚底下跳了出來一般，將他標記為人群中的「異類」。不知從哪一天起，他感覺在香港要小心翼翼。……運動期間他在旺角長駐，接觸的大多是市民階層，亞皆老街的麥克風裡不時傳出本地工人對大陸的不滿，包括「升學和移民政策向大陸人傾斜」、「逼香港人喝東江水」、「水貨客阻住路」等等。這些比「真普選」更生活化的訴求，與港人對中央政策的諸多不滿疊加在一起，使得陳辰第一次感受到了「他們」與「我們」的清晰對立。……

從前在學校，他也見到過內地生被排斥或者發生不好的事就先責怪內地生的情況，但不以為意。當時他從未感覺這些矛盾會讓香港人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但運動中集中爆發的中港矛盾放大了他的觸感，令他「每一個毛孔都可以感覺到別人的目光」。……在和這座城市愉快地相處了四年多之後，他終於體會到身分印記的難以消除。他切身地體會到，他在哪裡出生，帶什麼口音，原來會如此令身邊的人介懷……¹²⁰

¹¹⁹ 〈內地生想聊聊一些我眼中的香港和中港問題〉，2020年1月12日，見「品蔥」，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12233>

¹²⁰ Kiki (2015) 〈在港陸生，無處投遞的熱愛〉，見「端傳媒」，2015年10月2日，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26-hongkong-umbrellamovementtrauma04/>

（三）內地生與香港核心價值的對立：壓抑、小心翼翼與「被代表」

從八〇年代中港越來越多的民間往來開始，港人在很強的優越感之下視內地人為惡劣文化、不文明甚至野蠻，這是兩地媒體和民間都不諱言的事實。中港矛盾發酵後，針對內地觀光客、新移民、雙非孕婦和水貨客的不滿、斥責甚至謾罵也往往在表面、在內裡集中在文化與文明上。2011年，城大本地生在宿舍洗手盆內發現一些食物殘渣並認定是內地生所為，在民主牆張貼譴責並使用了「大陸狗」字彙。2013年，媒體爆出城大內地生因為不滿教授用廣東話授課而與本地生發生衝突，事後本地生、內地生、教授及校方都出面澄清此事由課程設置不合理引起，並沒有媒體渲染的本地生與內地生的衝突。2016年，浸會大學內地生在民主牆張貼簡體字文宣，稱因為看不懂學生會繁體字信件而要求退會，引發關於簡繁體字的爭論。同年，當選港大校委會研究生代表的內地生朱科，因在競選期間向同學發放微信紅包，被指賄選；事後各方的檢討與批評多指向這一不妥的行為，是由於兩地生活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差異，以及對彼此的文化不理解。

但這些涉及到文化差異和文明與否的事件，並非內地生議題中的主要矛盾。這種有沒有文化、文明不文明的爭端主要還是針對觀光客、新移民、雙非孕婦和水貨客，而在內地人「整體」中屬於較高階層位階的內地生和「港漂」則可以相對地免疫。這種相對免疫不只因為經濟位階，也因為內地生和「港漂」作為文化菁英，可以率先覺察到中港之間的文化、文明位階，而且他們也具備經濟與文化的條件去把自己跟其他內地人區分開，從而減少這種既定位階可能帶給自己的傷害。所以，相對於那些大大咧咧的觀光客、新移民、雙非孕婦和水貨客，大部分內地生和港漂都曾描述過自己在香港都是小心翼翼地生活。有些人會努力學習廣東話，或是儘量避免在公告場合講普通話，或是一律講英文；他們在街道、地鐵、教室和辦公室，都要低聲講話、遵守秩序、不要碰撞到任何人；當然，還有另一群「港漂」只是工作在中環、生活圈只在港島，在用著另一些更加小心翼翼的方式生活。他們會強調這種小心翼翼是因為看到了內地身分會受到的差別待遇，所以既要掩蓋內地身分，又要比香港人更有文明、更文明——但他們不會直面的是，這些小心翼翼也是為了把自己跟其他沒有自覺、沒有能力掩蓋身分的內地人區別開來。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跟香港社會之間確實存在著政治意見和觀念的差異，只是小心翼翼地留意文化和文明是不夠的；為了要不落入港人對內地身分的預設、為了區別於其他內地人，他們還要跟香港社會保持安全的距離，並且迴避政治議題——不可以太親近、不可以太動情，也就不會太動氣、不會太受傷。

香港媒體習慣把內地生和本地生／香港社會的爭議或衝突，呈現為不同政治政見之間的矛盾，內地生和本地生的關係也逐漸在人們心中被定型為「矛盾」。內地生和本地生／香港社會之間衝突有很多層面，除了我們在前文提及過的關於「中共組織滲透香港」、「內地生擠壓本地資源」和「惡劣文化和不文明」的矛盾，最多的衝突確實是關於「內地生與香港核心價值的對立」。大多衝突是呈現為價值——尤其是政治價值——的衝突，但在這一衝突的直接原因背後，是內地生群體的生活狀態、情感狀態、政治觀念和感受、文化觀念和感受。內地生最初來到香港，就被預設為香港核心價值的反面；內地生表現為香港價值的反面並不會超出港人的預期，所以大多數情況都是內地生主動說話、行事，

才成為導火線引起衝突。在我看來，內地生發聲的主要動因和核心情感狀態就是壓抑之下累積的不滿。平時因為遭受到一些來自本地生或本地民眾的偏見和 unfair 對待，要小心翼翼地生活、保持距離、迴避政治，也可以接受。但長期的壓抑，終會以自己可以設想的、有意的或是反射式的方式表達，引發情緒化的、防禦式的衝突。

2015 年 11 月 17 日，世界杯外圍賽香港與中國的比賽，香港球迷在觀眾席舉起「Hong Kong is not China」標語，引起中港及國際媒體的關注，隨後各校也出現了這句口號的文宣。城大民主牆出現「Hong Kong is not China」海報，一名來自內地的交換生撕掉文章並被目擊。同年，理大民主牆也出現同樣的海報，隨後若干內地生在民主牆貼出反對意見，引發兩方學生在民主牆的車輪戰。內地生貼出「HK belongs to China」、「香港沒有民族自決權」、「不服來戰！」、「你們這麼鬧我就放心了，香港的未來就靠你們了」，「我為你們的智商感到捉急」；本地生則貼出「大字報睇來似中國文化大革命」、「我出生就係香港人，非中國人！」、「HK is not China. China is not PRC」、「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全港大專生使用民國紀年抗議打壓香港民族自決，中華民國框架下實現香港民族自決」。參與出擊民主牆的內地生汪煜說，「許多人對他表示『出了一口氣』，『憋了兩三年的怒氣終於發出來了』。他說，日常生活中積攢的怒氣，同學們『平常都忍了』，而這次的『HK is not China』，讓內地生中的不少人都感到『實在是忍夠了！』」。¹²¹

這些內地生平日積攢的對可以發聲的本地生怒氣，和對於自己無法發聲的壓抑，以防衛式地、泄憤式地爆發出來，也激發了本地生平日在校園內沒有直接表露出的對內地生的政治反感和政治攻擊。然而，內地生的怒氣並非只是指向抽象的、總體的本地生，也常常指向學生組織。2017 年，中大文化廣場的「香港獨立」標語被校方拆除，不久民主牆出現滿滿的「拒絕沉淪，唯有獨立」海報；隨後，數十名內地生參與撕掉海報並貼上自製的「CUSU IS NOT CU」（中大學生會不是中大）、「對不起，我們拒絕被代表」海報，在民主牆現場與學生會成員及大量學生發生衝突。《環球時報》對此事的報導稱：「撕『港獨』海報，這個率性舉動挺棒的」、「拒絕『被代表』，堅決反『港獨』」；《人民日報》則稱：「大是大非的問題絕對不能漠視，否則校園蒙塵、教育蒙羞，更會損傷法律的威嚴。」然而，最早響應貼海報的內地生指出：「我們活動的初衷是沒有反港獨」，「很多文章說我們『為了』那個（撕海報）女生做了這些事，完全不是。」¹²²中大民主牆事件跟理大民主牆事件的差別在於，中大內地生的直接訴求是否定學生會的代表性，同時批判港獨言論。中大內地生主要參與內地生組織，學生會平日對內地生和其他國際生的關注不多，內地生組織的訴求也主要通過跟其他學校部門溝通。雨傘運動後學生會以本土派為主導，內地生跟學生會平日的意見不一致，又長期沒有疏通的管道。

9 月 5 日晚上，大陸女生撕海報後，民主牆火焰席捲至這個微信群，大家都留意到

¹²¹金其琪、江雁南（2016）〈燃燒的民主牆：陸港大戰中，突襲的內地生〉，見「端傳媒」，2016 年 2 月 5 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205-mainland-democracy-wall>

¹²²楊子琪（2017）〈撕裂民主牆：他們的聲音，被「港獨」戰火掩蓋了〉，見「端傳媒」，2017 年 9 月 11 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912-hongkong-democracy-wall/>

內地生和學生會成員對質的視頻。何心悅解釋說，過去四年，大家積累了太多對學生會的不滿，而這次「學生會代表大家支持港獨」，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上莊的時候那個政綱就已經寫得非常露骨。用我的錢，做一些我不太同意的事情。」說起之前的「星火」，何心悅十分不滿，目前中大規定所有學生每年向學生會繳納 100 港元會費。¹²³

當突來的矛盾出現，沒有了溝通與協調的機會，內地生壓抑的不滿和異見只能通過「表達反對」來紓解。而當大多數內地生平日是政治冷感且刻意跟中港政治保持距離的、對這些議題並沒有長期思考的積累，那麼這時候壓抑的紓解方式是「表達反對」，而「表達反對」的方式是缺乏思想內容的發泄。（當然，不只內地生，本地生那一方也是一樣的。）還有很多參與行動的是 9 月剛來到香港的新生，更難以有對香港的理解和長期思考的積累。於是，除了在衝突現場的對峙中可以聽到「香港獨立！」（廣東話）和「反對港獨！」（普通話）還有「好好學習！」（普通話）（因為對本地生的刻板印象是成績差、不用功），還有為數不少的有文字的表情包——「我們家的雞，一根毛也不能少」、「中國才是你爸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我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人」、「關愛智障的眼神」之類。

此外，中大內地生不滿被學生會代表的訴求，也常在其他內地生的發聲或行動中看到；譬如，2016 年，港大內地生因為認為學生會主席撐港獨，抗議「反對港大學生會必然會費」。很多論者或不同意見的內地生從學生會的代表性、代議政治的原則，來批評內地生「學生會不代表我」的訴求。但在我看來，內地生這種對於「被代表」的不滿，跟學生會究竟有沒有代表性無關；而是，一方面因為沒有公共發聲的習慣，也沒有在良性協調和互動的管道中進行公共發聲的經驗，在這種無聲狀態下對於「被代表」便特別敏感；另一方面因為，當自己被那些異議的聲音「代表」了，自己真實的政治冷感和刻意的跟政治保持距離就會功虧一簣，讓自己置身於中國政權的風險中，也將丟失了那些在港念書的期待和既得利益。中大校長見面會上發言的內地生，在接受《環球時報》專訪時就提到內地生一定程度上被「抹黑」、被「污名化」，「很多內地親友、網友看了片面的報道，或者網絡流言，就指責我們說，『在港內地生變黃了』」，「更多時候是被黃絲刻意用文宣抹黑，比如明明是反暴力的表態，卻被惡搞、改圖成為支持暴力的『假文宣』」。¹²⁴而「撤僑」中留守的內地生在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說道自己並不想離開、中大並沒有那麼危險，也被她強調是媒體「斷章取義，歪曲剪輯，捏造與事實相反的論調」。所以她的發聲是為那些被污名化的同學澄清，爭取減少網絡暴力對內地生的二次傷害。

同時，這種爆發式的、單向度的「反對」的表達，不只因為長期壓抑的狀態、缺乏疏通的管道和缺乏思考的積累，也是因為過往溝通的疲倦和失敗。由於內地生在表達發對意見時的強硬和堅定，那些不認同香港某些「核心價值」的內地生，已經被本地生認作是被愛國主義洗腦的。同樣地，本地生因為在中港矛盾激化下對內地同樣堅定的批評

¹²³ 〈撕裂民主牆：他們的聲音，被「港獨」戰火掩蓋了〉，同註 22。

¹²⁴ 〈辱罵中堅定發言 中大內地女生：只怕他們聽不到不同聲音〉，同註 2。

和傲慢，也已經被內地生認作是反黨、反中、歧視內地人的。當衝突發生，雙方因為過往溝通經驗的疲憊和因失敗的溝通而來的創傷，便放棄了溝通。雙方放棄溝通有其情感的歷史性，也透露了在過往歷史包袱下要重新打開對話，首先要做到的還是進入對方的經驗、情感與知識脈絡去批評和對話。

（四）內地生與香港核心價值的對立：當常識被挑戰，及「黑洞」般的政治感

中大民主牆事件的起因和核心問題並非內地生與本地生／學生會矛盾，而是校方在開學之初便因為拆除「香港獨立」宣傳品並稱違反法律和大學立場，引發了學生會和學生對校方自我審查和打壓言論自由的普遍不滿。當民主牆出現幾乎滿版的「香港獨立」海報，首先發生的是一名內地生撕掉海報，並與在場學生和學生會成員論辯；論辯影片被《環球時報》轉傳，被大陸網友廣泛讚揚、打氣並群起咒罵「港獨分子」。隔日，有內地生發起貼海報行動，數十名內地生前去響應，跟在場學生及學生會成員發生衝突。當日常的公共發聲和政治參與並非內地生的自覺，這次不少內地生很快地響應並行動起來，很大程度上是被官媒和輿論所鼓舞和推動的。當政治是日常的禁忌，官媒和輿論卻給內地生事先提供了政治正當性和燃料，讓內地生在長期壓抑的基礎上可以迅速抱團並且士氣大振，也讓日常的創傷感變成一種膨脹的、壓制性的、檢舉式的行動。

那麼，為什麼內地生會在反對學生會代表性的同時，也將對立面的本地生和學生會視為「港獨」，將自己的行動視為「反港獨」？當然在地脈絡下部分本土派確有獨立的思想與政治勢力，但對於很多不了解香港政治和運動脈絡的內地生，訴求抵抗、反共和本土主義的思想勢必是「港獨」。當內地生發現自己跟本地生出現政治觀點的差異，大多數人面臨的是常識被挑戰。在我看來，是內地生在中國大陸的成長和教育下生成的政治感（政治觀念和感覺），造成了他們在面臨常識被挑戰時將一些對立面視為「港獨」，以及隨之而來的對「港獨」的反應方式。

不論是學校教育、家長關於「遠離政治」的勸導、耳濡目染各種新聞或輿論中對政治議題的評論或經歷，還是平日裡對中國政府政治宣導的感受，都讓政治被內地生感覺和認識成一個「黑洞」——深不見底的，不可觸碰的。於是，不少內地生對中國政治的反應都是「我認同中國，不喜歡共產黨，但我不會刻意去跟它反著來」。因為「國家主權不可侵犯」、「國家統一」、「香港（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是內地生的政治常識，當常識——尤其是政治常識——被挑戰時，常識動搖時的未知感加上「黑洞」般政治的危險感，給內地生帶來的是加乘的來自未知、意外的不安全感。跟這種不安全感相對的是，內地生對香港的期待是在社會「穩定」之下的既得就學和就業利益。在這種對「穩定」的優位期待下，他們認為「在中國沒有民主照樣也可以活」，而從兩傘運動到反修例是「屬於他們自己沒事找事，然後去做這件事」。但是，他們看到的只是在中國的「穩定」下「沒有民主也可以活」的中產階級和資本家，而不是那些因為沒有經濟的、政治的民主而「活不了」所以不得已「沒事找事」的底層勞動者。也因為政治是

「黑洞」，在大陸的大多民眾只是等著國家給予好的政策、好的變化，所以包括內地生在大陸的民眾往往覺得種種抵抗的作為是無用的。縱使對雨傘運動有很大程度上理念認同的內地生，也感到「我很驚訝，那麼多人樂觀地以為，占領就可以成功。他們真的不了解中國耶！只要對中國有一點點理解，就不可能這麼樂觀。但就是因為這種樂觀，讓學生做了些錯誤判斷。」¹²⁵

「星火」曾在政綱中提出「香港人有權以武力或和平手段，抵抗侵佔香港公共資源之外人」，並在校園福利品部寄賣「Hong Kong is not China」旗幟，這讓他們無比憤怒：「這是很過分的口號。」在他們看來，本土思潮意味着對內地人和內地文化的排斥。「普通話是原罪。簡體字是原罪。」何心悅生氣地說，「在他們 mass mail 裡面出現各種什麼『赤化』啦、什麼『香港淪陷』啦，然後『港共』啦。」在她看來，學生會使用這些措辭，代表學生發出各種主張，其實排擠了會員群體中的一部分，包括和她一樣的內地生群體。¹²⁶

當內地生看到關於「獨立」的言論，不僅因挑戰了常識而激發了政治「黑洞」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更刺激了個人的「玻璃心」。這種玻璃心不僅緣於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下的自私和脆弱，也緣於中港矛盾下雙方對身分政治的敏感和脆弱。於是，當內地生看到「獨立」言論時，會反射式地覺得這些往往跟批評普通話、簡體字、對本地資源的擠壓連結，也就是說「獨立」言論就是對自身內地身分的敵對（部分事實確實如此）。基於內地生的敏感與脆弱狀態，感受到因身分而來的受傷是自然的；同時，這種受傷經驗也是可能經由對本地脈絡、本地情感的理解、新的共同感的建立，而脫離「耽溺」狀態，成為更具同理性的、返身性的受傷狀態——

回憶起自己大一初入學時，由於不會粵語而感受到一些排斥，站在民主牆下看著關於香港獨立、新移民或內地生搶奪資源等留言，她想跑掉，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不該在香港，「覺得十八年來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正義性消失了。」……陳曉先是用了一年時間適應香港的日常生活，又在上海、北京遇到類似的排斥後，意識到排外情緒的普遍存在；大二，她因學生活動了解到更多香港社會運作的細節，到歐洲的交換則進一步讓她對比到歐洲與香港的一些類似、以及與內地的不同。陳曉在這一系列「蠻心酸的途徑」後，逐步放下一些心結，而反修例運動的爆發，則將她真正捲入了香港。¹²⁷

進一步地，因內地身分而來的自身情感的受傷，跟因「獨立」而來的國家主權的受傷緊緊捆綁在一起了，這種受傷感可能會表現為對作為強勢力量的國家的依戀和向國家尋求依託。又因為中國政府和媒體的鼓勵，內地生的抱團發聲表現為「為國家發言」，

¹²⁵ 〈內地生撐／唔撐香港〉，見「立場新聞」，2015年11月22日，<https://pse.is/QC9XD>

¹²⁶ 〈撕裂民主牆：他們的聲音，被「港獨」戰火掩蓋了〉，同註22。

¹²⁷ 楊鈺、邵斯玄（2019）〈反修例運動中的港漂，被打碎的和被重構的〉，見「端傳媒」，2019年10月4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04-hongkong-anti-extradition-bill-movement-mainlanders/>

民主牆上有頗多維護國家主權、批判做英美走狗和「中國才是你爸爸」的口號，而幾乎見不到直接反對對內地人、內地生自身傷害的主張——因為國家主權的受傷象徵著自身的受傷，國家主權的維護也代表了自身的保護。這種發聲的情感狀態，至少造成了發聲中的兩個樣貌：因為主權受傷也是自身受傷，所以「主權問題不可討論」；因為主權被外來敵意傷害，所以「獨立」勢力勢必是「外部勢力」預謀傷害的一部分，那麼「獨立」勢力也勢必與「外部勢力」有所勾連；因為受傷感跟主權的牽連和發聲的迫切，只能調動自己最熟悉的語言和其他符號，如國旗與國歌之類。也就是說，內地生在表達反對「港獨」或反對兩傘運動、反修例時，常用掛國旗和唱國歌的方式，有其情感和知識的脈絡也有其侷限，但並非如港人所設想的那樣是被愛國主義「洗腦」的或是「小粉紅」。除卻部分內地生直接宣稱自己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大多參與掛國旗、唱國歌的內地生都認為自己是「樸素的愛國主義」——意即，他們不認為自己是民族主義者或「小粉紅」，而是出於對家鄉的認同或是對中國的「文化」認同而「愛國」。在我看來，內地生「樸素的愛國主義」當然有其歷史性和正當性，但若只是占據「中立」的「樸素的愛國主義」姿態，而沒有相應的、「中立」的返身性檢視，便是已經取了非中立的政治位置。

內地生對「獨立」言論的反應方式，除了緣於政治的「黑洞」感和個人創傷與主權創傷的捆綁，也受到對「異地」和「身處異地」的感覺影響。在中國大陸，跨省市、跨城鄉的移動是改革開放後大部分人的經驗；這些移動經驗涉及的大多是生活方式和在地風俗的改變，以及部分身分位階上的變化，但幾乎不會涉及到政治體制、政治觀念的變化和張力。所以，中國大陸內部的移動是相對「單純」的，這些移動呈現在媒體和主流文化中的樣貌也是打拼、成功、艱辛、孤獨以及一些差別待遇。就算是在香港念研究生的內地生，在大陸內部在異地念大學的經驗，至多要處理的是氣候、飲食、習俗的變化或至多對「落後」地區和鄉村的歧視。同時，中國大陸民眾也很少有處理「異文化」、「異政治」的知識和情感資源。所以，內地生來到香港時並沒有預期要處理複雜得多的「異文化」和「異政治」，且幾乎不具備處理這些的知識和情感資源。如果說大陸內部的「異地」是透過日常生活便可以認識和應對的，那麼「異地」香港的文化和政治是在日常生活之外，還要付出更多的情感努力和知識努力才可以認識和應對。但這些付出遠超過了內地生對自己和香港的「單純」期待，再加上不期而遇的受傷經驗，他們對待「異地」香港的方式就是保持距離和冷漠。

一位對反修例嚴厲批評的內地生，也說出了更深層的感覺：「我只是一個過客，一年之後我就會離開，沒有必要去和這些人有什麼過深的糾紛。我不是需要承擔這場混亂結果的人，就他們才是。所以我基本上會放平心態，不太會去管這件事。」¹²⁸不過，即便是保持冷漠和事不關己態度的內地生，在衝突涉及到自身時仍然要處理「如何看待自身的創傷」、「如何看待自身身分」等問題。而對香港有更多連結和想像的內地生，更要

¹²⁸Amy Chang Chien (2019)〈校園燃燒之後，香港內地生的疏離、絕望與分歧〉，見「紐約時報中文網」，2019年11月18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1118/china-mainland-students-leaving-hongkong/zh-hant/>

在衝突時刻處理「要對異地投入多少情感」、「要對異地負擔怎樣的責任」等問題。終究，要處理這些問題，便要在對「異地」了解和同理的基礎上，情感和知識的經驗中摸索如何在異地找到自身位置。

四、反修例：疾速與劇烈的時空壓縮過程

在我們看到反修例運動中關於內地生的事件，又回看了那些同構著的史前史及其中的認知與情感構造。終究，那些史前史是內地生跟香港社會相互割席的鋪墊，而這次的運動是一個將時間和空間疾速壓縮的過程，讓所有東西產生劇變。現在回看，內地生跟香港社會的關係也在這一過程中疾速和劇烈地變動著：（一）在高度壓縮的運動時間進程裡，不論原本對中國、香港和政治的態度如何，內地生都被迫上陣，被捲入了香港的運動；（二）在高度壓縮的運動時間進程裡，內地生在運動場景、輿論和校園內經歷了各種事件，可能讓他們走上不同的路徑；（三）在緊密壓縮的空間裡，內地生不再是在特定議題中被批判的對象，而是成為整個運動也就是整個社會的對立面；（四）在緊密壓縮的空間裡，很多原本貫行於社會的秩序改變了，而曾經有效的邏輯也行不通了；（五）在緊密壓縮的空間裡，內地生在中國政府、大陸輿論與親友、內地生群體、香港校園與社會這幾個地層間的夾縫變得更狹窄和壓迫了。在這個疾速和劇烈的壓縮進程中，內地生也因為我們前文所論的對香港的期待、群體精神狀態和政治感，而對於運動和香港有了特定的反應和處理方式，也有了不同的走向。

（一）時間壓縮中的被迫上陣與密集經歷

她認為示威者的訴求與自己沒有關係，沒有資格判斷他們的對錯。至於校園內鋪天蓋地文宣海報和噴漆標語，陳同學就非常反感，「理論上貼了那麼多，應該每個人都去看，但我們就覺得很煩，不想看，適得其反，如果用其他方式表達的話，可能也會有興趣去看。」她指出，校園內有民主牆供同學自由張貼海報和告示，在校園其他非指定的地方大規模張貼文宣，沒有遵守應有的秩序，「讓人覺得很野蠻。」但在校園生活，陳同學對所接觸的香港同學印象還是相當不錯：「我們不討論這場運動，平時都是聊聊日常，沒有異樣或惡意，香港同學都挺友善的。」¹²⁹

在高度壓縮的運動時間進程裡，因為運動的白熱化、參與者情感的激烈化，大多數政治冷感或是刻意跟香港保持距離的內地生，都被迫上陣了。他們原本小心翼翼的生活狀態被打破了，被迫地捲入了情感、思考和行動的變化。一方面，也可以說原本小心翼翼的狀態變得更加如履薄冰，跟原本熟悉的本地生朋友之間要相互試探、難以放心地對

¹²⁹ 〈在高喊「光復香港」的校園走過，沉默的內地生怎麼想？〉，同註 10。

話，或是為了維持關係彼此默契地避而不談。「Facebook 論壇和內地生樹洞平台上激烈的中港矛盾爭論，這一切都在提醒你，我們在經歷不『正常』的校園生活。甚至，作為內地生的我們開始悄悄咪咪地互相試探，通過稍稍透露立場的朋友圈下的點讚和評論，朋友給哪篇文章點的『在看』，彼此在交流中的用詞，在心中默默劃分黃藍陣營。若是嗅到立場不同，我們就心照不宣地不聊政治，只談風月。」¹³⁰另一方面，小心翼翼的生活狀態也因為原本相對穩定的校園和社會在震盪。如果說日常的壓抑和刺痛都可以小心翼翼地忍耐，但他們對香港在學業和職涯上的利益都要以「穩定」為前提，若「穩定」都沒有了，即便不情願也要進入戰局了。此外，被迫上陣時的急迫和激烈狀態和試探時的無奈狀態，都跟內地生群體內部的相異意見對於過往溝通的疲倦和失敗有關，以致於此次衝突到來時大家已經不願意再溝通，只是試探出相異的意見後便放棄交流——也就是說，不只是本地生跟內地生之間放棄了溝通，內地生內部也對彼此溝通感到巨大的疲倦。

父母送她來香港，本身是希望她來一個不需要看人臉色、沒有潛規則、有法制的體系下生活。「來香港的一刻起，他們就打算讓我拿永久居民身分證。為了拿永居，我也犧牲了很多的可能性：我也不能再出國讀書，而且我是做技術的人，回國機會更多。但我留在這裡，就是因為權衡之下，覺得法制和自由更重要。

所以我生活在這裡，是為了得到一張能讓我免於恐懼、有基本自由的身分證。這個身分對我來說很重要。而《逃犯條例》會把我七年來爭取的東西全部抹掉。我不能忍受，」這是一種白色恐怖，張子鴿說。……

警方就往人群中發射了催淚彈。所有人都在哭，叫，罵。張子鴿當時覺得自己會死在這裡。這時人群開始鬆動，有人跑了出去。她也開始跑，跑，找到自己的同伴，一直跑進地鐵站。離開現場，她們相擁而泣……

曾經幫助她學會民主和自由的香港，如今把槍口指向她。會覺得失望嗎？

6月16日，張子鴿和她的朋友再次走上街頭，匯入二百萬的遊行人群中。除了要求政府撤回法例等，她也要求對警隊過分使用暴力的行為進行徹底調查。¹³¹

在高度壓縮的運動時間進程裡，內地生在運動場景、輿論和校園內經歷了各種事件；被迫上陣地經歷了種種事件後，有的內地生退回了原本的安全區，有的則走向對未知的連結。那些本來就篤信「香港沒有中國早就玩完了」、「香港被寵壞了」、「香港丟了優越感心理失衡」的內地生，經歷了更加尖銳的對立和創傷。而那些原本沒有很強的動力去了解或表態的內地生，有的經歷了警察暴力和手足連結，跟運動的情感同步了起來——為什麼我不出去？為什麼我不去和那些受傷的人在一起？「自己當初僅是因為香港院校的國際排名較高而選擇來港學習。本來她對香港並不了解，也認為香港的事與自己沒有

¹³⁰ 〈內地生筆記：中大校長對話場內外，與那篇讓內地生激憤的人民日報評論〉，同註3。

¹³¹ 徐覓飛（2019）〈走入遊行的「港漂」說：參與運動承擔的恐懼，是你們無法想像的〉，見「報導者」，2019年6月18日，<https://www.twreporter.org/a/hong-kong-extradition-law-mainlanderinhongkong>

關係。但因為實習的緣故，李同學從六月反修例運動爆發以來一直都在香港，了解到運動的起源是由於政府漠視民意，亦從媒體上目睹警方過度使用武力，因而被觸動。」¹³²他們也在這些經歷中找到了跟香港的共同感——「走在人群中間，她愈發清晰地感到自己和周圍人有共同的訴求和目標，感到人與人之間可以為了相同的理想 connect，感到面對不公可以大聲吶喊而免於恐懼的自由，感到自己也是這個社會裡的一個成員。」¹³³還有那些在香港投入了很多的時間與情感，跟香港的人或社區有了共同記憶、共同經驗和依戀的內地生，他們覺得生活在一個地方就應該用在地角度去了解在地的狀況、嘗試理解當地的困境和痛苦，並且承擔一些共同的責任；而在今次運動的經驗擠壓中，邁出了更進一步。

（二）空間壓縮中的「中國—殖民者」與失效的邏輯

內地同學在這場運動中才意識到，原來有不少香港人會把「香港人」的身分排在「中國人」前。他又指出，強烈的本土意識會形成「排外」的風氣，在沒有先了解內地同學的政治立場下，就因身分而敵視他們。一次，他的朋友乘地鐵時，就有香港人拿著顯示「大陸蝗蟲，滾出香港」字句的手機屏幕對著他。面對日漸升級的衝突，姜同學擔心被港人發現他是內地人的身分會被攻擊，因此會盡量避開示威現場。¹³⁴

史前史中「中共組織滲透香港」、「對本地就學和就業資源的擠壓」、「跟香港核心價值的對立」等關於內地生的批判都不再單獨出現。在緊密壓縮的空間裡，內地生只是成為中國—殖民者的一員，也就成為整個運動也就是整個社會的對立面。儘管「不割席」是「反修例」的一大堅持，因在社交媒體上質疑對「內地生」群體的刻板印象而遭到輿論攻擊。內地生群體在運動最初，在還沒來得及表達意見的時候，便已經被割了席、被預設為「他者」甚至「敵人」。運動進入白熱化後，街道和校園裡觸目可見對中國人的攻擊性的標語（甚至「支那」這種字眼），還有媒體報導中被剪碎的國旗和塗污的國徽。「我覺得一個內地生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覺得憤怒很正常，而她也只是用相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態度，並沒有傷害任何人。我不理解為什麼大家會攻擊她，不明白為什麼會把矛頭指向無辜的人。」¹³⁵內地生本就習慣於把對內地生或中央政府的各種批判都視為針對內地身分的歧視，現在看到那些標語和文宣，只會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因內地身分而來的創傷。即便是那些日常溫和、理性的內地生，至少也會覺得這些標語和文宣是以偏概全的、充滿挑釁的，只會加深港陸之間的不理解且刺激雙方情緒。而對於那些共同參與

¹³² 〈在高喊「光復香港」的校園走過，沉默的內地生怎麼想？〉，同註 10。

¹³³ 程雪(2019)〈割裂與被迫——國旗下的兩種沉默〉，見「香港 01」，2019 年 12 月 5 日，<https://pse.is/SLAB3>

¹³⁴ 〈在高喊「光復香港」的校園走過，沉默的內地生怎麼想？〉，同註 10。

¹³⁵程雪(2019)〈族群對立與分裂——如何在反修例中放大〉，見「香港 01」，2019 年 12 月 6 日，<https://pse.is/RRR58>

運動的內地生，隨著越來越多對「鬼」的懷疑和對被視為「鬼」的內地人的「私了」發生，他們在運動的現場不敢輕易地打開微信或是講普通話，因為這時面臨的可能不只是白眼而是圍攻甚至暴力。

他們還沒來得及看到一個自由世界，先看到一個充滿歧視的世界，直接就把那扇門關上了，進入了一種「你們香港人了不起啊？」的狀態，沒什麼對話空間。再讓門重新打開，讓他們理解香港情緒背後的困境，就很困難了。¹³⁶

在緊密壓縮的空間裡，很多曾經有效的邏輯行不通。在香港這個秩序和界限分明的社會裡人們可以拆除人行道護欄、可以在地鐵跳閘，很多原本貫行於社會的秩序改變了。同樣地，當很多自認為客觀、中立的內地生以慣常的理性和秩序去批評運動時，其實並不能意識到自己的批評是無效的。比如，批評口號中的人身攻擊、在校園各處貼海報、無處不在的集會破壞了校園秩序、跳閘和破壞行為讓城市失去秩序。比如，對於校園內被破壞和暴力的批評，看不到行動激進化和暴力被策略與情感推動的脈絡——近年「和理非」的無能和政治緊縮下的恐懼與無助，以及今次運動中在警察暴力下的創傷和政府冷酷下的極度憤怒；即便是聲稱「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的中立言論，也因迴避了國家機器和警察機制在日常運作中的暴力，而實際上是站在並非「中立」的政治位置上的。比如，中大校長見面會上發言的內地女生在受訪中「客觀」、「理性」地論辯著：「那天在校長見面會上聲稱自己遭到警方性侵的女孩，她可以投訴警方或通過律師來解決，但她卻選擇在這樣一個場合通過這樣的方式表達，這其實有威脅校長的成分。校長不是法官，也不是行政長官，沒有辦法判斷事件的真偽。如果僅僅通過她的表述，校長就認定這件事確實發生了。那這不是香港所尊重的法治，恰恰是人治。」¹³⁷然而，她論辯著的這些示威者自己「打臉」的理據，並非她所說的「溝通」。運動當然存在著各種嚴峻問題應該被認真討論，但上述批評完全在運動的演進脈絡外的高空中，亦不能跟示威者的情感同步（至少是在理性上同步），又沒有共通的經驗——這樣的批評只是無效的批評和溝通，正如我們在其他運動批判中反覆看到的。

（三）多重地層的夾縫中

（6月12日）回去的路上，張葉止不住地流淚，她至今未想明白，是催淚彈的緣故還是被清場和險些被踩踏的恐懼。張葉開始查看各媒體當時的直播與報導，查詢當事人錄像，一遍遍和朋友拿著手機裡僅存的一則十秒視頻回憶衝突的起因經過，她不斷質問「如何追責」，「就是覺得他們（警察）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們，還有王法嗎？」

（7月21日）盯著直播的張葉，則轉發了背著書包的男子在元朗地鐵內跪著

¹³⁶ 〈走入遊行的「港漂」說：參與運動承擔的恐懼，是你們無法想像的〉，同註31。

¹³⁷ 〈辱罵中堅定發言 中大內地女生：只怕他們聽不到不同聲音〉，同註2。

請求白衣人不再攻入車廂的視頻，並評論到：「恨到眼冒火。」

但此時，隔著一道防火牆的大陸輿論，則聚焦在「國徽不可冒犯」的憤懣中，甚至有人因此對元朗襲擊叫好。「看對面的聲音太難受了。」撕扯中，張葉把微博卸載了。

早前，張葉曾轉發不少解釋性的文章與闢謠的消息到朋友圈中，不料遭大量指責和謾罵，有人指摘她「港獨」，有人則稱她認知膚淺。張葉耐著性子回復了一些，後來因有感於認知不同而漸漸放棄，甚至把朋友圈也關掉了，「他們在把自己的恐懼投射出來，他們其實不理解香港人的心理，當然香港人也不理解大陸，兩邊差異太大了。」

「我從來沒聽過那麼多的記者招待會，」張葉語氣開始變得低沉，有時她會莫名其妙地哭起來，「還不時要質疑自己，怎麼可以接受暴力？事件究竟是怎樣的？是不是太激進了？」

不過，張葉越來越多使用粵語，除新增的「香港人」身分認同之外，還有一層隱隱的擔心，「如果身邊的港漂聽到會怎麼樣，會不會舉報我？說廣東話對我來說更安全一些。」

張葉瞥了一眼兩邊繼續說到，「我覺得香港不再安全，是因為他們把很多正常的事情恐怖化了，我的思維結構不自覺被改變了，如今回想好可怕，這才短短兩個月。」¹³⁸

在緊密壓縮的空間裡，本就生活在中港夾縫中的內地生，在中國政府、大陸輿論與親友、內地生群體、香港校園與社會這幾個地層的擠壓下更加難以喘息。夾縫之一是，官方媒體的報導和宣導中的偏見和錯漏，讓內地生處在對官媒的憤怒和對運動的不滿之間。除卻前文提到的《環球時報》對「撤僑」的報導所引發的內地生不滿，中大校長見面會隔日《人民日報》發表〈「博文約禮」，港中大學生做到了嗎？〉批判在會上嗆聲校長與內地生的本地生們。中大內地生圈子中流露出各種不滿——「人民日報胡扯啥呢」、「人民日報現在說話越來越口無遮攔了」——但這一方面是因為官媒的偏頗和扭曲，另一方面更因為官媒將「暴徒大學」的汙名扣在了包括內地生在內的所有中大學生身上。但除了對於事實的堅持、對於中大日常經驗的感念，對官媒的不滿亦包含對自身的政治安全與未來職涯「保值」的維護。而這種不滿，也不一定刺激他們回看過往官媒對運動的偏見和詆毀。

夾縫之二是，中國政府和中聯辦對言論與行動的壓制與監控，讓內地生時刻處於自我審查中充滿了危機感和恐懼。「我也怕危險、多顧忌：香港簽證將到期怕有事不能續，母親的擔憂，自己的事務……即使去支持，也只敢遠遠在外圍。但我會承認自己的懦弱，去看去想去記住，慚愧著在心內埋下種子，而不是自以為是地嘲諷或居高臨下地指揮。」

¹³⁸ 〈反修例運動中的港漂，被打碎的和被重構的〉，同註 28。

¹³⁹中聯辦會及時調動某些內地生去監視自己的同學，也有沒有政治任務的內地生向中聯辦或大陸警察機關舉報自己的同學，這些舉報往往會透過家長施加壓力給內地生。

夾縫之三是，大陸輿論、親友和內地生朋友，對運動的不了解、誤解和偏見，讓對運動有較多同情的內地生處在被誤解和羞辱、無力溝通、孤立無援狀況的同時，還要擔心被檢舉。如果不在「愛國」與「暴徒」之間明確地選邊站，就要努力地保持沉默，同時還要承受運動演進中的悲傷與憤怒，時刻感受到的只能是孤獨。「這些（同情運動的）言論令李同學遭朋友激烈抨擊，反問她為何不批評香港新聞『美化暴徒』。她更從相近立場的朋友口中得知，高中同學瞞著她重新開了一個微信群組，並在群組內放出她支持運動的言論截圖指責她，種種在背後非議的行為都讓她覺得額外心寒。運動開始至今，內地生間瀰漫的白色恐怖越發嚴重，甚至有人在內地生的群組裡揚言要將支持『香港廢青暴徒』的人舉報至內地公安和中聯辦。」¹⁴⁰這些在大陸的或週遭的朋友，是昔日的有著共同經歷和情感的「我們」，卻轉貼著官媒新聞或是在微博轉貼著「護旗手」或是「支持香港警察」，在此時已經難以成為「我們」。這些在大陸的或週遭的朋友，跟作為示威者的本地朋友互不認識，卻在親近運動的內地生的世界裡隔空對戰；自己既要面對令人憤怒的官媒新聞和謠言，又或許因為政治風險只能旁觀著作為示威者的朋友在吶喊、行動和受傷，而自己彷彿生活在一個分裂的世界，找不到落腳點。

我亦糾結「離開校園」後應該去哪裡。對於住校的內地生而言，在香港的「家」便是中大。而「離開」，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短時間內都不可能回來了。學校已官方宣布停 sem，父母早已通過國內媒體知曉這一消息，我要如何找藉口說服父母，在一切尚未平靜前回到這所「暴徒大學」？而如果離開了這裏，彷彿也意味着與我所認同的價值「割席」，增深我的愧疚感。……

不可否認內地生參與這場運動亦有其正當性，但同樣，你的「留下來」未必被看見，也未必被認為有價值。……

尤其是在逐漸發現自己的「留下」並不可見的時候。但當我決定是否向他人表達自己的需求且求助時，內心卻經歷了一個頗為反復且猶豫的過程。而引發我內心糾結的根由，歸根結底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是不重要的，因為自己在運動中參與得不夠多、不夠前，承擔的風險與壓力遠不如香港人。¹⁴¹

夾縫之四是，在面對前述官媒、中央政府與中聯辦、大陸輿論與親友、內地生群體的擠壓的同時，親近運動的內地生還要在參與運動時面對來自香港的高度不信任。因為要防範中聯辦和週遭內地生同學的檢舉，不少有動力了解運動或是親近運動的內地生，不敢輕易公開講話也不敢去運動現場，即使去了現場也不敢去前線，甚至目睹自己的朋

¹³⁹ 〈內地生撐／唔撐香港〉，同註 25。

¹⁴⁰ 〈在高喊「光復香港」的校園走過，沉默的內地生怎麼想？〉，同註 10。

¹⁴¹ 〈作為內地生，留守中大是怎樣的體驗？〉，同註 9。

友被打、被捕也不敢上前。內地生要承擔來自國家和親友的壓力實際上比港人要大，但恰恰因此，他們也沒能用實際行動去承擔來自警察暴力和被捕坐監的風險。對於這些對香港有很深的依戀和認同、在情感上跟運動和參與運動的港人高度同步的內地生來說，他們也想要為自己認同的理念行動、想要跟朋友和自己心目中的手足在一起，或是想要留守自己具歸屬感且珍惜的中大校園，卻不能這樣做。這種憤怒、愧疚與自責的痛苦很難跟內地生朋友訴說，也很難跟本地生朋友訴說——他們很難同理這種對權威的畏懼之情的正當性，很難理解內地生作為「外人」對香港的認同與依戀。另一重痛苦是，去到運動現場的內地生恐懼於因為身分被懷疑、被圍攻甚至被打，不敢曝露自己的身分。這樣做是安全的，但總會因刻意迴避身分覺得割裂，終究找不到這個隱藏身分的自己在這裡的價值和位置——按理說，在「異地」應該有更安心、更有「價值」的位置。

五、穿越黑洞：退守或連結，抽離或責任，逃離或留守，固著於或超克身分政治

在過去近二十年——尤其是中港矛盾爆發的 2011 年之後——內地生被質疑是中共組織滲透香港的媒介、擠壓本地就學和就業資源、跟香港「核心價值」相對立。因為香港對內地招生的政策脈絡、內地生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以及當代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知識與情感底色，內地生對香港的期待是一個可以提供國際化的教學與高薪職涯的穩定社會，也是一個「單純的」「異地」。在此基礎上，內地生普遍的政治冷感、小心翼翼和跟香港社會保持距離的狀態，在長期壓抑後會在社會緊張中爆發；又因為他們對政治的感覺和認知、來自國家的壓力，讓他們往往把各式創傷投射為自身身分的創傷，並跟國家主權的創傷相捆綁。在過往關於內地生參選學生會、「愛國」言論和對「香港獨立」言論的憤怒的各種事件中，我們看到的內地生跟香港社會衝突的構造和內地生對香港的認知和感受，都可以在反修例運動中涉及內地生的衝突中再一次重演。

反修例的運動是一個將時間和空間疾速壓縮的過程，讓所有東西產生劇變。在這個疾速和劇烈的壓縮進程中，內地生也因為對香港的期待、群體精神狀態和政治感，而對於運動和香港有了特定的反應和處理方式，也有了不同的走向。同樣經歷了這個疾速和激烈的運動，內地生因為原本的政治社會思考不同、對香港的理解不同、跟香港的連結不同，用不同的方式捲入了運動，也有了不同的反應和去向——退守安全區，或是跟更多的人、事、物連結；從身處的這個城市抽離，或是做出一些會為這個城市承擔責任的批評甚至行動；在經歷了身分的創傷後選擇以更激化對立的方式繼續身分政治，或是摸索身分政治之外的出路；在「私了」和中大衝突後選擇離開香港，或是留守中大。

有的人看了一些網路傳言和偏頗的報導就失去了耐性，回到自己的安全區，只跟安全的人講話；有的人看了一些跟自己常識不符的報導，萌生動力去尋找更多跟運動、跟

香港有關的歷史與現實，嘗試從不同的人口中了解運動。目睹了警察暴力和被破壞的城市設施，有的人只是因恐懼固化了原本的怒氣；而有的人則跟共同經歷這些的人產生了連結之感，因為那些剎那的觸動去探究其背後的歷史和情感。看到示威者針對特定身分的排斥和暴力，有的人因為過往的創傷，退回到自憐和受傷感中，尋求更安全的力量保護自己，並激發更大的對立；有的人同樣因為身分而經歷很多創傷，但因為那些不解和不固著於自己的能力與動力，願意在創傷中打開自己從週遭更多人的視角去理解香港的憤怒和痛苦。

9月，運動的勢頭確實讓人嘆服，那個時候真的在思考香港群眾的力量了。但到目前，似乎已經看不到推進，只剩話語的循環和重複。香港獨立的文宣，越來越無理由的破壞和暴力（打人、破壞銀行），簡單化的辱罵性言論還有標籤也讓人越來越失去信心。¹⁴²

同樣是在這個城市投入了時間、情感和生活經驗，有的人只是急忙把自己從這個「異地」抽離出去；有的人則在創傷中願意承擔一部分責任。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對運動比較同情的內地生，在各種地層的夾縫中，在身分的創傷和愧疚、自責並行之下，仍然可以在運動的脈絡中提出有效的批判——「一方面，我能夠理解無大台的運動中出現個別暴力行為。另一方面，我又會直覺地認為這樣不對。我因此總是感到非常掙扎，只能非常主觀的不把『暴力』和『香港人』聯繫在一起。」¹⁴³有的人已經對失敗的溝通感到疲倦、絕望；有的人還可以看到溝通和改變還在發生——「事實上，我看見有內地生耐心看完校長見面會的直播，開始理解香港，也有本地同學主動和內地同學介紹香港。當校長段崇智經過閉門對話後，都能瞬間從『段狗』變成『段爸』，內地生和本地生的差異，或許沒有想像中那麼大。」¹⁴⁴

同樣是來到了香港，生活在校園、市井與社會，到過元朗、深水埗和中環，看到過清潔婆婆、南亞裔小販、新移民老闆娘、憤怒的示威者、OL和富商。經歷過在這個城市裡各不相同的身分和那些超越身分的內涵，有的人最終還是陷入了身分政治，用另一個身分去抗衡香港人身分；有的人因身分而受傷、遮掩、緊張，卻摸索著讓超越身分的價值可以發生：

因為我們只是來讀書的學生，我們無法體會香港人的痛苦，無法與香港人共同承擔這場運動的後果；因為我們「內地人」的身分，因此不敢走得太前、參與太多，沒有做好為此犧牲自己和家人的準備，失去的東西沒有本地學生多。但在這場運動裡，作為「內地人」的我們註定是不持份的「外人」嗎？說到底，數月以來一直呼喊的「香港人加油／反抗／報仇」之中的「香港人」是誰？如果連試圖融入與參與的我們也抱着這樣的想法，是否也是因為我們內化了我們不斷否定的

¹⁴² 〈校園燃燒之後，香港內地生的疏離、絕望與分歧〉，同註 28。

¹⁴³ 程雪(2019)〈與「內地生」對話：對話有意義嗎？〉，見「香港 01」，2019年12月7日，<https://pse.is/SB88E>

¹⁴⁴ 〈內地生筆記：中大校長對話場內外，與那篇讓內地生激憤的人民日報評論〉，同註 3。

那些本土主義論述？¹⁴⁵

內地生來到香港這個城市的整個歷程，像是穿越宇宙中的一個黑洞，當你離它更近的時候，時間和空間會被扭曲，眼裡的光線也會扭曲。它的引力會把你吸入，你可以感受到宇宙的黑暗和黑洞的光亮，但在黑洞中卻很難意識到它幾乎在以光速旋轉。被吸入黑洞，並穿越蟲洞，理應會到達另個時空。但沒人知道究竟會發生什麼，只有穿越了而且到達另一端，才會知道到達了哪裡，再選擇下一步去往哪裡。經歷了反修例也像是穿越黑洞。經歷了運動，有的人依然將自己置身事外，但默默地決定若《逃犯條例》通過便會離開——「我不期望通過我個人去改變、或者達到什麼目的，但會以第三者的角度去看這個社會的發展，根據它發展的方向，來判斷自己該怎麼應對。」¹⁴⁶有的人確定香港不再能滿足自己的期待，應該要放棄了——「我覺得這裡不能讓我安心做研究……我無法跟部分示威者統一觀點，也無法跟他們溝通。如果我留下，未來可能要跟這樣的人成為同學，或者跟他們打交道，我不願意。」¹⁴⁷有的人擔心自己的職涯，希望可以「止暴制亂」——「只能說非常彷徨，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在這裡待下去，這種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同時也對未來產生擔憂，因為一直有類似『內地企業一律不錄用港校學生』的信息……這群暴徒做出什麼樣的事情都已經不令人驚奇了，只希望香港政府能夠儘快止暴制亂，恢復社會秩序。」¹⁴⁸

經歷中大校園衝突，有的人發覺大陸媒體的報導偏頗，但也不知不知未來的方向——「某些報道刻意誇大情況，很挑動人的情緒，讓大陸觀眾覺得香港都是暴徒，和香港不值得珍惜，失望到極致。我覺得無論你的立場是甚麼，這些基本的新聞素養都是蕩然無存」¹⁴⁹，「一個月前我已覺得局勢很嚴峻，以為會有所好轉。沒有想到會進一步惡化。所以，我不知道明年會是什麼情況。」¹⁵⁰有的人看到自己珍惜的校園面目全非，悲傷又愧疚——「覺得內心很複雜、很痛心。覺得自己不配為中大人，本科的同學們這樣堅定地守護中大、去抗爭，而自己什麼都不能做，只能看看新聞。」¹⁵¹有的人則決定儘可能久地留下，以內地生的身分做些什麼，並且超越內地生的身分——

我為校園「占領」中展現出的活力與逐步建立的奇妙秩序感而感到驚訝與佩服，又為前線示威者犧牲自己的日常生活甚至未來感到心酸、難過與無奈，難以判斷這些犧牲是否值得、是否有效，卻又不忍苛責。……我希望同理並支持抗爭者，但又對運動中的部分策略與暴露的問題有所保留。因而，在校園職能部門停擺的情況下，

¹⁴⁵ 〈作為內地生，留守中大是怎樣的體驗？〉，同註 9。

¹⁴⁶ 〈走入遊行的「港漂」說：參與運動承擔的恐懼，是你們無法想像的〉，同註 31。

¹⁴⁷ 〈香港校園衝突後：政治分歧暴力陰影下的內地和台灣學生〉，同註 5。

¹⁴⁸ 〈校園燃燒之後，香港內地生的疏離、絕望與分歧〉，同註 28。

¹⁴⁹ 〈大學示威浪潮中的內地生「撤僑」事件〉，同註 4。

¹⁵⁰ 程雪(2019)〈困惑中徘徊 內地生的「逃」與「留」〉，見「香港 01」，2019 年 12 月 4 日，<https://pse.is/R7J9B>

¹⁵¹ 〈校園燃燒之後，香港內地生的疏離、絕望與分歧〉，同註 28。

儘綿薄之力維繫校園日常秩序的運轉，讓留守者們有盡可能好的生活質量，亦減輕之後重建校園時的清潔負擔，是我所能找到的、與自我所認同的價值與立場相對一致的位置。……我同時也渴望自身的「內地生」身分能被本地學生看見，打破人們對於「內地生」的刻板印象。為此，我嘗試做出努力與掙扎。比如，我會在清理路面垃圾、清潔洗手間時用普通話和不會使用粵語的同伴溝通，以這種形式小心翼翼地「暴露」自己的身分給香港同學看。¹⁵²

當恆星演化至末期，會因自身巨大的重力而發生坍縮；坍縮的可能結局之一，便是成為宇宙中一個有著強大引力的角落。香港就像是這樣一個存在，在殖民歷史和回歸歷史演進中坍縮成為一個既有強大引力、又黑暗的時空。內地生被吸入香港的時空，原理上可以經由蟲洞般的過程穿越時空，在高速旋轉的生活、學習和思考通道的另一端會是不同的時空，卻未必是被吸入者設定中的軌跡和終點。經歷反修例也像是穿越一個黑洞，進入這個時空更加激烈和疾速擠壓甚至扭曲的過程前，甚至來不及對軌跡和終點有所預期，但終究要達到另一個時空。這也恰恰是運動的意義之一，給所有東西發生劇變的契機。只不過跟穿越黑洞的差別在於，經歷運動不只是被一個強大的引力吸入，不論是主動或被動捲入運動的人，仍然是在一個有著地心引力空間、可以行走、可以摸索地度過。

¹⁵² 〈作為內地生，留守中大是怎樣的體驗？〉，同註9。

從「攞炒」切入——反修例運動如何在矛盾與統一之中「動起來」？*

劉璧嘉

摘要

葉蔭聰曾經呼籲，在理解及評論香港的反修例運動時，不妨跳脫社會運動的框架，把它看成為「不是社會運動」，而是一場「無策略的運動」，方能理解其內部運作。在認同葉蔭聰的研究框架的基礎上，文章透過閱讀示威者傳達文宣，嘗試爬梳不同「攞炒」觀以至於攞炒策略之間的差異、統一及矛盾，從而回應運動是如何可以「無策略」地動起來。

攞炒本身是香港俚語，是一種同歸於盡的賭博策略，在運動中卻被演繹成「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me」，甚至是自先死而後生的策略。此文章首部份講述了攞炒背後的歷史脈絡。在回歸以後，一直有所謂的 2047 大限之說，之前無論是中共還是由泛民所主導的社會運動，都想要讓香港市民相信信香港可以漸進地步入 2047，繼續體現自由市場、個人自由、法治，並漸漸邁向民主。然後，此神話隨著 2014 年以後的諸多政治事件被廣泛人民認為破產。此信任破產造就了運動中有一種「態度的同一性」，攞炒便是這態度的同一性的產物，中介著行動與破產後絕望的情緒。文章中段會開始敘述諸多不一樣甚至矛盾的攞炒策略——包括向（西方國家）建立國際戰線、破壞經濟、罷買、建立黃色經濟圈以至於衝擊聯繫匯率等，如果有內部矛盾，卻以「態度的同一性」被统一到運動之中。然而，文章末段會討論到這種態度的同一性又會如何造就當中的矛盾無法疏導，甚至無法建立起完整的思想體系以至於策略方向，使得攞炒有其內部暫時性和脆弱性，使之最終走到了它的反面——即為了攞炒我們要先「明哲保身」。文末也觸及了攞炒所要回應的歷史困境如何使之視野有內在侷限性和保守性，以及在什麼情況下，其基進性才可以被激發。

關鍵字：反修例運動、反送中運動、攞炒、香港研究、社會運動

自香港爆發了反修例運動以後，不時就會收到海外朋友的提問：「到底這個運動是左還是右，香港發生了什麼事，我們該支持嗎？」一方面，當看到了運動中橫向的罷工、民主組織模式和對警察暴力的徹底反省時，他們都都為之振奮；但當看到譬如飄

* 劉璧嘉，台聯大亞際文化研究學程碩士生，聯絡方式：cusp.lala@gmail.com

揚的美國旗海時，他們又對濃濃的右翼氣息感覺抽離和疑惑。與此同時，這種疑惑也不只是存在在海外的旁觀朋友身上，運動期間我也感到參與其中的香港朋友有類似的疑惑，譬如香港左翼媒體「夜貓」頻道的朋友就提到了運動與自己之間的距離，甚至左翼「失語」的問題。¹⁵³但與此同時，他們其實都被香港其他左翼朋友暗地取笑：「那麼多幹活的機會都不知道他們失語個屁！」但他們之間的差別或許也不是真實的差別，只是有些左翼朋友在「幹活」中找到了超克距離的機會。而同時，自由派的朋友在一面支持著運動講的「民主自由」時，心裏也似乎感到運動最終是無法建立出他們所想要建立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也對運動脫離了之前的漸進主義社會運動模式感到不能理解。也就是說，無論是旁觀者還是參與者，也不論派別，似乎都不同程度地感覺到了反修例運動中不同政治思想和行動派別之間的矛盾，但都迫切的認為自己在香港的運動問題上必須「選邊站」，而因此都需要找到方法——不論是壓抑、介入、實幹、疏解、或乾脆抽離——去回應。

一、問題意識

為了回應這場看起來相當混亂（內部聲音互相矛盾），但又龐大一致（譬如龐大的集體行動、外部統一的訴求）的運動，我寫了這篇文章。此文的問題意識在於理解反修例運動是怎樣既矛盾又統一地「動起來」：譬如這種「動起來」的基礎是什麼？有什麼自我滑轉甚至自我瓦解的可能性？而這最終會引導我們去解釋及評論這場運動。這研究的意義一方面在於我想要系統性地回答自 2019 年以來各方好友的提問，另一方面也是認為這種研究可以為未來運動的組織模式和運動研究提供參照。

坊間已經有不少報導提及過數位科技如何使得幾乎所有人都有了參與運動的渠道，並似乎想要以此解釋大家得以集體地「動起來」的原因。而且，這種說法無疑有過有未來主義的傾向，始終沒有超克歷史是線性進步發展的歷史主義思考，此外，使用科技背後的「人」和「心」也變得面目模糊。但的確，廣泛地使用科技，使得這次運動明顯地與過往或傳統的社會運動，而這並不是因為現在大家都拿著手機了，而是因為這些科技的輔助使得（一）這運動的確不是像以往那樣由社會運動團體、NGO 或政黨協力或主導，而是有更多條件發展出橫向組織的模樣；（二）這場運動不再像以前那樣講求體制內外的呼應，而是全面以民間為中心；（三）它揚棄了漸進主義，最明顯的就是「攪炒」的呼籲。葉蔭聰在 2019 年 12 月交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的「香港論壇：法治、警權、人民」研討會就明確呼籲大家，要擺脫過對傳統社會運動的框架去理解反修例運動，才能進入反修例運動的邏輯中理解它過人的運作，因此提到「我們不妨把它看成為『不是社會運動』」，而是一場「無策略的運動」。¹⁵⁴

¹⁵³ 覃俊基（2019）〈左翼的失語——當運動和世界和你有所距離時應該如何自處〉，見「夜貓」，2019 年 6 月 18 日，<https://pse.is/S7ATW>

¹⁵⁴ 見會議影像紀錄「香港論壇第三場：地緣政治、情感結構與平凡生活（2）」，

在認同葉蔭聰的研究框架的基礎上，那麼接續的問題是，運動如何可以無策略地動起來呢？我打算用攪炒這個概念如何被推廣和論述作為切入點，去討論我們可以如何理解和評論這場運動（特別是我們不該簡單地透過運動者表面的理據和行為去站邊，而是在看到他們的內部動力以後嘗試介入），而這也是首先要撇開把反修例運動看成是社會運動的框架才能理解其矛盾與統一的運作邏輯。反修例運動中關於攪炒的最大宗派「攪炒團隊」之一，正正就是這個運動運作起來的典型案列。他們也是一開始在連登（lihkg.com）上聚集，在 Telegram 討論，並且在各大媒體包括 YouTube、Instagram、報紙雜誌、Facebook、Twitter 和連登論壇等發表成果。

而在分析的部分，我則是借用了汪暉〈預言與危機〉一文中「態度的同一性」¹⁵⁵這個概念來解釋攪炒以至於運動的運作模式。此概念本來是拿來論述五四運動的團結外表中的內在脆弱性和臨時性，並且去解釋不同的思想是以怎樣的內在邏輯融入到五四運動當中。這個概念的產生背景是，當自由派在八〇年代想要歷史性地解釋和檢討自由主義思想無法落地生根的問題時，無不傾向像李澤厚那樣認為那是五四運動中救亡壓倒了啟蒙的結果，這種解釋的動力和慾望是來自對中國共產主義思想的恐懼和批判——儘管這放在八〇年代甚至今天都是特別容易理解的，但卻是去歷史化的。就如同我可以想像，若有一天香港的運動果真全面右轉，對無論是中間還是左翼路線偏離，大家會解釋說那是 2019 反修例運動中「民主自由」壓到「民生訴求」的結果。這種分析不是錯誤的，但是是既沒有解釋力也是去歷史化的，甚至是外來的分析。因為運動中——特別是攪炒概念中——是出現過許多對「經濟」的訴求，但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訴求，實際上都是以「態度的同一性」去顯現，回應的是香港的歷史困局。

當然，值得再三提醒的是，當汪暉提出這個概念，並不是要像我今天那樣擺脫「社會運動」這個框架，他想要擺脫的是「共產主義暴力輾壓自由主義」這種非歷史性的看待五四的框架。所以，汪暉在組織這個概念時，是高度歷史化的——去解釋說當時冒險的許多思想與訴求，其實既非完全共產主義，也非自由主義，因為兩者其實在當時都是以「態度的同一性」的方法去回應當時中國的歷史困局。而當我以下打算挪用到香港的語境時，或許未必能做到如汪暉那般高度歷史化的推論，但是，歷史化地理解攪炒背後的時間性、歷史觀和世界觀並不是我這篇文章的重點，而且，我認為葉蔭聰也在〈Poised between Two Times: Young Men, Temporality, and Identity Politics〉一文觸及這一塊了。葉蔭聰也文中指出這場無策略的運動是在一種時間性中劃開了裂口，塑造出另一種運動的時間性¹⁵⁶時（儘管他並沒有斷言這種時間性是臨時的，但從他敘述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YHbU5bPxuM&feature=emb_rel_end

¹⁵⁵ 汪暉（1989）〈預言與危機（上篇）——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文學評論》第3期；汪暉（1989）〈預言與危機（下篇）——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文學評論》第4期

¹⁵⁶ Iam-chong Ip. 2019. *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p. 98-116.

它是脆弱的)，葉蔭聰已經觸及其背後的歷史感和時間感的情感脈絡。這個從時間性的方法去切入運動，雖然和我的路徑非常不同，但我認同其背後的歷史分析，即反修例運動——以至於攞炒背後——是對於中共、建制甚至與泛民共構的漸進主義神話（即香港會漸進地步入 2047，¹⁵⁷繼續體現自由市場、個人自由、法治，並漸漸邁向民主）的信任破產。而「因為『漸進』不再，過去幾年，香港要麼在沉鬱悶局中嚷著死亡或移民，如 2014 年雨傘運動或 2016 年一連串『DQ 事件』後的情況，要麼便是情緒及行動的大爆發，高舉『焦土』或『攞炒』」。¹⁵⁸在這個脈絡底下，我以下的書寫比較是去定格地探討攞炒在這個運動的範圍中的內容和邏輯，並以此去切入運動內在性格和情感，並提倡以「態度的同一性」這個概念，作為解釋和評論運動的框架。

二、攞炒釋義

一說起攞炒，最直接的聯想或許就是暴動、混亂等比較激烈的畫面。而在運動中的各個個體，都自認為自己對攞炒是有絕對的掌握和理解。然而，只要細心看看連登的各種辯論，以及攞炒概念的演化，還是可以看到在運動中，攞炒經常是被辯論的——可見它並不是一個定義穩定的詞語。其意象也不一定是激烈而暴力的，指向的對象也各有不同（儘管範圍是一致的）。這些不同的「攞炒觀」也會造成詞語的內部張力，以及也成為了運動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之所在。以下，我會先從解釋不同攞炒觀當中的細微差別。

攞炒這個概念本來是香港的俚語。在日常用法上，「攞」的字面意思「共同」、「擁抱」，「炒」即是「全輸」、「遭殃」、「撞擊」。而攞炒則大概是同歸於盡的意思。

攞炒本來多用於撲克牌遊戲「鋤大弟」（台稱：大老二）上，這個遊戲有四個玩家，按照規則最快把自己手上的牌出掉者為贏家，每次只有一個勝利者，但輸的人也有分小輸還是大輸，手上剩下的牌越多也就輸得越多。而攞炒在這個遊戲的意思是說，當自己的一手牌看起來非常的爛，眼前就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盡力的把牌打出去，謀求輸少一點，所謂「輸少當贏」；另一條則是不求輸得少，出牌的邏輯以狙擊其他幾家不能出牌為首要目標，即務必也要讓其他兩位輸家和自己輸得一樣慘——這就是所謂的攞炒戰略。攞炒一來有陪葬之意，但在戰略上，儘管自己這次是輸掉，至少也讓其他對手元氣大傷，這也是創造了未來長遠勝利的條件。在這種設定底下，放棄求生，主動激發自己的死亡或犧牲是有內在意義的，其意義在於可以促成對方的死亡。

不過，當攞炒此詞出現在運動中的時候，並且被示威者廣泛使用的時候，最直接的聯想到的意象倒不是撲克牌遊戲。從連登的帖子所看，攞炒的意象更多是會被關聯到電

¹⁵⁷ 2047 指的是中共對香港回歸「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在民間的語境，也經常被認為是香港的「大限」（即可能是一國兩制的取消）或蛻變完成（即成功實現香港漸進主義神話）之日

¹⁵⁸ 葉蔭聰（2020）〈香港身份新認同——當「香港認同」變成權力意志〉，見「端傳媒」，2020 年 1 月 4 號，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104-book-intro-hk-new-identity/?utm_medium=copy

影《飢餓遊戲》第三集中出現的一句台詞「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如果我們被焚毀，我也要你陪著我們被燒掉)。運動中攪炒一詞的普及，必須要從連登論壇說起。此詞語首先是由連登網民「我要攪炒」提出的，後來此網民也被稱為「攪炒巴」(攪炒兄之意)，其團隊也被稱為「攪炒團隊」。「攪炒巴」的帖子底下，也因此會經常貼出此對白的電影截圖：



圖片來源：我要攪炒(2019)〈【突發】第二輪炮火！行動升級！除咗取消港共外國護照，我地正式開辟聯合國人道罪行戰線！〉，見「連登」，2019年6月13日，
<https://lihkg.com/thread/1217474/page/1?post=2>

這是身為革命精神領袖的女主角看到家園被燒成殘骸時對敵人——也就是他們的統治者——所說的一句話。表達出來的是一種報仇的氣概和悲憤。而在這種設定底下，自身的死亡本身並不帶有任何意義，也不見得可以帶來任何策略效果。因為主角的故鄉是被迫於無奈地夷為平地，而這不是主角想要主動促成的，但主角卻是在看到此情此境後就放下了對死亡恐懼，有了破釜沈舟、迎頭反抗的決斷。

當這兩種其實有細小差異的攪炒觀都被以「攪炒」指稱時，其實就使得運動內部有了隱性的張力。前者更看重自我毀滅的部分，因為自我毀滅——包括主動重創經濟、打擊消費、激發宵禁等——是被認為有意義的，是「傷人七分，損己三分」的「七傷拳」。後者則認為主動激發「自炒」不一定帶有意義，不過既然終究要被動的「被炒」到死，為何不盡全力一搏呢？就如同一篇由灰記客所寫的詮釋攪炒的文章標題所言：「『見好就收』和『攪炒』殊途同歸，為何坐以待斃？」¹⁵⁹既然大家都預知終局不可能贏，那也要做垂死的掙扎把敵方傷害吧。

¹⁵⁹灰記客(2020)〈若「見好就收」和「攪炒」殊途同歸，為何坐以待斃？〉，見「關鍵評論」，2019年10月10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5905>

三、攪炒概念的發展線

(一) 攪炒巴的國際戰線

攪炒既是日常用語，但當此概念被鑲嵌在運動中，其內容則是有所變化和發展的。攪炒的釋義也必須和運動的發展線同步敘述。儘管在攪炒之前，香港社會運動就有了類似的概念，譬如「焦土」戰略。但攪炒一詞被廣泛使用，就必須提及「攪炒巴」及他主導的「攪炒團隊」。

「攪炒巴」在連登的第一篇發帖時間為 2019 年 6 月 10 日 6:45 pm，題目為〈【招兵買馬】召集所有未放棄既連登仔，認真分工，幫港共官員同建制派取消外國護照〉。¹⁶⁰有趣的是，「攪炒巴」的攪炒實際上和直覺上的攪炒——譬如暴動和暴力升級——幾乎是沒有直接關係（雖然不一定是矛盾的）。攪炒巴不僅並不是宣揚「武鬥升級」，甚至可以說是一條「文鬥升級」的路線，呼籲大家寫信去遊說外國政府取消政府官員和建制派及其子女的外國護照。

當時的社會狀況是，6 月 9 日爆發了一百萬人的示威遊行，但一覺醒來大家發現港府並沒有絲毫要退讓的意思。其實，經歷過 2014 年的大規模佔領運動後的失敗，很多人此時就不可自控地開始墜入失敗主義的情緒。這種失敗主義的內容是：就算是一百萬人出來了都是沒有用的、做什麼都是沒有用的，政府是不會回應「民意」的。這種民意其實是建立在中共許諾的漸進主義神話之上的，即香港會繼續體現自由市場、個人自由、法治，並漸漸邁向民主。從 2014 年累積到 2019，民眾經驗的是這神話的承諾的破滅——而這破滅也包括對先前泛民主導的漸進主義的社會運動模式的信任破滅，畢竟泛民也是共構著這個神話的一分子。帶著這種破滅的心情，當前的時間的內涵也不過是過渡到 2047 之間一個緩慢而漸進的死亡。

我們可以從「攪炒巴」曾經在 8 月 16 日由大專學界和我要攪炒團隊發起的「英美港盟，主權在民」集會中的發言，理解到攪炒底下民眾的集體心情——即大家認為所經驗的當下的時間是沒有意義的，只是指向死亡的過程。在集會中，「攪炒巴」就提到了一個特別讓他動容及難過的時刻，是 6 月 10 日有年輕人絕望地回應當權者說：「反正都無未來，不如一槍咩死我」（反正都沒有未來，不如一槍打死我）。¹⁶¹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從 6 月 15 日梁凌杰在掛反修例標語後跳樓自殺一事從側面感受到當時絕望的社會氣氛。

而由於當時社會還未醞釀出武力升級的氣氛，示威者大多都陷在一個無路可走的心

¹⁶⁰ 我要攪炒 (2019) 〈【招兵買馬】召集所有未放棄既連登仔，認真分工，幫港共官員同建制派取消外國護照〉，見「連登」，2019 年 6 月 10 日，<https://lihkg.com/thread/1196704/page/16>

¹⁶¹ 「【反送中】攪炒巴想同香港人講」，見 Youtube 影片，2019 年 8 月 16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5ditO_zzr0

情之中。所以「攞炒巴」在 6 月 10 日的發帖則是要釋放出一個不要認輸的訊息，想要在「升級=武鬥」以外，號召一條「文鬥升級」的路線，叫大家絕對不要放棄，因為放棄該是到 2047 才放棄，現在的香港還是有各種可以做的事情。當然，我們可以說，其實就算香港有日成為了如同中國大陸的其他城市，還是可以持續地抗爭，2047 不是大限，就如同現在大陸還是有人在反抗那樣。當然，我們也可以說，絕望或許是過份的渲染，換句話來說，自身製造出來的過大的逼力或許才是絕望的元兇，沒有批判地反思及瓦解漸進主義神話，提出更好的前途想像，或許才是在這個時刻感到絕望、「沒有未來」的根源。然而，我們先懸置這種批判，先去肯認示威者真實的感受是有歷史脈絡的。這也是為什麼帖子在五個小時內就得到了 1001 個回覆——也是一個帖子可以有的回覆上限——大家紛紛在留言下討論可以如何讓港府官員及建制派議員失去其外國護照。「攞炒巴」後來也在訪問裏表示：「『(當時是)第一次開 post，睡醒的時候已經推爆了 post。』及後，他慢慢和申請者在 Telegram 聊天，合適的就將他加入群組，逐漸形成了一個團隊。」¹⁶²——「攞炒團隊」是這樣組成的。

那攞炒和取消官員的外國護照這種在運動中被稱為屬於「國際戰線」到底又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這種向外國宣傳運動的路線會和攞炒扯上關係？當中「攞」和「炒」的部分在哪裡呢？

這種關聯一部分是無心插柳的，「攞炒團隊」發起人 HK（化名）接受《蘋果》訪問時也指「以『我要攞炒』之名在連登發文純屬偶然，『但一個偶然令全香港都講攞炒』」，¹⁶³但其發帖中也有很多對他們的攞炒概念的闡述。「攞炒巴」也是在 6 月 11 日的帖子〈【突發】正式開火！第一批信已發出！我地香港人要幫政府官員、保皇黨取消外國護照！〉中首次敘述他們的攞炒觀的：

香港送中官員、保皇黨手持英美澳加紐護照卻宣誓效忠中國共產黨，嚴重威脅西方國家安全，絕對有須要嚴正調查相關人士。由於佢地可以自我放棄同申請重新持有外國護照一次，我地強烈要求英美澳加當局褫奪佢地現有外國護照及重發權利，甚至凍結所有離岸資產。政府日夜宣傳送中、國歌法、大灣區，我地誠邀一眾港共官員議員，從此身體力行，一世共享大灣區榮耀！¹⁶⁴

¹⁶²心（2010）〈【連登動員·上】專訪「我要攞炒」真身：香港人未放棄，我們也不放棄〉，見「立場新聞」，2019 年 7 月 19 日，<https://pse.is/NKNE5>

¹⁶³ 梁穎妍（2019）〈【抗暴之戰】「我要攞炒」秘製過百頁制裁名單，游說取消港獨立關稅區觸發「支爆」〉，見「蘋果新聞」，2019 年 12 月 4 日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20191204/2JG6ZO75TSONPU4FJ7WL776NBQ/>

¹⁶⁴ 意即：「香港送中官員、保皇黨手持英美澳加紐護照卻宣誓效忠中國共產黨，嚴重威脅西方國家安全，絕對有須要嚴正調查相關人士。由於他們可以自我放棄同申請重新持有外國護照一次，我們強烈要求英美澳加當局褫奪他們現有外國護照及重發權利，甚至凍結所有離岸資產。政府日夜宣傳送中、國歌法、大灣區，我們誠邀一眾港共官員議員，從此身體力行，一世共享大灣區榮耀！」我要攞炒

也就是說，「攞炒團隊」是這樣去敘述他們的行動之正當性：高官子女及建制派很多都有雙重國籍，而高官在放棄一次外國國籍以後，可以之後再次依親申請。而由於他們支持修例也是支持共產黨，而這是會在根本上與他們的外國國籍的國家的核心價值有所抵觸。所以，外國國家有正當性去取消其外國護照。這裡也已經是前設了英美澳加紐等西方國家與中國有著理念上的衝突，兩者是不能調和的。所以他們去遊說這些國家，譬如在 6 月 11 號去信英美澳三國，要求該國調查全數問責官員、政治助理、所有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保皇黨，甚至其家人外國護照之合法性。而攞炒的部分——不得不說是有點迂迴的——是認為這些手持外國護照的官員和建制派根本不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家人子女留在香港，所以都把家人子女送到外國去，可見他們根本不想要留在國內。所以，取消其外國護照，是要讓他們可以被鎖在境內，讓之後的世世代代都被自己所搞出來的糟糕的社會所折磨，也只有這樣可以讓建制派和高官真心感覺到自己「放火」的溫度，被自己所放的火燒死，是為攞炒。

由此可見，「攞炒團隊」的攞炒對象不是中共，而是在港的高官及建制派。而攞炒也不代表要主動促成自我毀滅的部分，甚至並不鼓勵有任何「自炒」的成分。和其他武鬥升級比起來，他們的國際戰線其實也是屬於低風險的，會危害自身安全的部分也比較少。而面對當權者因此而對他們或示威者報復，他們雖然並不樂見，但也並不恐懼。至於攞炒的動力，在於「炒」是不能避免的：反正終有一日，香港就會「大限將至」，倒不如趁自己還有籌碼與之同歸於盡。就如同他在集會上所言：「對我地年輕一輩黎講，與其 2047 年默默死去，倒不如趁香港尚有一絲希望既情況用盡最後一口氣，創造未來。」¹⁶⁵因此，行動的動力是在於對 2047 年作為死亡的確認或行動的不可能（也是簡單和粗暴地否定了在高壓的中國至今還是每天有人持續地抗爭，而抗爭還是可能的事實），而既然死亡不能迴避，倒不如盡力而為。而所為的「一絲希望」，則是趁現在香港還是「國際都市」的情況下，讓香港的情況可以被外國各國正視，以剝奪護照的方式進行制裁。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國際戰線取得了普遍示威者的認同。鄧建一的研究就有指出，示威者普遍明白外部因素對運動成果的重要性。有接近七成及超過七成受訪者認為，「國際社會的取態」及「中美貿易戰的發展」頗有可能或「很大可能」令政府作出重大讓步，同意「在國際社會關注下，香港局勢更壞其實對運動更有利」的受訪者，也達到八成。¹⁶⁶

雖然「攞炒團隊」的行動及論述都是非常仔細及有範圍的，但當攞炒一詞被普及以後，並不是只有「攞炒團隊」可以壟斷攞炒釋義。如果我們於連登論壇打入「攞炒」此關鍵字，大部分的攞炒討論其實都並不直接和「攞炒團隊」所做的國際戰線直接聯繫。

（2019），〈【突發】信已經陸續 ready，今晚 8:30 前我地要幫港共官員同建制派取消護照！〉，見「連登」，2019 年 6 月 11 日，<https://lihkg.com/thread/1202133/page/1>

¹⁶⁵ 意即：「對我們年輕一輩來說，與其 2047 年默默死去，倒不如趁香港尚有一絲希望既情況用盡最後一口氣，創造未來。」見「【反送中】攞炒巴想同香港人講」，同註 9。

¹⁶⁶ 鄧建一（2019）〈所謂「攞炒」，其實是一場理性博弈〉，見明報，2019 年 9 月 8 日。

更多其實指的是「經濟攪炒」。

（二）經濟攪炒

經濟攪炒到底如何進行，一直都沒有一個絕對的共識，也沒有團隊出來認領及指導經濟攪炒的方向。但是從連登可見，經濟攪炒的終極目標是促進「支爆」，即寄望「支那」（對中國的負面稱呼）經濟泡沫爆破導致社會失序，加速改朝換代，讓香港在中國的經濟亂局中可以掌握籌碼，促成政治改變。連登一方面認為這可以是主動促成的，另外也是需要天時地利的配合——而這包括了希望美國可以在中美貿易戰中重創中共。

對香港可以拖垮中國經濟的自信，一方面是運動充權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是來自香港示威者對香港於中國的經濟地位的認知。示威者非常理解香港對中國而言是人民幣離岸中心，讓不是國際貨幣的人民幣可以變成國際貨幣諸如美金的重要轉口港——而就算並不清楚認知這一點的，也知道香港對中國有著舉足輕重的經濟地位，所以才一直在政治上被緊緊盯死。因此，主動破壞香港作為中國人民幣的離岸中心，雖然會使得香港失去其獨特的利用價值，成為如同大陸其他城市一樣，加速一國一制，但經濟攪炒派會認為，既然香港遲早會如此，不如加速自身的滅亡，反而可能可以挫傷大陸經濟，或許還有翻轉的餘地，反客為主地取得政治談判的籌碼。然而，到底要如何才能使得香港失去其聯繫匯率的特殊地位呢？

綜合連登上的各大帖子，經濟攪炒派會認為大概有四個方法。第一個是繼續直接行動升級，甚至是暴力升級，促使中共使用解放軍鎮壓，甚至宵禁，也使得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投資者對香港的市道失去信心。而示威者也同時認定中國政府不會真的出動到解放軍自砍財路，所以暴力升級最終是會逼使政府讓步。但無論會否出動到解放軍和宵禁，暴力升級的經濟攪炒派還是認為激烈的行動可以加大示威者一方的籌碼。這也是為什麼在很多集會中，經常會有示威者大喊：「老解呢？」（解放軍呢？）這種攪炒的對象可見並不是像攪炒團隊那樣對準香港高官、其子女及建制派，而是中共的經濟命脈。而「炒」中共的籌碼則是要「自炒」自己的經濟地位和自己的性命及前途（畢竟很容易被警察抓）犧牲。

第二個經濟攪炒的方法是透過減少消費、逃票和不繳稅等不合作運動，造成香港經濟蕭條的景象，讓政府不得不讓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封一賠十·聖誕攪炒行動升級」，網民號召示威者遊行、商場聚集、派示威物資。¹⁶⁷然而，經濟蕭條為何可以造成攪炒、攪炒的對象為何，這些都是沒有被仔細敘述清楚的。而如果政府確實是早以不顧人民死活，而政府庫房又不是依賴消費稅而來，不合作運動如何可以逼使政府讓步？但從這些罷買行動多是號召罷買大商場，可見其針對對象為本地親中的大資本家。譬如網民會貼

¹⁶⁷ SUCKER (2019) 〈【頂置】封一賠十·聖誕攪炒行動升級〉，見「連登」，2019年12月19日，
<https://lihkg.com/thread/1789362/page/1>

出以下的 T 恤，呼籲大家以罷買這些店家進行攪炒：



圖片來源：SUCKER (2019)〈【頂置】封一賠十·聖誕攪炒行動升級〉，見「連登」，2019年12月19日，<https://lihkg.com/thread/1789362/page/1>

這些店家都共同屬於美心集團，是香港飲食界的著名品牌。此集團老闆曾公開批評運動，因此此集團被認為是「紅色資本家」。因此，其行動背後的邏輯就主要是希望透過挫傷親中的本地資本家，讓政府在傾側資本家和中共之時感覺到壓力，從而要回應市民的五大訴求。因此，攪炒的對象為紅色資本家，進而是香港政府，「炒」資本家的籌碼則是要先「自炒」自身的經濟狀況、就業和購物的便利。

第三個方法是在罷買「紅」和「藍」以外，額外壯大「黃色經濟圈」，在黃店消費。也就是說，在圈出某些企業為中國或親中企業之後，進而罷買紅店（中國資本）和藍店（親中資本），並且額外地光顧黃店（本地支持示威者的商店），塑造黃色經濟圈。這比以上的邏輯又更多了一個步驟。然而，這如何可以促成攪炒或支爆，也是沒有被直接說明的，畢竟大陸的在中國的經濟命脈並非零售業。但此舉被認為可以讓對方「損兵折將」，也可以有損中共在港的氣焰，認為中共為了香港的零售業的「錢」而最後會有所低頭。所以攪炒的對象同樣為紅色資本，但既然只是對「敵人」造成傷害，那攪炒的「攪」又是如何敘述的呢？自己又需要自炒什麼呢？畢竟轉移投資黃色經濟圈，無論對經濟、就

業和購物的便利都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示威者會認為說，「炒」只是香港未來必然的景象——即經濟上全面被大陸資本所侵蝕——攪炒的意思是既然未來必然如此，現在就不如放手一搏壯大黃色經濟圈，或者可以扭轉香港被全面壟斷的局面。而這就如同「攪炒巴」和其「攪炒團隊」國際戰線的攪炒邏輯，主動和具體地促成「自炒」並沒有內在意義。

第四個方法就是拒絕使用中國銀行、撤資、投資外國股票和換美金。¹⁶⁸這種做法背後的思維是，當市面沒有港幣只有美金，而香港人都比政府持有更大量美元時，港幣就會貶值，而聯繫匯率就會自動破功，而香港也自然會失去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條件，大陸把人民幣換成港幣時也會損失慘重。但這種攪炒的具體討論和行動相較於之前三種規模都要小得多。

（三）不同「攪炒派」之間的合作

儘管「攪炒團隊」的國際戰線與經濟攪炒一開始並無直接交集，但隨著經濟攪炒的聲浪越來越高，「攪炒團隊」也開始介紹不同的攪炒模式，不同的攪炒路線開始共冶一爐。從「攪炒團隊」的 Telegram 頻道可見，他們也開始宣傳不同的經濟攪炒路線。譬如在 2019 年 8 月 27 日，頻道就提議了經濟攪炒的路線，其中包括了提款、換美金、減少消費、罷買等方法。他們是這樣去敘述經濟攪炒的方法的：

經濟就係港共、中共真正既弱點、命脈，有見及此，我地攪炒團隊既金融界成員製作咗即食經濟戰懶人包！超精簡解說：本土篇（1）銀行擺現金，效果：切斷銀行資金鏈，增加企業借貸成本，直接影響經濟；（2）港元換美金，效果：衝擊聯繫匯率；（3）堅持最低消費，效果：直接影響本季 GDP 增長；（4）組合並外移 MPF 及基金，效果：衝擊聯繫匯率；外國篇（5）罷買中國貨品，效果：直接影響中國出口，減少中國賺取外匯；（6）大力宣揚中國竊取外國技術，效果：引起國際社會反感，保護本身知識產權，間接阻礙中國科技發展；（7）大力宣傳買中國貨等於削減當地工作職位，效果同（5）。最後，請多啲留意、響應阿樹、渾水等等既金融／經濟抗爭戰線。百花齊放，缺一不可。¹⁶⁹

¹⁶⁸清水健吾（2019）〈貨幣攪炒：黃店+美金=黃金經濟圈〉，見「連登」，2019 年 12 月 18 日，<https://lihkg.com/thread/1787623/page/1>

¹⁶⁹意即：「經濟就是港共、中共真正既弱點、命脈，有見於此，我們攪炒團隊的金融界成員製作了即食經濟戰懶人包！超精簡解說。本土篇（1）銀行提現金，效果：切斷銀行資金鏈、增加企業借貸成本，直接影響經濟；（2）港元換美金，效果：衝擊聯繫匯率；（3）堅持最低消費，效果：直接影響本季 GDP 增長；（4）組合並外移 MPF 及基金，效果：衝擊聯繫匯率；外國篇（5）罷買中國貨品，效果：直接影響中國出口，減少中國賺取外匯；（6）大力宣揚中國竊取外國技術，效果：引起國際社會反感，保護本身知識產權，間接阻礙中國科技發展；（7）大力宣傳買中國貨等於削減當地工作職位，效果：同

而這幾乎就是上一節提到過的所有經濟攪炒方法的總匯，而面對直接行動上的升級，他們則是這樣說的：「善意提醒：孤注一擲機場行動，係極為危險既諗法；切忌貶低任何抗爭為送頭#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希望機場手足勿忘初衷。」¹⁷⁰

這裡的意思是認為機場的直接行動升級並非最好的做法，雖然出於「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運動倫理，「攪炒團隊」不會予以阻礙。

以此時看來，攪炒從來就不是「路線的同一性」，而是多條路線。譬如經濟攪炒還是行動升級攪炒，從以上看來，似乎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即就算路線不一樣，大家的方向還是一致的。然而，以下，我會顯示出，不同的攪炒觀到了某些關節點就會有矛盾，他們之間非但沒有路線的同一，甚至沒有方向的同一。隨著格局的變換，不同路線偶然有所爭執，之間的矛盾也更為明顯。

（四）不同攪炒派之間的張力與矛盾

不同的攪炒派之間實際上並不是路線不一致但方向一致的路線差異，從他們之間的爭論和矛盾可見，他們某程度上可以是互相抵觸的。

譬如減少消費和支持黃色經濟圈兩條「經濟攪炒」路線之間就偶有爭論，曾經就有連登帖子表示〈覺不覺話要經濟攪炒，又要搞黃色經濟圈好矛盾〉，¹⁷¹當中就質問了支持黃色經濟圈會否到頭來只是間接支持了紅藍背景的地主，因此搞黃色經濟圈的攪炒觀和減少消費的攪炒觀有根本矛盾。然而，這種對攪炒路線的質問沒有得到很多的回應，樓主也被懷疑是「蛇」（臥底）或「黑警」。又譬如，帖子〈黃你老母色經濟圈咩，明唔明咩叫攪炒呀〉也提出了黃色經濟圈的所謂攪炒路線到頭來會支持經濟增長，無法做到真正的攪炒，¹⁷²卻被留言反駁說「攪炒都要食野買日常品架」。¹⁷³所以攪炒敵人的同時到底自身要「自炒」到什麼程度，「自炒」自身有什麼意義，也是沒有共識的。

同時，暴力升級的攪炒路線在行動上也經常受到阻擾。不少手足表示經常在行動升級時被誤認為是「鬼」（警察臥底）。這也顯示了對暴力行動作為攪炒路線的不信任，特

（5）。最後，請多些留意、響應阿樹、渾水等等既金融/經濟抗爭戰線。百花齊放，缺一不可。」見 Telegram「攪炒 Channel」，<https://telegram.groups.hk/1173963245/%E6%94%AC%E7%82%92Channel>

¹⁷⁰意即：「善意提醒：孤注一擲在機場行動上是極為危險的想法；切忌貶低任何抗爭為白白犧牲#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希望機場手足勿忘初衷。」見 Telegram「攪炒 Channel」，同註 16。

¹⁷¹廢清□（2020）〈覺不覺話要經濟攪炒，又要搞黃色經濟圈好矛盾〉，見「連登」，2020 年 17 日，<https://lihkg.com/thread/1828036/page/1?post=1>

¹⁷²高息股（2019）〈黃你老母色經濟圈咩，明唔明咩叫攪炒呀〉，見「連登」，2019 年 12 月 23 日，<https://lihkg.com/thread/1794966/page/1?post=1>

¹⁷³意即：「攪炒也要吃東西買日常用品的啊」。[〈黃你老母色經濟圈咩，明唔明咩叫攪炒呀〉](https://lihkg.com/thread/1794966/page/1?post=1)，同註 19。

別是暴力行動也會容易傷害示威者的形象，暴力升級的示威者也會被認為是「鬼」。當這自炒形象的部分是否是攪炒必不能繞過的一環沒有被充分認知和討論時，行動上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捉鬼和分化。

（五）攪炒內部的自我滑轉／瓦解

不同攪炒觀之間的矛盾到了新冠肺炎襲港時就到達了頂峰。一方面，有人主張可以透過主動散播肺炎恐慌——特別是去紅藍店家咳嗽——去逼使經濟停擺。¹⁷⁴甚至有人在〈【真攪炒】有冇人想武漢肺炎係香港大規模爆發〉提到說：肺炎對普遍是紅或藍的中老年衝擊最大，所以肺炎入港是傷敵多於傷己，是為攪炒妙法；然而，這種說法並沒有得到許多的正面回饋，開始越來越多人認為更好的做法是要自保實力，因為要「努力自救留返條命旁觀支爆」，¹⁷⁵如果連生命和經濟實力都沒有了，就沒有與其攪炒的資本了。

¹⁷⁶

而當政府沒有全面封關，香港肺炎數字飆高導致經濟下滑，醫護的生命也受到威脅時，連登的主流意見也普遍認為輸入肺炎是中共對香港的迫害，是要殺害港人及其經濟。然後，隨著封關訴求和醫護罷工與反修例運動連成一氣，主流開始會認為支持肺炎攪炒香港的說法其實是「自炒」。更好的方法是訴求封關，旁觀中國被肺炎「炒」，等著肺炎促成天時地利觸法支爆——而時代革命因此也變成時代抗疫，正如〈（真攪炒）武漢肺炎就係『天滅中共』，絕對係好事黎〉就提到說：「大家就做好預防措施，係呢場疫症入面明哲保身，睇住d支那狗點樣『比天收』，等武漢肺炎幫我地打擊下支那經濟。」¹⁷⁷自我損害香港的經濟前途因此不再成為攪炒戰略的一環，「自炒」不再帶有任何的戰略意義，反而「明哲自保」才是「攪炒」的主軸，因為中國會自然地走向滅亡。「明哲保身」和「攪炒」兩個貌似對立的概念現在卻得以並置甚至是相連。「攪炒」的意涵在這裡就差不多已經全面滑轉，某程度上甚至是自我瓦解了。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寫成的這一天，剛好「攪炒巴」又發了新的文章和錄音，並首次為攪炒提供了一個英文翻譯，他說，攪炒不叫「burnism」，而是叫「phonenixism」，這

¹⁷⁴SUCKER (2020) 〈【肺炎攪炒】三個月，我要你執笠！〉，見「連登」，2020年1月23日，<https://lihkg.com/thread/1835919/page/1>

¹⁷⁵意即：「努力自救留著性命旁觀中國經濟泡沫爆破」。

¹⁷⁶手一黏便緊 (2020) 〈認為肺炎攪炒論有誤〉，見「連登」，2020年1月26日，<https://lihkg.com/thread/1842641/page/1?post=1>

¹⁷⁷意即：「大家就做好預防措施，在這場疫症裡面明哲保身，看著那些支那狗怎樣被老天爺收拾，等武漢肺炎幫我們打擊一下支那經濟。」欲罷不能 (2020) 〈（真攪炒）武漢肺炎就係「天滅中共」，絕對係好事黎。〉，見「連登」，2020年1月23日，<https://lihkg.com/thread/1835646/page/1>

是想要凸顯鳳凰先死後生的意思。¹⁷⁸這無疑是在他第一天提出的攪炒觀中摻入了希望的意味，攪炒也因此不再是「同歸於盡」，而是要「先死後生」。這說法雖然保有攪炒的情感前提，但無疑有點話鋒一轉的弔詭，攪炒中自炒的部分幾乎是蕩然無存了。

四、不同的攪炒之間「態度的同一性」

從上述不同的攪炒觀可見，雖然說不同人都同樣自稱攪炒，當中卻是由千差萬別、甚至相互矛盾的路線和方向構成的。不同攪炒觀各自的對象、方法，之中自炒的意義和對世界形勢的判斷都沒有共識，那他們又有什麼同一性？攪炒作為一個運動的主軸，它必須找到一種基本的精神力量或情感趨向，使得各種不同的攪炒派可以保持表面的團結，並且可以繼續響應和支持各方同稱為攪炒但其實是不同的攪炒路線。我將借用汪暉的概念，以「態度的同一性」去論述攪炒，甚至是這場反修例運動。

這種態度的同一性是透過美學的同一性和語言的同一性去表現的。不同派別的美學和用詞都幾乎一致，儘管路線甚至是方向不同，都無不是說「要攪炒」、「要不惜代價重創對方」、「要拖垮一切」。就如同五四運動一樣，「態度的同一性」一方面使得運動得以百花齊放，但其內部的細微差異終究還是造就了張力，甚至在之後使得攪炒的脆弱性和暫時性被暴露，進而在肺炎的關節點趨向自我瓦解/轉化。

就如同第一部分提到過的，這個態度的同一性是對香港漸進主義神話的破滅的回應，也有效地終結了破滅的絕望與行動。這個態度的同一性的內容是，首先確認香港必定會走向「終局」——即被允諾的自由市場、個人自由、法治，並漸漸邁向民主化等都不會實現。而這些是自 2014 年開始藉著譬如佔領運動的失敗、DQ 事件、示威者被大規模拘捕、反修例運動中大量示威者被警察以私刑對待、以及「星火同盟」存款被凍結等事件被逐步確認起來的。而既然死亡的終局被認為是無可迴避，走向終局的靜態等待就有了苟且的意味。這種苟且帶來的愧疚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被輕易被隱藏的，畢竟在殘酷的警民衝突的火線以外，還是有一定的生活空間。但這種苟且帶來的愧疚感在譬如示威者自殺事件中被激發起來，每一個示威者的受傷和死亡都質問著生者的靜態等待，似乎不行動起來或有任何不行動的計算和顧慮都是違反了道德的。後來當示威者聰明地發展了地區遊行的模式，警察毆打示威者和釋放催淚彈變成了在民居都可以輕易目睹或聞到的事情時，可以靜態地等待並匿藏苟且的愧疚的空間被進一步壓縮了。壓縮後所釋放出來的，就是久被壓抑的 2047 終局景象，面對這種「死亡」，攪炒這個概念是採取了直面的回應——即對死亡的確認及無所畏懼，態度上採取「不顧後果」和「放手一搏」的姿態。攪炒成功了捕捉這種態度的同一性，在提出的當下又同時提出了具體的策略倡議，

¹⁷⁸我要攪炒 (2020) 〈【錄音短片】我，攪炒巴，唔會因為對家出 100 萬追殺我，就怯同縮〉，見「連登」，2020 年 5 月 9 日，<https://lihkg.com/thread/2008382/page/1>

因此也中介了情感與行動，得到了正當性，成為了運動的主軸之一。

這也大概是為什麼梁文道對攪炒的質問會讓他那麼的被示威者批評。梁文道的認為，攪炒派使得「最糟糕，最能惡化局勢，最容易導致災難爆發的事情，反而變得特別容易。換句話說，最不符合香港多數人利益，最能傷害中央政府和整個國家，但卻又只有少數人才真正渴盼的局面，反而是如今最有可能實現的。」¹⁷⁹這一段看起來或者有點語焉不詳，但如果我們結合他之後的反駁文章，可能就更為清楚了：「每逢有人說到革命，或者這種『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的壯語，我總是會追問『然後呢？』在我看來，真正負責任的政治，是不能不問革命之後的第二天該怎麼辦的（假設你真能搞出一場革命的話）。這類主張最不切實際的地方，首先是把賭注全押在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身上。甚至有人居然以為特朗普會是香港示威者的救星。你看這兩天不就傳出消息，特朗普還打算在中美貿易談判當中對香港問題保持沉默？」¹⁸⁰梁文道其實是認為，攪炒巴的攪炒觀到最後沒有算計到中美兩國其實已經形成了共生的經濟體系——中美貿易戰也不過是一次分贓的博弈。而梁文道其實是想提醒：香港民眾如果看不清這一點，就敵不住希望親近歐美力量的慾望，所謂的攪炒其實就是不負責任的，不但做不到自己的設想，甚至是美國漁人得利。

梁文道的回應之所以不受歡迎，倒不是因為他指認香港示威者不負責任且沒有國際感，而香港人因為親美到極致所以予以反駁（雖然我不否認香港的政治感還是沒有被解殖，而且是非常西方中心主義的）。香港示威者在攪炒的國際路線表現出親美，主要原意並非認同美國的什麼價值，而是在想要打破漸進主義神話時還沒找到基進的語言，在情急之下認為可以借以強力的美國打垮強力的中國，是為打破「漸進」最「猛」的出路。也就是說，梁文道不受歡迎，是在於他在批評示威者「把賭注押在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身上」的時候有意無意地重複了某種漸進主義的話語，而這深深戳中了攪炒派的內心——因為攪炒派正正就是在對漸進主義的破滅和失望中生產出來的。也就是說，梁文道的批評正正就是透過反對攪炒派否認運動背後態度的一致性，進而是否定了運動的核心情感傾向。

我用態度的同一性去形容攪炒以至於運動，是因為這詞帶有某種含混的感覺，而這個含混就是這場運動和攪炒戰線的特點——也就是有這種含混，諸多運動中的諸多路線和攪炒的諸多路線才可以矛盾地並存。就如同汪暉所言：「態度不屬於理論的範疇，不具備理論邏輯的意義，而是人們對於對象的一種帶有傾向性的比較穩定的心理狀態。」¹⁸¹但態度的同一性還是有分析的力度，在於它還是有所指向。汪暉就指出，「『態度』作為一種心理傾向，他總是指向一定的對象，離開了特定的對象，『態度』的同一性也就

¹⁷⁹ 梁文道（2020）〈所謂「攪炒」〉，原載於《蘋果日報》，2019年9月1日，見「獨立媒體」，<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6926>

¹⁸⁰ 梁文道（2020）〈結局之路由此開始〉，原載於《蘋果日報》，2019年10月6日，見「獨立媒體」，<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7732>

¹⁸¹ 〈預言與危機（上篇）——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同註3。

不存在了。」¹⁸²那麼，攪炒的對象無可避免就是那群有份構造過神話（但也不同程度地參與了它的破滅）的人，包括中共、港府、紅色資本家和建制派。泛民儘管也會被遷怒，因為他們也有共構過漸進主義神話，但群眾的回應方式比較是直接繞過他們，這也是為什麼攪炒巴在「英美港盟，主權在民」集會中就提到「傳統思維一輩又有無勇氣，放棄三十年黎既模式，放手俾年輕人以新思維新方式改寫香港命運？」，¹⁸³呼籲同樣構造漸進主義神話的泛民放手，並且在第二次網絡發言同樣批評了泛民故步自封。¹⁸⁴

當然，如果在一個最有思想體系的角度，我們可以批判說攪炒的取態或這種「態度的同一性」是繞過了許多的選項。譬如就曾經有台灣的朋友認為這種對於全面回歸中國等於死亡的想像是否定了大陸的反抗是存在的；有左翼則會認為這場運動中譬如攪炒的動力完全是觀乎政治回歸，而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壓迫沒有批判，甚至會迴避討論經濟的面向。這些我都不反對。也就是說，我同意攪炒的出現本身就是來自一種特定甚至是侷限的歷史認識。也就是說，攪炒並不像它的字面意思那麼的基進，更不會是〈國際歌〉裡面的「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奈爾就一定實現」的那種攪炒。攪炒作為一個態度的同一性，就是會有特定的對象。而因為攪炒首先就是侷限在回應那個神話及其死亡，其對象就必定會是中共、港府、紅色資本家和建制派，而不會演變成要攪炒資本主義、攪炒父權體系、攪炒西方的民主自由、攪炒健全中心主義，因為在奠定攪炒之前就已經是對神話的附著以及因為附著而帶來的絕望和從而產生的死亡觀。

講到這裡，或許這會予人一種「這個運動就是無可救藥的不會左轉是嗎？」的感覺。然而，我認為態度的同一性是運動的弱點，而他必然是脆弱的，甚至會自我滑轉和瓦解。因為這個態度的一致性就是模糊的，這種模糊使得整個運動所實現出來去實踐其使命的工具普遍帶有非關邏輯和理論的不嚴謹的特性。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什麼都可以被說成是攪炒」——因為態度的同一性底下，對思想和行動的關注和評判標準並不是「它有沒有嚴謹的思想體系」，而是在於他有沒有符合態度的一致性，也就是它更多的是道德的標準。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攪炒為什麼非關手段的激烈或速度，更與思想無關，而且展現了多種矛盾的「策略和策略和策略」，當中沒有想要去追求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的建立或去真的處理矛盾。而這也會使得無論是運動還是攪炒最終有其脆弱性、暫時性，甚至會自我瓦解。然而，我卻認為這些時刻，或許可以打開某些基進的改變的裂口。也就是說，我們不是透過維持那個態度的同一性，並且妄想可以在這個態度的同一性中直接長出基進的政治（因為基進的政治，始終無法不是在批判地回應漸進主義神話開始，而不是像運動那樣一開始就是附著在漸進主義神話及其破滅之上）。基進的政治，或許就是要在它因為內部矛盾而滑轉時才有機會出現。

¹⁸² 〈預言與危機（上篇）——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同註 3。

¹⁸³ 意即：「傳統思維一輩又有沒有勇氣，放棄三十年來的模式，放手讓年輕人以新思維新方式改寫香港命運？」見「【反送中】攪炒巴想同香港人講」，同註 9。

¹⁸⁴ 〈【錄音短片】我，攪炒巴，唔會因為對家出 100 萬追殺我，就怯同縮〉，同註 26。

但這個機會不會貿貿然出現，這也是為什麼我並不同意某些同樣信仰基進政治的左翼認為該冷眼旁觀運動的消亡之後才說話。我認為，要讓基進的政治成為運動發展時的道路選項，首先是要讓基進政治進入攪炒系統的視野。因此，我認為介入這場的運動的方法，不應該是首先去質疑態度同一性的基礎——因為這只會讓你落得梁文道的下場，被一開始就排拒在外——而是先肯認攪炒作為態度的同一性的情感合理性。而且，我不得不說，攪炒是一個有氣魄的起點。畢竟不顧一切地放手一搏，在我看來是基進政治同樣具備的氣質。下一個問題或許不是梁文道的「然後呢？」，而是「這真的是攪炒嗎？」「我們夠攪炒嗎？」我相信，攪炒的情感動力或許終究會找到其母體——即那個導致了一切悲劇的漸進主義神話，並有可能發展出批判的閱讀。

這也是我對「攪炒巴」的回應。攪炒巴自 816 的發言後的第二次發言中再一次提出了攪炒中國際戰線、街頭和議會缺一不可，譬如如果沒有街頭的直接行動和議會的攪炒（即否決所有議案）的幫助，國際戰線猶如逆水行舟，並痛擊主導議會的泛民退縮、主導街頭的勇武派和本土派數私怨不合作。¹⁸⁵那我要提問的是，一直以來所做的國際連線，真的是有他所說的攪炒的意志嗎？如果說攪炒的魅力在於它有效地中介的絕望的情感與行動，並且有效地借用此情感超克了勇武和和理非之間的形式矛盾，結合了這兩股力量一同去回應漸進主義神話的破滅，並在不同程度上曾經有意無意想要反思神話背後的正當性——譬如破除對聯繫匯率的執著、以街頭行動衝擊漸進主義為了迎合議會而無力發圍。那麼，攪炒概念可以也攪炒地反思現在運動的國際路線嗎？難道不是中美共構的世界格局，逼迫香港繼續做國際金融中心，導致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對香港的政治鎮壓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是表面支持香港示威，暗地繼續和中國共構新自由主義擴張嗎？這種非極致的攪炒，與西方政權——而不是持有同樣的歷史軌跡的東亞人民（譬如濟州島、沖繩和更多）或第三世界人民——的合作，會否到頭來志是維穩了攪炒一開始想要破局的漸進主義神話，變成一種病藥相發的狀態。

我對攪炒概念有機會長出新的「可能」或許是過於樂觀，但我執著地呼籲大家認真地加入攪炒的討論，是因為我認為攪炒是最接近香港核心情感和歷史問題的概念，而一切可能必須是從直面開始。這種直面或許不是一開始就基進的，但一切都需要時間學習。但至少或許，攪炒讓我們不再是忿忿不平中共或泛民如何沒有應許我們「繼續體現自由市場、個人自由、法治，並漸漸邁向民主化」這個漸進主義神話——而是嘗試自己去直面這個母體，並且想到或許這些的本質就是謊言，是中國和泛民的謊言。那或許下一步時不時也可以看到，這也是美國的謊言、資本主義的謊言、世界的謊言，不只是中共或泛民不信守諾言，而是這些東西根本就是維持世界糟糕秩序的粉飾話語。基進本來的定義就是「回到根部」，那麼，難道利用攪炒這個直接通往核心的捷徑，批判地閱讀香港的漸進主義神話，不就正正是接地氣地回到香港的根部的方法，也是基進地介入運動甚至參與運動的方法嗎？

¹⁸⁵ 〈【錄音短片】我，攪炒巴，唔會因為對家出 100 萬追殺我，就怯同縮〉，同註 26。

和勇不分的跨代「手足」網絡

——從親密關係看反修例運動的「不割席」現象

黃雋浩

摘要

在「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下作「反修例運動」）中，有關應否與暴力割席經常引起討論。本文以行動者的生命經驗為本，嘗試帶出親密關係的互動如何讓他們在沒有「大台」（注：領導）下仍然「不割席」。文中指出在本地的回歸歷史脈絡和 2046 年的「一國兩制」大限下，傳統「和理非」（注：和平、理性、非暴力主張的民主派）與回歸一代，達成跨代「和（理非）勇（武）不分」的路線和解，並在警暴的催化下，抗爭者通過網上社群集體行動，創造性地挪用「手足」「家長」和「小朋友」等家庭比喻，發展成一個「擬親屬（fictive kinship）」的相互照護關係，並投入各種技藝和對策的學習，以至道德經濟，挑戰昔日功利家庭想像。另一方面，海外港人的缺席和距離感，使焦慮與共感放大，也是驅使他們加入其中的一大原因。筆者強調這些投入運動的年輕人，其勇於為他人犧牲的情操並非出於自戀，並指認這種標籤呼應著管治者的大家長主義，以之作為轉移「回歸」劇目失敗的藉口。運動至今，「和勇不分」的抗爭實踐持續撼動回歸以來被「急凍」殖民體制，在管治者無力地動用各種承襲殖民的警政體系和威權，加上政治化與高動員力的「手足」網絡延展，促成解殖的歷史缺口。

關鍵字：反修例運動，和勇不分，世代，擬親屬，功利家庭，解殖

一、引言

2019 年十二月底在國立交通大學，就反修例運動而舉辦的「香港論壇：法治、警權、人民」，不少舊雨新知前來參與和分享，得以重新連繫，尤其高興。在席間聽到不少針對抗爭者的暴力以至應否與「勇武」路線割席的提問，本來要回應這些提問，讓流亡來台的抗爭者親自前來作證言式的口述歷史分享是個不錯的方法，畢竟很多判斷和理論都

該建立於第一手的生命經驗和歷史真相，可惜因為種種技術上的困難，構思最終沒有實現。

懷著這份初衷，本文將抗爭者的生命經驗帶進來，期望呼喚一種直面生命的技藝和書寫。通過回溯這些行動者的行動和決策，以至當中的親密關係，解釋何以在沒有「大台」組織下，政治路線不同的行動者，何以仍然在「不割席」的號召下保持團結，並在2019年九月和十月警民持續衝突的期間，依然有近六成市民同意示威者的激烈行動。與此同時，也討論運動當中的歷史意識與解殖的問題。必得先旨聲明，本文雖然為讀者揭開這些蒙面「手足」背後的生命經驗，但在恐懼依然瀰漫之際，我務必要以暱名保護當事人，以至作一定程度的背景修改。

二、擬「親屬」關係的跨國化

海星（化名）是一位中學畢業不久的抗爭者，如今流亡在台準備升學。我與海星見面，是由一位舊同學在網上抗爭群組促成的，負責跟我接洽的人將自己定位為「姐姐」或「家長」的一員，他將這些抗爭者稱作「小朋友」，「姐姐」強調自己跟這些「小朋友」本身非親非故，她向我透露「他（海星）要走的晚上我哭到不行」，並寄望疫情過去後可以來台探望他們。而因為來台時海星身上只穿著冬天衣服，而「姐姐」也擔心海星不肯讓她幫忙，所以特別請我見面時留意他身上穿得是否適切，托我告知海星已經為他寄出夏天的衣服。

見面當日，海星跟我說很想吃肉，我們約在他學校宿舍附近的一家西餐廳。「姐姐」告訴我這些「小朋友」混熟後還有稚氣的一面，但對陌生人依然很有戒心，花多個月的時間才取信於他們。所以我跟海星見面時，沒有問及太多關於來台的前因，也儘量少觸及他具體的案情，只是從他口中得知他的案情不算太複雜，像他這種經正式的官方管道過關來台的案例一般都屬輕微，而香港政府對於這類個案其實有一定的掌握。只是如今倘要在台申請大學入學、居留證，以至健保，都得先向香港的警政單位申請良民證，海星與律師商討過，以他的案情最終能獲發良民證算是有機會的。

海星本身來自一個單親家庭，家住香港的公共房屋，家中排行第二，有哥哥、弟弟和妹妹各一個，四個孩子靠著母親拉扯長大，哥哥早已出社會已無同住。在我跟他的對話中，他一直強調母親十分辛苦，而出走台灣的主意其實主要來自他的母親，家中如今的開銷主要靠母親在黃色經濟圈小店打工的收入維持。

來台以後，海星一直與家裡保持聯絡，對於海星的離開，家裡的反應無不複雜，一方面原來同住一個房間，被海星形容為「MK仔」（注：趕潮流的草根氣質青年），經常投訴書櫃阻地方的弟弟，如今終於擁有自己的私人空間，但對於海星這樣一走了之，其實也有怨言，因為家門外經常有人以討債或送貨拍門，海星家人無法辨明這些「拍門者」的身份和來意，平時一概不作回應，而觀乎最近頻頻傳出警察在沒有搜令下破門搜屋抓人的新聞，從對話中，我能清楚感受到海星的惶恐。

海星偶爾哼起店內播放的流行音樂，如今就讀於大學的預備班，對於升讀大學，海星告訴我本來更希望與音樂制作相關的，但在現有條件下，似乎申請理組的科系比較可行。而得知我是研究所學生後，海星尤其感興趣，對如今以留台發展作為目標的他，似乎從學術機構中從事有益運動的研究看到出路。海星如今正準備考試，所以大部分時間都在溫習，而人道基金的生活補助不算十分寬裕，加上希望擠點錢用作補習，平日多與馬來西亞同學一起外帶便宜的學餐便當，甚少外食，雖然偶爾也會跟香港同學外出消遣，但他跟我說他的角色往往是勸說他們認真讀書。

海星向我透露校內的情況，在他認識的香港同學中，有些仍會在校內帶伸縮警棍防身，學校怎麼勸說還是沒有他們辦法。另外，也有一些同學涉嫌以眾籌所得援金購買重機等奢侈品，海星為這種行為側目，覺得是「人血饅頭」，並強調要對得起「家長」們的支援，認為「有手有腳有膽量就可以上前線」，但「和理非」或「家長」的持續支援才是最難得。而從海星口中，讓我意識到原來台灣也有不少在台港人的「家長」的群體，這些群體也不時與這些流亡的「小朋友」聚餐，有時會外包一些如影片加工的自由工作讓他們多賺零用錢，海星期望以後一些黃色經濟圈的小店來台開店，自己也可以去打零工有比較穩定的收入。

從海星的抗爭與來台流亡經驗來看，這些生活實踐從來並非單依個人意志而達成，對話間我們大致知道當中牽涉物資、法律諮詢、就學協助，工作收入安排等支援。而在抗爭的街頭，為了規避警察的追捕，抗爭者會在街頭現場以社交群組聯繫，群組中的「家長」除了自身參與，亦會運用自己的資源為欠缺經濟能力的「小朋友」，提供指涉抗爭裝備的「文具」；以便在現場附近暫避的「安全屋」（注：租住飯店），以至方便物資運送和安全撤退的「家長車」（注：私家車）。

換言之，通過社交群組的動員，「家長」按照自己能力，為在抗爭資源最少而風險最高的「小朋友」提供各式各樣的照護。他們以代號指涉這些資源，除了希望免除一些可能的法律責任，也是創造性地將家長對孩子的親職實踐挪用轉化。如是者，在「和勇不分」的信念下，「小朋友」和「家長」通過情感和物質的互惠關係產生連結，人類學家鄭肇祺將這種由街頭抗爭發展而來的社會關係概括為擬親屬（fictive kinship）關係。

海星的例子讓我們見證到這種關係與實踐延伸到海外的跨國趨勢，然而這個網絡是如何建立起來的？以至親密的關係在當中如何作用？

三、「攞炒」下的家庭衝突與協商

海星告訴我，他在前線所用的「文具」，來自一位叫阿水（化名）的「哥哥」。阿水是在台留學生，運動以來一直留意事件，但只能作有限度參與，曾經掙扎過要不要直接投身抗爭，寫過一些文宣後發覺留在台灣，利用自己留學生的身分，借機向同學、老師解說運動似乎比較有效。至於如何被捲進「家長」的群組，則與他 2019 年暑假回港的經歷和家庭關係有關。

在 2019 年的中旬，警察還未穿上無法辨認身份的防暴套裝時，阿水在港的家人就參與大大小小的遊行，家庭雖然關係疏離，但運動的資訊也難得地在家裡群組傳個不停。如果按照政治光譜的分類，阿水的父親屬於傳統泛民主派支持者，是那種每年「六四紀念晚會」都不會缺席的「和理非」。阿水雖然質疑本土派路線，而在 2016 年立法會補選，仍是票投泛民的策略性選民。弟弟則是平日沉默寡言，卻是票投梁天琦（本土派的候選人之一，如今因「參與暴動罪」仍在服刑中）的選民。

在阿水的家裡，運動中第一次的路線分歧要數七月一日衝進立法會一役，阿水的父親認為經歷百萬人的和平示威無效就只能認命，對於闖入立法會事件，他認為國際社會會解讀成暴動，覺得是年輕人一意孤行，是「中計」而自毀成果。阿水雖然不完全明白抗爭者的做法，但覺得可以同情地理解，也希望以此說服父親；而弟弟則傳出嘲諷堅持和平示威的留言截圖，以之表達心聲。這些抗爭路線的討論在家庭群組之中延續，直到闖進立法會的留守者在警察攻入死線前，戲劇性地全數安全撤離而暫時化解，但隨著各式各樣以癱瘓城市流動為目的的「攞炒」（注：玉石俱焚）不合作運動全面展開，阿水的父親依然以「不能影響人流動」為由反對以阻路來抗爭。

四、弟弟的一課與守望實作

暑假期間阿水回港，覺得與一年前恍如隔世，整個社會氣氛和抗爭範式已然不同，

針對「藍（注：親建制）店」的流動抗爭以「window shopping」（注：只看不買）形式，在各大商場開展；以街頭阻路為目標的抗爭活動參與人數也愈來愈多，警察所用武備早已由警棍升級為催淚彈和橡膠子彈。為了阻延被武力驅散，減少抗爭者所受到的傷害，最大化不合作運動的效果，各式的防禦裝備如安全帽、防毒面具開始在社區分發，後來因為警察開始干預社區分發，阿水也響應自己收「書包」（注：抗爭包包），自行購置「文具」。

「7.21 西鐵元朗站事件」後，警察以選擇性執法的方式，與親政府的地方勢力合謀使市民無差別地受襲的證據呼之欲出。阿水去了反對「警（察）黑（社會）合作」的光復元朗的遊行。隨著警察愈來愈隨意腰斬遊行，不受催淚彈干擾的和平時間也愈來愈短，而警察的對策亦早已從原來驅散改為包抄和圍捕。阿水穿上裝備留守在後方傳遞物資，但第一次親歷警察施放催淚彈時還是戰戰兢兢。入黑前，阿水從手機收到 Airdrop 現場隔空投送的撤退時間，共識與同行的年輕人撤退，也擔心著來不及會合的弟弟。

阿水記得，當晚弟弟在稍晚的時間安全回家，問及阿水：「當前線忙於阻擋警察推進而沒有看到 Airdrop，回頭一看，後面大家都已四散結果會是如何？」阿水說弟弟提出的實作問題，是阿水沒有想過的。而從不同的新聞報道也可印證，警察往往在人群中部署內應，趁後勤的抗爭者散去後，重點拘捕在前線留守到最後的所謂「勇武派」，並讓他們承受遠超拘捕所需的暴力對待（如涉嫌將扣留人士帶到位處邊境的新屋嶺扣留中心施以酷刑）。如是者，當沒辦法查證撤退共識時，大家更傾向留守現場互相保護。

五、抗爭技藝學習與互助精神

縱然不少朋友對這些暴力的鏡頭已大有吃不消之感，但阿水一直緊貼運動的發展，通宵收看直播，正正因為弟弟當日的那番說話，以至在抗爭現場中的經歷。「7.28 港島區衝突」中，阿水與另一位回港的留學生朋友一起，這位朋友裝備簡陋，阿水不經意和他走到前線，手中莫名其妙接過一把雨傘，後來才知道雨傘可以卸下催淚彈和橡膠子彈的威力。阿水形容現場催淚彈到處亂飛，有的人充當「捕手」將催淚彈檢走或丟回警察方向，有的在高處向後排用手勢指示前線所需的物資補給，以至進退的節奏，前線吃上催淚彈後撤至後排沖洗，後排的人在警察重裝彈藥前輪換前線，這樣前仆後繼，一浪接一浪抵擋著警方從高處四面八方射落的催淚彈和推進。

吃上幾輪催淚彈後，阿水在不遠一家貼滿運動文宣，開放予抗爭者的「黃店」餐廳

休息，與朋友會合，並換掉身上示威用的黑衣，一邊用餐一邊準備撤離。其時警察依然忌諱闖入店鋪、商場和屋苑等私人業權地方。當晚警察不斷擴大圍捕，阿水告訴我，店內暫避的人愈來愈多，有被胡椒噴劑噴致身體過敏的人，後來也有一位被警察披推倒嚴重受傷的外藉女街坊，阿水與朋友一邊安撫為傷者作簡單治理，一邊從 telegram 召喚義務急救員，外藉女街坊後來經救護車送到醫院，阿水與朋友也從 telegram 覓得有心人的「義載車」(後來普遍稱為「家長車」)逃去，下車前本想補貼車主油錢，卻被斷然拒絕。阿水說當晚想過到就近親戚家過夜，但考慮到政治立場相佐而打消念頭，卻萬萬想不到最終會相救的竟然都是非親非故的陌生人。

阿水回台前，遊行再難取得警察批准，街頭的抗爭變成「多區開花」的快閃游擊，警察開始進入不同的私人領域，甚至如「8.31 太子站襲擊事件」中徵用鐵路，愈來愈多路人捱上催淚彈和警棍，香港市面的防毒面具也開始短缺，在朋友的請求下，阿水加入在台購置裝備的支援工作。阿水向我吐露，他以「江湖救急」的名義，向希望多作貢獻的父親借上一筆錢，再在親朋好友和同學老師間組織眾籌，研究和比較不同型號的價格和功能後，在台灣購得一批物資，托朋友以手拉行李寄回香港，在警察施放催淚彈的現場向所有受影響的人派發。

就是這樣，抗爭者通過實踐，學會如何在互助下進退有據和使用裝備。在公權力持續失效下，他們為自己打氣口號已然由「香港人加油」演變成「反抗」，甚至「報仇」。更多的新形勢相繼出現，如親政府人士的大規模施襲，抑或警察喬裝示威者部署拘捕，現場對策再難紙上談兵，牽涉更多當下的判斷，也難免有訴諸暴力的時候。是要恪守和平；還是「以武止暴」，讓施襲者或喬裝警察受到教訓，就變成抗爭者在現場因地制宜的判斷和抉擇，當中的暴力固然需要更多的討論，以讓抗爭者有所節制，亦所以後來網上有不少關於「私了」(私下了斷)行為原則的出現。但凡此種種，都是在地實踐下的技藝學習。而阿水回台後仍然緊貼運動，正正是生怕有一日因為資訊滯後，再難理解當中的判斷而有負「手足」。

六、「和理非」家長的另類「攪炒」

在反修例運動中，「和理非」其實從不缺席，他們以宗教集會唱聖詩、義務醫護急救、社工服務支援等和平方式，在前線周旋，以圖緩阻警察的推進和警民衝突；也有在全港十八區的連儂牆張貼文宣。而阿水的父親，其投入主要來自對年輕人的同情和警暴的痛恨，除了一直參與和平遊行和作金錢支援，好多次的堵路活動，他也從以前責怪年

輕人「送頭」(注：無謂的自我犧牲)，開始以「街坊」裝扮微服親身觀察。雖然偶爾會因舉機拍攝被罵，但了解到前線抗爭者憂慮會成被起訴的證據，還是乖乖配合。

阿水父親的兄弟姐妹皆以親政府的「藍絲」為主，據阿水說，其父親之所以深得尊重，源於年輕時奮起對抗祖父家暴，所以父親無論傳出遊行的所拍到的照片，抑或戴著防毒面具的惡搞照片，在家族群內雖然得不到回應，但至少不會有人反對。倒是阿水每次藉機解說運動時，都會遭到群內長輩阻撓，好幾次被要求退群，甚至被誤以為與美國中情局有連繫，最後都得幸父親幫忙解圍。但最讓阿水大惑不解是，當年這些「勇武」對抗家暴的長輩，何以如今對於政權的暴力如此寬宏。

因為群內大大小小的爭議，弟弟早已退出家族群組，阿水則勉強留在家族群組，至於阿水父親尤其受不了兄弟姐妹以「甲由(注：蟑螂)」形容抗爭者，雖早已退出他的一輩的群組，但仍然留在家族群組。群組內的討論幾乎完全去政治，只剩風花雪月。11月中後旬，正值群內兄弟姐妹關係到達冰點，父親與幾個弟妹事前約好一同旅行未知會否因失和而告吹，時間正好交疊在 2019 年區議會選舉。父親向阿水表示這些親戚皆為親政府的「藍絲」，留在香港也一定會投票支持親建制的政團，如今旅行而錯過區選，但「以一搏四」也不失為一次「攞炒」，最後旅行還是如期出發，而乘著父親的旅行「攞炒」，阿水也自覺有義務要回港補回父親的一票。

七、自戀還是自愛？回歸還是離散？

阿水回港投票前的一陣子，終發生在警民衝突現場附近受傷並喪命的「周梓樂墜樓事件」，觸發全港三罷的「11.11 黎明行動」，多家位處主要幹道旁的大專院校成為架設路障的要塞，後來理工大學終被警察圍困，網上呼籲市民從八方「圍魏救趙」，以各種手段消耗警力，為理大的抗爭者解圍創造機會，而警察的戰術已變為以催淚彈掩護下衝進人群亂打。阿水回港後才得知幾天前正值父親出行之際，弟弟瞞著女友又響應號召而外出行動，差點因而被捕。

事實上，單從數字去看，至三月底在運動被捕的近 8000 人中，近八成皆為 30 歲以下，這個數字似乎符合了我們對運動源於年輕人桀驁不馴的印象，不少評論借用粗疏的世代分析，將抗爭者的激烈情感指控為自我中心、自戀而被寵壞等。香港文化研究學者許寶強就以精神分析理論，嘗試將愛的情感從政治中拯救，他將利他的愛與自戀分開，指出自戀乃出為求自保和沉溺完美形象的追求；前者卻是接近著鮑曼所提到愛人若己的

「自愛」(Self-Love)。

相對於只顧形象維護的自戀，鮑曼的「自愛」建基於自身被愛經歷的反饋，關顧著他人的生命與尊嚴，在必要時願意犧牲形象以至性命。觀乎抗爭者念茲在茲的記掛和支援著參與運動的家人和「手足」，不惜以各式各樣的親身投入，不求回報的支援抗爭的「手足」，冒著被捕、受傷的風險依然願意走上街頭，甚至必要時願意作自我犧牲，讓其他抗爭有機會逃脫，則更貼近鮑曼所提到的「自愛」。而倘若因為運動中看到情緒化一面，就指這些年輕人的行動是出於「自戀」，毋寧是如同「年輕就是罪名」，將嬰兒與洗澡水一同倒掉，而看不到他們基於「自愛」的犧牲，以至其行動根本源於人與人和社區之間的關懷。

倒是特首林鄭以「慈母」形象自比，形容自己不想「縱容小朋友任性」，以之合理化警察鎮壓民意，似乎更符合為求自保，而作孤芳自賞的形象工程。事實上，「慈母」固然是一種文化建構，這種管治者以家庭關係所作的政治比喻並非先例。就如回歸以降大家耳熟能詳的「游子歸鄉」的劇目，可惜劇目沒有演成，不僅早在三十多年的在六四屠城，就觸發過一次移民潮；如今回歸廿二年，血案尚未平反，卻又在反修例運動下，諷刺地再次釀成有家歸不得的離散一代，逼使他們有的被逐出家門、有的坐上政治牢獄，又或是走上流亡海外之路。

另一方面，抗爭中的年輕人，往往是最不受保障一群。除了往往要瞞著家人行動外，倘若受傷也害怕醫院舉報而不敢就醫。萬一被捕，媒體受這些無法識別身份的警察重重阻撓拍攝，使大眾難以判斷拘捕和所用的武力是否恰當，以至有否給抗爭者插穢嫁禍；過程中被捕者亦往往被禁言，無法喊出名字以便律師認人跟進；而在拘留的地方，律師、家屬未接觸到被捕者前，也無法確保被捕人受人道對待，以至及時就醫。在重重不透明的「執法」行動下，當愈來愈多被警方歸為「無可疑」的命案出現時，自然會引起公眾對「被自殺」的聯想和臆測，甚至有「他只是恰巧不是你家兒子」等文宣悼念出現。因此，被捕者在運動所遭受的不平等對待，正正是他們發起各種行動的正當性來源。

八、跨代和解：告別功利家庭

事實上，這些活躍於運動的年輕人，一出生就走在 1997 年回歸路上的，也是迎向

2046 年大限，將要面對生活方式「50 年不變」承諾過期的一代。他們啟蒙自 2003 年推倒「23 條」國家安全立法的七一大遊行，在保衛天星及皇后碼頭、利東街等反遷拆運動和反高鐵運動下，培育出對地方歸屬感，經歷 2014 年以威權鎮壓作結的和平與非暴力佔領運動。在五年後的反修例風波中衝入立法會，在柱樑寫上一句「是你教我們和平遊行是沒用的」，大概就是這些年輕人從生命經驗得出的歷史見解。裡面所承載的除了是對中國和香港官方的控訴外，也是對上一代「和理非」所代表「民主回歸」（注：支持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同時應該落實全面的民主政制）路線長期失敗的不滿。

以世代關係比喻非建制力量中不同的路線，早在 2009 年一連串的以「八十後」為旗幟的社會運動就開始了，也引伸出「世代矛盾」的社會論述，以至官方和民間針對當年的新一代激進路線和青年如「廢青」等家長式的污名化論述，使世代問題變得尖銳。到 2014 年，學生組織以衝進政府總部外的公民廣場，成功改寫了「佔中三子」（注：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等原來排拒學生世代參與，以和平佔領、等候被捕的「中年人運動」設計，年輕人取而代之成為雨傘運動的主力，後來運動在管治者的對不同路線刻意分化，加上抗爭者在拒絕或保留「大台」，以至是否接受武力抗爭路線分歧下黯然落幕，非建制勢力也正式分裂出以世代界線來劃分、相互排斥的老一輩「和理非」和新一代「勇武派」路線。

經驗雨傘運動後「一國兩制」進一步的荒腔走板，非建制派在議會之路被全面封殺，街頭的不合作抗爭也被警察暴力圍堵，老一輩的「和理非」背負著對中國「六四血案」和香港「民主回歸」失敗的歉疚；年輕一輩則帶著 2046 年的「End Game」（注：終局）的焦慮，積極尋求命運自決的出路下，催生出自覺「被時代選中」的政治行動主體。到 2019 年的反修例運動，從前的泛民主派以至學生組織都再無法取得領導位置，然而在「不割席、不分化、不篤灰（注：不相互告發）」和「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共識下，加上警暴下的同理共感，不同政治光譜的兩代人，達成了跨代的路線和解，促成了在雨傘運動後這種沒有「大台」的情況下依然「和勇不分」的局面。

另一方面，香港主流素來標榜物質主義和去政治的家庭文化。就如戰後以來第一代社會學家劉兆佳，就一直將香港制度的建立歸結於「功利家庭主義」，將戰後來港的中國移民描述成對家庭忠誠的物質主義者，認定其非政治化和低動員潛力的等特色，為香港「殖民地奇跡」的文化原因。然而，從昔日的世代論的爭議到如今「和勇不分」局面，行動者卻開拓出與「功利家庭」大相逕庭的另類實踐。

在反修例運動中，抗爭者以「手足」借喻彼此間如同身體手腳般不能分離的同胞兄弟之情，誠如「姐姐」告訴我，大家都分享著一種「孤獨和不被（社會或家人）諒解」的心情，同時或多或少經驗陌生人不求回報的恩惠和照護。基於「手足唔係 condom」

(注：不能如保險套般對「手足」用完即棄)的號召，他們積極投入各種相互照應技藝和對策的學習。與此同時，當年輕人成為在抗爭現場警察重點的打擊對象，抗爭者也將對年輕家人安危的憂慮投射到比自己年輕的抗爭者之上，他們創造性地挪用「家長」和「小朋友」的親職關係，通過社交群組的網絡技術，發展成一個以政治行動與動員為目的擬親屬網絡。而在各種情感和物質支援的道德經濟下，這種擬親屬網絡挑戰了以往對政治漠不關心，從公民社會退卻的功利家庭想像。

至於海外港人，也因為無法現場參與的距離感，放大了當中的焦慮和同理共感，驅使他們更急欲以行動彌補自身的缺席，通過網絡直播持續關注運動，並紛紛加入這些在社交群組上的擬親屬網絡，作出海外文宣、物資供應和照護流亡抗爭者的後勤支援，由此交織出延伸出海外的「手足」網絡，造就反修例運動得以「如水」般突破重重圍堵下依然不斷溢出的現象。

九、結語：撼動「急凍」殖民的歷史缺口

因為歷史以至現場的際遇，反修例運動克服了路線和世代的分歧，聚合了不同的生命，形成擬親屬網絡實踐，擺脫昔日被奉為典範的去政治和物質主義的性格以至家庭想像。香港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就批判過劉兆佳以這種「功利家庭主義」塑造聽話香港人的形象，乃是一種香港殖民管理大計之下的意識形態產物，並一路由劉兆佳這類「專家」，將這種管理技術在新舊殖民主間維持下去。而如今抗爭者在沒有「大台」領導下，自發組織成的高度政治化，同時具備高度動員力的擬親屬網絡，這種實踐正正從這種承襲自港英，一直被「急凍」的殖民體制以至管理技術鬆動開來。

與此同時，在反修例運動中，這個自恃為「亞洲最佳 (Asia's finest)」，佔公務員近兩成，合共三萬人的警察部門，動用港英殖民遺下的《公安條例》和《緊急法》等殖民的威權律法，打壓市民集會的權利，並隨著新的警務處處長上任，將沿用 20 年的香港警隊口號「服務為本」改為「忠誠勇毅」，愈發暴露其效力於威權的性質。如今，這個警政單位成為眾矢之的，其信任評分在近半市民的心目中持續「捧蛋」，以至平民百姓都學會被截查時要求警員出示委任證；被捕時學會保持緘默大叫「我有野講！」(注：我無可奉告)，甚至拿出家用蒸魚鐵盆來對抗警暴，撲熄催淚彈，都可以旁證這個自 1997 年政權移交時安然過渡，延續殖民權力的警政系統，其公信力和認授性已然蕩然無存。

因應「功利家庭」的殖民治理術被鬆動，代表殖民權力的警政系統失去民眾信任和

認授，承襲自昔日的殖民體系面臨崩析離。隨著法庭以「高尚情操」輕判親政府的傷人刀手，政府部門公然政治審查公開考試題目以至電視節目，乃至近日中央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繞過香港的立法會，直接審議《國家安全法》，凡此種種的荒謬現象，都加快香港的「系統性敗壞」。未來縱是沒有人能以水晶球預知，但隨著新一代被捕而候審和在囚的政治犯愈來愈多，見證敗壞的人也愈來愈多，「和勇不分」的「手足」網絡持續關注，在囚人士以至其他因為運動而牽動的各式邊緣議題得以開展，殖民以來所承襲的體制各式問題將被揭開，更多暴力以至「官商鄉黑」的勾結關係被公諸於世。由是觀之，這個羅永生稱作「未經徹底解除殖民狀態」的體制正被撼動，解殖的歷史缺口似乎正在打開。

餘話

隨著街頭抗爭代價愈來愈大，加上疫情關係，我們看到抗爭運動亦朝「黃色經濟圈」的持久對抗發展，運動面臨另一重轉化。對於抗爭者，無論是從面向本地的街頭，抑或從海外通宵觀看直播的螢光幕，要走向日常的心態轉型都是一大挑戰。另一方面，縱然阿水的抗爭群組至今依然活躍，在疫情中積極支援彼此以至相熟醫護，動用跨國的網絡從海外團購防疫用品，但這些由虛擬網絡連繫的行動者，能不能一直以「非親非故」的陌生人狀態，在真實世界中持續網絡的支援，以至從運動中延展而來的跨國機構，如在台灣支援流亡抗爭者的餐廳「保護傘」等的實踐，也是有待考察。

此外，在衝突現場出現過的「今生只嫁前線巴(brother)」和「今世只娶後勤絲(sister)」等豪言壯語的塗鴉，以至「姐姐」對海星的密集親職般的遙距照護，我們留意到現象似乎都在複製約定俗成的性別分工。雖然本文未能作出深究，但觀乎整體被捕人士中，女性所佔比例約四分之一，可見女性從來沒有缺席於前線，實際的性別分工其實是相當混雜，以至阿水的抗爭群組也有基於新抗爭者的盲目「勇武」，討論反省是否過度英雄化「勇武」抗爭的陽剛氣質。當運動走向生活之際，運動能否開展出超脫陽剛氣質所想像的「手足」之情，例如從照護流亡「小朋友」中共同學習，以破除俗成的性別分工，也是值得繼續跟進的發展。